

童岭/著

炎风朔雪记

——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http://www.cp.com.

ISBN 978-7-100-08323-
9 787100 083232 >
定价：30.00元

上架建议：文化·历史



炎凤朔龙记

——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

童岭 著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 / 童岭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7-100-08323-2

Ⅰ.①炎… Ⅱ.①童… Ⅲ.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亚—唐代 Ⅳ.①D8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1800号



炎凤朔龙记
——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
童 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画 中 画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8323-2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定价：30.00元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遭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 年秋

引　子

提起唐朝或唐代，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国家的人，反应不一。比如说，欧洲人也许就会想到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最先命名的“丝绸之路”；日本人则会联想到“遣唐使”，以及与遣唐使密切相关的“正仓院”；但有一些非洲或南美国家，也许只是想到“唐人街”上的中国美食……唐代在整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实际地位如何，以及由此衍射出对整个东亚史、世界史的作用又是如何？这是本书作者即将和诸位读者一起发掘、探讨的问题点。2012 年春天，应孙英刚兄之邀，我到复旦文史研究院做了一场学术演讲。英刚兄与我学术兴趣相近，大家相谈甚欢。他告诉我，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余太山先生正在商务印书馆组一套书，每本约 10 万字。英刚兄将我推荐给太山先生，希望我能接手一本。当时我很犹豫，总觉得这样的“小书”要“大家”写，与我何干呢？倒是太山先生对我这个并非史学界的后辈鼓励有加，而且英刚兄也接着劝道：“我自己也要写一本，书旨是新近思考的一个议题。老弟也可将最新的学术研究纳入此书中，姑且一试吧！”

允诺太山先生和英刚兄之后，接下来对我来而言，有两个选择：一是写一本东亚文化、文学交流的书。二是开辟“第二战场”，写一本对自己而言是较新领域的书。因为自己是中文系出身，而且加上近年来的研究对象，多为流传海外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所以用法一相对轻车熟路一些，可谓“我能写”；倘若用法二，则前途未卜，但

书成后，却可以是一本“我想写”之作。打一个略不恰当的比方，法一好似本书第三章提及李勣大破高句丽的长稍步兵方阵，用普鲁塔克记述斯巴达重甲方阵的话，就是：“他们以无隙可乘的阵型向敌阵挺近，没有丝毫犹豫，平静而快乐……”法二则好似本书同一章中，薛仁贵卸铠着白袍，手执重戟，单骑突入高句丽万军之阵的情形。如果前者是“平静而快乐”，那么后者则是“激烈而快乐”。我想，既然是一个30岁的人写一本关大唐的书，当然要用“激烈而快乐”的方式。于是我定下了《炎风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这一书名，书中主线不是文，而是武。在国家、民族之间力的角逐的大背景下，勾勒出唐代东亚的诸种事件。回顾距今千百年之前，唐代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其背后所喻示的是“谁付出与为谁付出”，以及“同谁作战与为谁作战”，至今都有借鉴意义。比利时画家菲利浦·格吕克在其作《猫》中说：“在过去中，包含的未来比现在更多。”其实，对于人类所未知的时间轴而言，过去、未来与现在，到底谁拥有更多？无人可晓。但是我深信，人文学科最后的关怀，绝非象牙塔里面的精微考据，而是回归到对当下和未来的探究。这本小书，也可谓是我利用过去对现在，以及对未来的思考。读者诸君自可于此书中寻之，毋须赘言。

着手写作之后，发现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是真正的平易，太难了。这半年通过写这本小书，我愈发感受到了平常与容易这两个词汇沉甸甸的分量。深邃但不难解的内容，往往受到专业文史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双重欢迎。具有东亚影响力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他每次写好诗后，总要朗诵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所谓“老妪解诗”是也。另一个写作困难就是史料之蒐集。书中每做一论述，每下一判断，虽不必像纯粹学术著作那样使用浩瀚之注释、回顾学术史，等等，然而，如要免俗书之讥，就必须有充足之理据，留心学界最新的成果。大陆的六

朝隋唐史料，自不待言，台版的中古文史典籍，则通过本校周围和京沪的一些相熟旧书肆老板寻访了不少。而海外（尤其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最新的著作，也托请友朋代为购置。书中所配近70幅图，大都选自海外博物馆；或摄自朝鲜半岛唐代古迹；或是由师友提供的稀觏之物。比如，在涉及高句丽好太王之处，就选用了首尔博物馆藏的“广开土王青铜盒”。《兰陵王入阵曲》一章，则有我自己拍摄的奈良春日大社演奏用的龙笛与古谱。如斯种种，希望能给读者在看本书文字的同时，带来一些“读图时代”的轻松。

业师张伯伟先生常教诲我要有文史兼通的视角，细微考据时不忘永恒的人文关怀。本校历史系张学锋老师是治六朝史与东亚史的贤达，手批了小书的全部打印初稿，朱墨灿然，令我感动万分！本校中文系徐兴无老师乃汉唐五经、谶纬之学的大家，他对本书中隋唐“五德历运”的推算给了我启发性的建议。日本南山大学专攻佛经音义与禅宗的梁晓虹教授，对本书涉及佛教史的章节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也就初稿的帝国主义与天下秩序相关问题，多次来函商兑疑义。此外，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陈鸿森先生，将自藏的相关绝版书籍直接航空快寄相赠……诸位师长之高情厚谊，谨记于此。回想半年多前，自己答应余太山先生和孙英刚兄之时，暗自定下的目标是完成一本“通而不俗”的书。书成搁笔，却已是“半折心始”。按照这样的“折扣率”，倘若不落入“俗而不通”之讥，则是我之大幸了。

壬辰龙年腊月初十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武川镇

大漠边缘的武川镇，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城，从6世纪开始却成了掀起中国史甚至是亚欧大陆史的巨大风暴的“中心风眼”。鲜卑族的精锐甲士与铁骑、内地汉族的亡命豪杰与浪人、柔然族的彪悍猛士与降人——在这片不起眼的土地上“混合”成了一股巨大的、改变历史的新力量——北周、隋、唐，三个王朝的开国帝王均出自此土，这恐怕是大江南北许多号称历史名城的城“市”，与这座小“县”城无法比肩的历史遗产吧。

一 唐朝的想象

唐朝、唐代、大唐帝国，这些不同的称呼所代表的时代，或者说上延一点，合称“隋唐世界帝国”的这个时代，是中国史、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为典型、最为重要的一个时代。康熙皇帝游历金陵时，曾经在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前题下了“治隆唐宋”四个大字。其实，超越唐代，是此后很多王朝的梦想之一，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大唐帝国实在是不可复制也难以超越的一个时代。

因为在整个中国史上，严格来看，只有隋唐和蒙元两个时代可以称为“世界帝国”。“世界帝国”这个概念，意大利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用它来形容罗马帝国。世界帝国在亚洲的出现，最早于 1949 年由一位日本学者松



7 世纪“大唐”轩丸瓦，韩国扶余郡出土

本新八郎提出。这其中，元朝的统治阶层可以明确地说，并非汉族，因此近年来国际学界有些学者倾向于将蒙元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中考察；大唐帝国虽然其皇室的血统构成至今犹是一个谜，但却是第一个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中国史上的世界帝国。

再来看看所谓的东亚。

固然，在我们普通中国读书人的感觉中，东亚史这一概念的形成，大多会联想到近代史上，欧洲列强大举进入中国、日本、朝鲜等地的情形，随即浮现出来的记忆，恐怕就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抑或是《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屈辱的史实。不过，本书试图带给读者一个较为不同的视角——大唐帝国统御下的东亚世界的形成。抑或说，中古东亚世界的雏形得以完成，就在隋唐世界帝国。而且，这一时代的东亚史和屈辱二字几乎谈不上有任何瓜葛。

2012 年的干支是壬辰，距今相对较近的，也许有人会想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当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明军出兵援朝抗倭——这亦是用一本书也说不完的话题。不过，初唐的壬辰年（632）同样精彩无比。这一年的 6 月 8 日，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去世；同年，阿拉伯人的倭马亚帝国（中国史书又称白衣大食）建立，随即向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发动了犀利的攻势，兵锋直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东亚方面，同年，朝鲜半岛新罗善德女王即位，积极展开与大唐帝国合作，试图击破宿敌高句丽与百济；同一年，倭国的第一批遣唐使回国，唐太宗派使者与之同行。凡此种种，均令人兴奋不已。似乎都在宣告着作为一个整体，中世的东亚文明圈呈现出一种神奇的微妙联系。诸民族、诸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强化。

历数统一中国的诸王朝（如明、清等），很少有如大唐帝国一样在亚欧大陆文明圈“东极”和“西陲”都大有作为。为了探索大唐帝国及其东亚世界，就要避免用简单的朝代论去理解它，而首先要看一

看大唐帝国的基本构成。举个例子，来看看一组大家耳熟能详的隋唐世界帝国下的中国名人：

宰相：隋高颎（高句丽）；唐长孙无忌（鲜卑拓跋氏），于志宁（鲜卑勿忸于氏），高士廉（慕容鲜卑娄氏），房融、房琯（高车屋引氏），元稹（鲜卑拓跋氏），王珪、王涯（乌丸），刘崇望（匈奴独孤氏），白敏中（龟兹）……

名将：尉迟敬德（吐谷浑）、高仙芝（高句丽）、哥舒翰（突骑施）、李光弼（契丹）、李光进（回纥）、夫蒙灵詧（羌）、浑瑊（铁勒）、黑齿常之（百济）……

文化人：隋音韵学家陆法言（鲜卑步陆孤氏）；唐诗人元结、元稹（鲜卑），白居易（龟兹），刘禹锡（匈奴）；唐古文家独孤及（匈





灞桥出土唐武士俑，西安博物院

奴）；唐经学家啖助（氐）；唐画家尉迟乙僧（吐谷浑）；音乐家隋白明达（龟兹），唐康昆仑（九姓胡）、米嘉荣（九姓胡）；隋技术家宇文恺（匈奴）、何妥（何国胡）；唐名僧窥基（吐谷浑）、慧琳（疏勒胡）、神会（石国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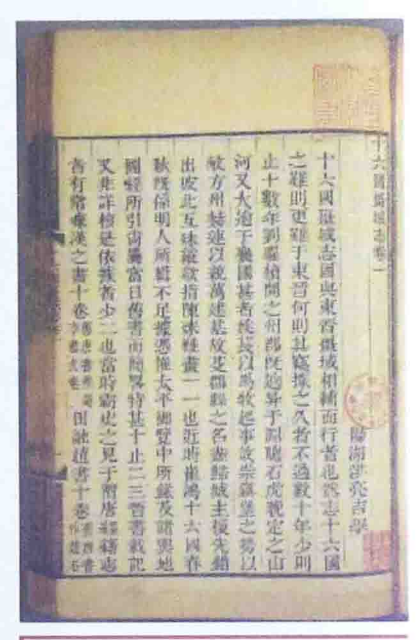
如果将括号里的民族与括号前的大名一起连读，会让不少读者大跌眼镜。若再爬梳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这样的例证会得出更多。是的！构建大唐帝国的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而且，与本书休戚相关的"东亚的中世"（高句丽、百济、新罗、倭等），也与非汉族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对于这些构成大唐帝国的要素，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被以往学者谈论较多；有些则是隐而未发，需要细细审视其脉络。我们可以说，单单从大唐帝国成立的武德元年（618）来考察，大唐帝国与东亚中世的许多瓜葛都无法说清楚。这只能从"中国的中世（中古）"（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这样一个连续的时间轴上去考察。

在学理上，也许有人会反问：各国的文明程度不同，"中国的中世（中古）"等于"东亚的中世"吗？不仅中国人有这样的疑惑，实际上，这一点也正是日本东京学派旗手前田直典向京都学派发起攻击的滥觞。笔者在这本并非纯粹学术书的开首，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书名副标题"东亚的中世"：第一，一个文明圈内的主导国家之文明进程，决定了这一文明圈进程的主节奏；第二，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后汉隋唐》一书结尾说："以日本为例，一方面影响及其古代文化，另一方面同时又赋予其一些中世的性格。"而赋予者，正是大唐帝国。

二 暗黑时代

提起“暗黑”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中世纪史上的“黑暗世纪”（dark ages）。那么，中国史上到底有没有类似的时代呢？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中国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在日、韩等东亚诸国也都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这部小说以史书《三国志》为基盘，讲述开始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纷争。东汉末年伊始，中国陷入了长达约 400 年的四分五裂之命运，这种命运也波及中世东亚的其他国家与民族，如朝鲜半岛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等，姑且将这一时段称之为“暗黑时代”。而再度将中国置于统一时代的隋唐世界帝国，其间统一的过程，是由怎样的方式与怎样的理念构成的呢？

众所周知，三国归于晋，这个晋指西晋（265—316），可惜它统一中国的时间勉强约 20 年，用 20 除以 400，得 5%，可见西晋统一时间之短暂。伴随着西晋皇室内部的乱斗——“八王之乱”，入居长城以南的匈奴人（南匈奴），得到了复兴的机会。304 年，原本隶属成都王司马颖麾下的南匈奴首领刘渊，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独立的序幕，在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东北）举兵反晋。这时，南匈奴人响亮的口号是：

>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

汉代重新一统漠北草原的呼韩邪单于，是匈奴人心目中的英雄。然而，传统的汉族史学家，都把这一时代称之为“五胡乱华”。民族融合的最初阶段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但回顾历史，可在此下一断语：倘若没有五胡之“乱”，也就没有大唐之“盛”。

曾经有人反过来戏称这一时代是“华乱五胡”，这乃是从五胡（匈奴、鲜卑、氐、羯、羌）消亡的视角出发，也略有些过火了，不妨称之为“五胡兴华”比较好。不过，这一“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之曲折与辛酸，即便经历了1600多年后，读之依旧无比沉重。

南匈奴族人共五部，他们起兵时，部族战士不过十余万，但其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了西晋的长安、洛阳。文学史、文化史上提到的“青衣行酒”，就是指国灭后，西晋的怀帝、愍帝，被南匈奴人俘虏至其根据地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匈奴族第二任皇帝刘聪，命令晋怀帝、愍帝穿奴仆之青色衣服，为宴会行酒。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说岳全传》讲到北宋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北而去，总令读者非常懊恼与愤慨，期待英雄岳飞快快登场。若人知五胡十六国事，必会明白类似的事件，原来早在800年前就存在了。

清末康有为《大同书·甲部》专言“帝王之苦”时说：“甚或青衣行酒，凄凉五国之城。”说的就是此事。可惜，两晋之际没有岳飞。西晋的刘琨、祖逖之辈虽有破虏、北伐之心，但无破虏、北伐之力。

西晋灭亡后，一部分皇室和高门贵族流寓到江南，建立了东晋。他们对于中原故地采取了一种放弃姿态，任由五胡种族轮番占据。于

是，中国华北陷入一片大混乱之中。如果把视野拉到同时的欧洲史，正好是罗马帝国末期，欧洲也面临着北方蛮族的入侵，日耳曼民族大举南下，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的情景，很像4世纪的中国华北。罗马时代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著有 *De Germania* 一书，是现存最早一本记载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文献。经学名家马宗霍之子马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把它译成中文，为《日耳曼尼亚志》，可谓是一部欧洲的“五胡生活史”。

匈奴刘氏首先建立的是汉政权，实际延续不过两代。虽然匈奴人也建立了中原式的朝廷，但权力的传承依旧是北亚草原式的强有力者为王。汉政权毁于内乱之后，北中国境内相继崛起的是南匈奴刘曜之前赵（304—329）与羯人石勒之后赵（319—351）。合称“二赵”。

这两位开国皇帝，都可谓是豪杰式的胡族壮士。

传说刘曜身长九尺三寸，生而白眉，须髯长五尺，是一个典型中古时期的“美髯公”，能张弓射穿一寸厚的铁盾。他年轻时在洛阳犯事当诛，于是逃亡至朝鲜，遇大赦方重返中原。五胡时代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与东亚世界有些许联系，于此也可见一斑。

日后刘曜攻下洛阳，将西晋羊皇后拉上自己的卧榻，并且问她：“吾何如司马家儿？”羊皇后的回答，可以羞杀西晋所有的皇室与清谈士大夫：“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此后羊氏大得宠幸，并为刘曜生了三子。羊献容，这一个中国史上唯一一个侍奉过两个朝代帝王的“皇后”级女子，招来了很大的骂名：淫荡、无耻……钱穆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的名著《国史大纲》，对此女此举大骂：“无廉耻气节！”其实，如果联系到匈奴人的婚嫁习俗，这种“重婚”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今天的读者，似乎没有必要对一个柔弱的女子再大肆攻击了。退一万步说，国家上下腐朽之际，若以女人做替罪羊，似乎也不是理由吧？

刘曜在攻打西晋长安时，西晋大将索𬘭偷偷遣儿子出城，谓刘曜曰："倘若许以重赏厚爵，我即献城来降。"刘曜怒，斩其子首，并遣人送回其子首级，说："帝王的军队，以仁义行于天下。我带兵十五年，从来没有用如此诡计。一定是打到敌人无丝毫还手之力，方才算赢。索𬘭说出这样的话，是恶毒之极！若尚有粮草，叫他努力和我打；若兵、粮皆不足抵抗，就当早早投降，何待兵临城下？"一席话让长安汉族将士丧胆，随即晋愍帝就肉袒乘羊车出降了。

但是，这个最早建立政权的南匈奴国家，却并不想回到彻底的塞外草原帝国，而是徘徊于"胡汉之间"。这种徘徊没有出路的感觉，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大唐帝国。在唐之前的五胡十六国及北朝，都为这种调和胡汉、建立新世界帝国的憧憬做出了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呈现出来的却是如海浪般一进一退的艰难的摸索历程。

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疆域超过了汉、前赵，涵盖了今天的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可谓在前秦帝国之前，胡族政权所能达到的最大实际控制版图。有一次在酒宴上，石勒问臣下，自己好比古代哪位君王（这是历代皇帝最喜欢问的问题之一），有谄媚者献言道："您超过了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可比上古的轩辕皇帝啊！"石勒的回答，堪称酣畅淋漓：

> 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

"二刘"就是西汉的汉高祖和东汉的光武帝。这不是简简单单一句羯人之傲语，而是中古中国吹进的一股新风。浑厚的大唐帝国可以

回溯到这股五胡入华最初的豪情呢!

石勒之后，进入了“大赵天王”石虎时代（称“天王”是五胡十六国政权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个低于“皇帝”，但极其微妙的胡族称号，一直到了北朝依旧被使用），其凶残暴虐之程度，大概可以成为五胡君王中的第一名。这位“野蛮人”君王，丝毫没有把人民的疲敝考虑在内。石氏一门皆如此，石虎之子石邃也是荒淫无度，将宫人有姿色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这种变态的心理，会不会令人联想到田汉翻译的王尔德（Oscar Wilde）在1891年写的独幕剧《莎乐美》?

此外，石虎几乎年年月月都对外用兵。就在石虎穷兵黩武的同时，东北方面兴起了鲜卑族慕容氏的强大势力。

胡汉的关系，在石虎去世之后到达最恶劣之程度。石虎的养子，猛将石闵（本是汉族人，姓冉）掌握了部分军权，建立了大魏（350—352，又称冉魏）政权，开始了大逆反般的种族屠杀，号召汉人将都城的羯人全部杀死，甚至一些高鼻卷发的汉人也死于斯役。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斗争，被极度尖锐化了。

政治上的斗争激烈不能阻止农业经济上的融合。今天女士喜欢的美容食品——黄瓜，它的定名就在后赵石氏时代（美国学者劳费尔怀疑石虎时代是否有黄瓜，然无证据），虽然第一次提到它的种植法，是在6世纪初的《齐民要术》中。这种植物原本来自西域，初名叫“胡瓜”，结果在后赵时代，“胡”的地位高于“汉”，而且由于书面语和口语都忌讳说“胡”字，故改名“黄瓜”了。

然而，羯人石氏没有预料到的是，由于石虎的“虎”字，犯了唐太祖李虎的帝讳，所以反而在唐代被称为“石季龙”。季龙，是石虎的字。这些避讳的回环往复之间，也颇有意思。

刘曜、石勒所代表的五胡种族，虽然用兵、破城极其残酷，但相

较于西晋贵族间那种无法治愈的肿瘤病一般的混沌、阴霾，以及那看似高级文明的汉族士大夫之间的阴险奸计，“二赵”无疑让人看到了一丝新时代的曙光，但这一丝微弱的光线，刚产生又随即消亡于无形之中。时代的暗黑依旧笼罩着北中国的大地。

构建大唐帝国的诸多源头中重要的一条，正是那孕育于304年，匈奴族人在山西举兵独立所拉开的“五胡十六国”。虽然，假设以一个唐朝人的视角回顾，这仍然是一个暗黑时代，但是这种暗黑，不正是黎明前所必须经历的吗？

五胡南下，燕（鲜卑）、赵（匈奴、羯）在东；秦（氐、羌）、凉（鲜卑、匈奴）在西，互相乱斗的同时，也与江南对峙。

在南匈奴、羯人之后登场的，是兴起于东北的鲜卑族慕容氏部落。慕容氏首先打败了宇文氏、段氏部落，掌握了东北的主导权，又向东击败了高句丽。那是在慕容皝时代，四万鲜卑劲卒急行军渡过辽河，以生猛的部落军团，直接摧毁了高句丽的都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西），掘开高句丽国王父亲的坟墓，载其尸，并高句丽王妻母珍宝，及男女五万余口回师。

鲜卑慕容部之所以急于先消灭高句丽的势力，是为了稳定其东境，而便于今后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当后赵石虎死后，华北陷入种族屠杀的大混乱，鲜卑慕容部进入中原的机会终于到了。五胡时代新一轮的征服历程开始了。

急速攻下冀州邺城（今河北临漳，时为后赵及冉魏都城），是鲜卑慕容部的首要目标。然而，冉闵虽然是汉人，但久习胡俗，每每亲自出阵，左手执双刃矛，右手执钩戟，胯下骑名马朱龙，顺风击之，一人就斩杀鲜卑勇士三百余人。但他最终寡不敌众，被重重鲜卑骑兵围住，加之朱龙马无故失蹄，被俘斩首。昙花一现的北中国汉族政权，随即又湮灭于胡尘之中。2008 年末，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发掘出了“曹操高陵”，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出土了铭文为“魏武王”的文物。不过，冉闵的谥号也是“魏武悼天王”，故亦有可能为冉闵的陵墓。

后赵彻底消亡之后，华北被两大新势力分割，东边的鲜卑族前燕（337—370），以及西边的氐族前秦（351—

394）。入居中原不久的前燕，同样由于宗室内乱，很快被前秦的卧龙宰相——王猛率军吞并了。

这样，继后赵之后，第二次实现北中国一统的，就是前秦的名君苻坚。他连西域与四川也一举拿下，在即位25年后，苻坚开始着手征服江南，当然，这遇到了很多臣下的反对。有一次他与名僧释道安同辇。释道安被鸠摩罗什称为“东方圣人”，这次也规劝苻坚不要劳师远征，苻坚十分坚定地回答道：“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

固然，此后的淝水之战让氐族人一败涂地，并让南北分裂的局势再度延长。笔者有时在课堂上会心血来潮，问一问自己的学生：“假设你当时立于苻坚的朝廷之上，你会如王猛、释道安般地劝阻苻坚吗？”大家的回答，90%以上都一定说：“是！”包括笔者自己，恐怕也会力谏其不出兵江南。

这种后见之明有其可以理解之处，但我们如果抱着一颗“了解之同情”的心去体谅苻坚，大致可以明白他为何要一意孤行。因为，同时领有地理中心与文化中心的西晋，在4世纪初被南匈奴人攻灭后，汉族皇室与高门退守江南，仍自认为文化中心在斯；胡族（南匈奴、羯、鲜卑、氐）虽然轮番占据了地理中心（长安、洛阳），倘若不能再次将两个中心合二为一，则无法被后世承认为正统。抱着这种理想，苻坚开始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征服之役。实际上，再度完成两个中心合拢的理想，一直要等



“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中国国家博物馆

到隋文帝杨坚，虽然他们名字中都带一个“坚”字，但前后相隔了近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南北各自慢慢孕育着形成新世界帝国的力量。

淝水之战后，华北再次陷入了鲜卑、羌、匈奴等国家的群殴乱斗中。这些胡族国家的短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于拥有部族军队的宗室之内乱。吊诡的是，这种部族战斗团体，又无一例外在建国初期发生过巨大作用。可以说，五胡政权具备的那种汉族所没有的战斗威力，同时也是一种最终毁灭自身的破坏力，好似一把异常锋利的双刃剑。胡汉的二元世界，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书桌前畅想十六国的情形，最有力的史料是基于《十六国春秋》的《晋书·载记》。在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后诞生的隋唐王朝，正是成功统合了胡汉双重社会的大帝国。因此，在大唐帝国时代撰修了关于五胡十六国的最重要之史料《晋书·载记》，并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唐代史官，不论是与前面的汉朝，抑或后面的宋朝同行们相比，其对于胡人的世界，可谓充满了“了解之同情”。

四 新势力的登场

1980年7月30日，呼伦贝尔文物管理站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443）的石刻祝文，共19行201字，讲述的是五胡中最后一支向南越过长城的鲜卑拓跋部之早期历史。石刻祝文为汉字魏体，古朴苍然。所谓太平真君，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段石刻记载，与传世史籍《魏书·礼志》的文字大体吻合。

五胡部族纷纷南下，最后一支踏入中原大地，最终拿走了盘中所有美食的，却是鲜卑拓跋部。

如果再把视线拉到平行的欧洲史上，恰好类似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下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原是西日耳曼的一个部落，4至5世纪南下后，成为日耳曼诸国中的强者。但是，与墨洛温王朝开启了欧洲黑暗中世纪不同的是，北魏却让中国土地上的所有人看到了形成新世界帝国的曙光！

鲜卑所建立的国家，从代（315—376）至北魏（386—534），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皇权强化与部落解散的趋势。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道武帝拓跋珪，他断然实行了部族解散的改革措施，以往统领部族的君长大人，一应被纳入国家的皇权之下。事实上，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其中还有往复的情形，比如从代国到北魏过程中被前秦灭国的十年隐忍期。





北魏“骧将军”印，上海博物馆

对于鲜卑拓跋部来说，具有入主中原决定性意义的一役，是395年在

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东北）大败同为鲜卑族的慕容氏后燕。此后，拓跋珪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笼络了华北第一流高门崔氏等汉人士大夫。依靠谋臣崔浩的睿智加上鲜卑骑兵的勇猛，北魏依次攻破了柔然、夏（匈奴）、西秦（鲜卑）、北燕（汉族）、北凉（匈奴）、鄯善、焉耆、龟兹……其中，439 年，北魏灭北凉，实现了中原近百年不遇的再统一，所谓的北朝于斯成立。此后，拓跋焘对汉族王室的南朝虎视眈眈，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北魏，一度将兵锋直指扬子江北岸。北魏从诞生开始，似乎就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南北中国最终的统治者。

随着国家的稳定，拓跋焘开始禁止游牧民自由移动，规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定居。这样就再次强化了汉族式的皇权。似乎胡汉二元的世界，终于走向了完美的调和。



北魏武士俑，偃师商城博物馆

但是，至今令史学家困惑不已的是，功高无比的崔浩却因为修国史事件，被一门族杀。这事件牵涉几乎所有的华北汉族高门。虽然历来有诸多种解读的方式，但这可说是胡汉二元世界在走向崭新的一元化过程中的剧烈阵痛。

此后，汉族士大夫向鲜卑皇室提出的均田制、三长制等，均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其中，体现了包括民族、阶层在内的、全面的平等原则与贤才原则，无疑对此前汉族的九品中正制是巨大的反动。后来隋代兴起的科举制，多少都可以从北魏这里找到影子。

北魏中后期登场的转折性人物是孝文帝拓跋宏，他将胡汉一元化的努力措施激烈地推行下去。值得一提的不仅是他迁都洛阳、禁胡服、说汉语等，还有“定姓族诏”——将鲜卑等胡族贵酋，纳入汉族式的六朝贵族制中。

比如规定汉族第一级为“四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有时还加上赵郡李氏，成“五姓”；对应的胡族第一级为“八姓”：穆氏（丘穆棱）、陆氏（步六孤）、贺氏（贺赖）、刘氏（独孤）、楼氏（贺楼）、于氏（忽忸于）、嵇氏（纥奚）、尉氏（尉迟）。括号内的原本是鲜卑复姓，后一律改为汉式的单姓。这“四姓”和“八姓”可以和帝室通婚，享有莫大的荣誉。这一直影响到了此后的大唐帝国，比如唐传奇《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郑生，就是荥阳公的儿子；又比如《古镜记》，就与太原王氏有密切联系。

简而言之，孝文帝就是企图将胡汉二元化，一统于汉族式的贵族制，这既不同于五胡十六国初期的胡汉分离制，也不同于早期秦汉帝国的胡汉差别制（“内”中国而“外”夷狄）。就这样，令人振奋的似乎离建立新世界帝国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是，孝文帝仅仅 33 岁，就病逝于南征萧齐之役中。他力图将胡汉二元世界整合成新的中华式帝国的努力，在他死后，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反弹。这种反弹的激烈程度，一如当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激烈，甚至用悲剧二字来形容它亦不过分。

让我们把叙述的视角，略微回溯一下。在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之前，呈弧状分布而拱卫旧都平城的，是位于其北方，今内蒙古境内的“六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所谓镇，是不同于州、郡等普通行政区域的特别军事区，同时也是北魏帝国北方的前线基地。在镇里面，驻扎着鲜卑族的嫡系子弟部队，以及融合于胡族的北方汉人。

其中，我们要详细说一下武川镇。武川镇位于黄河倒 U 字形大拐弯的东北方，也是阴山山脉的北麓。现今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武川县，据说境内至今还有蒙恬建筑的秦长城遗迹。这里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直通向戈壁的深处。此地年平均气温只有 3℃，夏天，滚热的沙尘铺天盖地，冬天的最低气温一度超过零下 30℃。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为了生存与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一种帝都洛阳所无法想象的安全共同体，休戚与共，坚不可摧。

如前所述，原本出任六镇军士的大多是鲜卑族的嫡系部队，因为能够担任六镇卫士，绝对是一种光荣。但是，随着迁都洛阳，旧都平城渐渐被遗忘，原本担任第一线防卫重任的六镇将士，地位也慢慢下降，最终沦落为与发配边疆的囚徒一样。不满、愤怒、怨恨的情绪，在六镇军民中急速堆积着。

六镇之乱的反旗，是由沃野镇的将士——破落韩拔陵扛起的。从他的名字看，是南匈奴的后裔。熊熊燃烧的愤怒火焰，一下子几乎燃遍北魏所有的州郡。汉化了的洛阳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镇压六镇的起义。于是，世居北秀容（今山西朔州）的契胡大酋长尔朱荣，自行组织了强大的契胡骑兵，在镇压了起义的同时，也把持了北魏的朝政。据精通北族研究的马来西亚学者卓鸿泽氏考证，契胡是与鲜卑关系密切的一支种族。尔朱荣进入洛阳后，抓住太后和小皇帝，将他们投入滚滚的黄河，接着又屠杀了朝臣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这也可以同六镇之乱一样，解读为胡族对于汉化政策的深深不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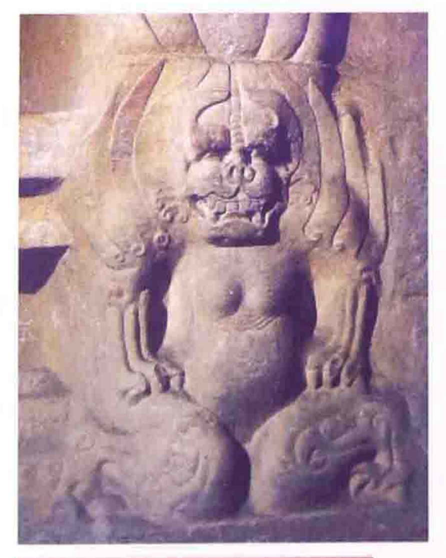
孝文帝汉化改革，在他去世之后不到 30 年，北魏即在剧烈的变动中瓦解了，因此清乾隆帝深以为，孝文帝是一个不孝之人。但这或许就是在期待能够统和胡汉二元世界的新势力出现前夜的必经之途吧！

继尔朱荣之后，两个巨大的阴谋家登场了：怀朔镇的高欢与武川

镇的宇文泰。

高欢，虽然有一个汉式的姓名，但应该是鲜卑系。而且高欢自己也有一个鲜卑姓名——贺六浑。他率领被契胡镇压的原六镇叛民约二十万人，揭竿自立。同时，高欢还颇有心计地利用了汉人贵族与契胡的仇恨，拉拢了一大批汉族名门。高欢将北魏皇族子弟元善见拉至邺城，建立了东魏（534—550）。这个被拥立的东魏皇帝，不久后就禅位给了高欢的儿子高洋，即北齐（550—577）。然而不久之后，当初锐意调和胡汉的北齐，很快也走上了变质的老路，帝王与门阀贵族勾结，不再理会一般胡汉民众之疾苦。最后能够期待的新势力，就只剩下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了。

宇文泰，是鲜卑化了的匈奴人，其势力主要来自武川镇的胡族将士。他退至关中，拥立北魏另一位皇族子弟元宝炬建立了西魏（535—556）。最引人注目的是，宇文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府兵制，将武川镇的胡族将士作为主体，融入关中的贵族势力，分为二十四军。核心层由八柱国大将军把持，和宇文泰一样，同属武川镇出身的大将军占了绝大多数。同时，利用诸如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大力提倡贤才主义，罢黜以往的门阀主义。据说，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的祖型，就可以一直追溯到西魏。宇文泰死后的第二年，北周（556—581）成立。在北周政权的前期，宇文泰的儿子并没有使用“皇帝”，而是依旧使用了五胡十六国时代流行的“天王”称号，这颇值得注意。



北齐怪兽，邯郸市响堂山石窟

当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帝

都洛阳，到了东西魏分裂之后，已是荆棘荒野之地，到处是狐狸的巢穴，让人无法想象此前的繁华与荣光。一位叫作杨衒之的北魏旧臣，见到旧都之满目疮痍，忍不住写下了千古名作《洛阳伽蓝记》。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和宇文泰一样出自武川镇；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也是出自武川镇。隋唐两帝室的先人，同为“柱国大将军”。更有意思的是，杨家有一个鲜卑名“普六茹氏”，李家也有一个鲜卑名“大野氏”。漠北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的胡汉混合军镇，居然连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陈寅恪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关陇集团”，所谓“关陇”，是指渭水盆地一带的关中地区，以及李唐自称陇西成纪等地。但是其源头，应该是远在渭水之北的武川。

在隋唐时代，对内、对外（东亚、西亚）之政策，做出决定性策略的，正是这些“武川—关陇”集团的上层成员。

这样一来，统合胡汉的新势力，缔造了一个统合胡汉的新国家。

西魏、北周一开始的实力并不如东魏、北齐，但宇文泰断然与门阀旧制度一刀两断，向贤才主义靠拢，使得优秀的人才，不论是贵族庶民，也不论是鲜卑匈奴，还是汉人，都得到了较为均等的入仕机会。有趣的是，在所谓的“后三国时代”——北齐、北周、梁陈鼎立的情况下，文化上处于最偏僻的北周，却孕育出了产生下一个伟大时代——大唐帝国——最直接的种子。

从五胡入华开始，匈奴、鲜卑、氐、羯、羌轮番给奄奄一息的旧中华帝国注入了大量的强心剂，最后终于在西魏、北周那里，完美地统合了胡汉二元世界，勃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崭新的帝国——大唐帝国应运而生。名君唐太宗曾经对侍臣说过：

> 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

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如一”的思想，可以视作北朝至大唐帝国时代总体的心理，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为大唐帝国在东亚世界展开华丽篇章的功臣里面，就有突厥人、契丹人、铁勒人等。



唐“帝王狩猎纹”银皿，波斯萨珊朝，日本个人藏

对于内部业已整备完成的大唐帝国来说，急切地飞向世界帝国，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也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新渴望。三国以来对外发展几乎停滞的时代宣告结束。伴随着中国进入中世的黄金时代——大唐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的倭马亚帝国同样进入亚欧大陆大角逐的时代，东西世界两相竞赛的时代让人兴奋不已。但本书要暂时按捺住读者“向西看”的冲动，和大家一起“向东看”。因为此时，东亚诸民族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因与黄金时代的中国相接触，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其间的角逐同样精彩无比。遥想当年，当新罗的朝贡使团、日本的遣唐使漫步在长安街头，看到酒肆中，那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撒马尔罕的胡姬，不知他们心中是怎样的感受啊？



第二章

炎凤凰

杨坚，在北周武帝之后登上了这一鲜卑帝国的帝座，改国号为“隋”，其国运依照五德为火，瑞兽为凤凰。高句丽国王对于亚欧大陆的新霸主——隋，一面假惺惺地上表称臣“辽东粪土之臣高元昧死上表”，一面却徘徊观望，伺机扩充实力。与父亲杨坚性格截然相反的隋炀帝杨广得知高句丽竟然越境与早已臣服于自己的突厥可汗交接，无法忍受高句丽的不臣之举，决计挥师东进。而这一举措就如导火索，将把隋王朝和他自己焚烧殆尽，真真切切、名副其实地变成一只“炎凤凰”。

一 五德瑞祥

上元三年（676）十一月一日，有人上言："宛丘县凤凰集，众鸟数万，前后翔从，行列齐整，色别为群。"于是，两天之后，即十一月三日，唐高宗将"上元"改元为"仪凤"。

凤凰对应的五行是火，炎凤凰，又可称之为炎凤。在《尔雅》这部字书的注释中，对凤凰的描述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西方古代神话传统里面，有类似的菲尼克司（Phoenix），它的诞生与西方炼金术有很深的渊源。菲尼克司与中国古代的凤凰有一个最大的共同属性，即是火。

中国古代政治话语里面，有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五德终始说。这颇为复杂，还涉及"王朝革命"。最早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革命的必然性和王朝的循环性提供了学说支持。所谓"五德终始"，是由战国的邹衍提出的。虽然具体内容极其繁博，但与中古史密切相关的大致推定有二："五行相生"（木火土金水，前者"生"后者，如木生火）与"五行相胜（克）"（土木金火水，后者"克"前者，如木克土）。从汉魏一直到隋代，王朝的更替，不论实际是暴力革命还是禅让革命，基本使用的是"五行相生"说。

东汉（火）→曹魏（土）→两晋（金）→刘宋（水）→萧齐（木）→梁（火）→陈（土）→隋（火）==唐（土）

明眼的读者可能会很快发现两个问题：第一，这其中

在两晋之后，以下均为南朝一系，而缺少了我们上一章分析的五胡十六国北朝一系。这是因为五胡十六国北朝的“五德”传承更加复杂，而且此后兴起的“正统论”并不将其视为中国王朝的正统。所以在这里就姑且从略，今后也许可以专成一文讨论。第二，唐代为“土德”，略有些复杂，表面看也是采用的“五行相生”，以绍隋之“火德”自居。但其实唐以隋为“闰统”——不居正统之义，即唐自称上绍周、汉，魏晋以下皆为“闰统”，从上面列举可知，汉为“火德”，火生土也。唐的“土德”，虽然细分还有前后期之别，但大致说来，就是直接承自前一个统一帝国——汉（唐玄宗时正式下诏以“唐”承“汉”，故唐诗中多称玄宗为汉皇）。故，笔者用了区别于“→”的“==”符号。详细情况，请看下表：

王朝更替与五行相生关系表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德	礼	仁	义	智	信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兽	青龙	朱雀	黄麟	白虎	玄武
五麟	聳孤	炎驹	麒麟	索冥	角端
五龙	青龙	赤龙	黄龙	白龙	黑龙
中古王朝	萧齐	汉、梁、隋	魏、陈、唐	晋	刘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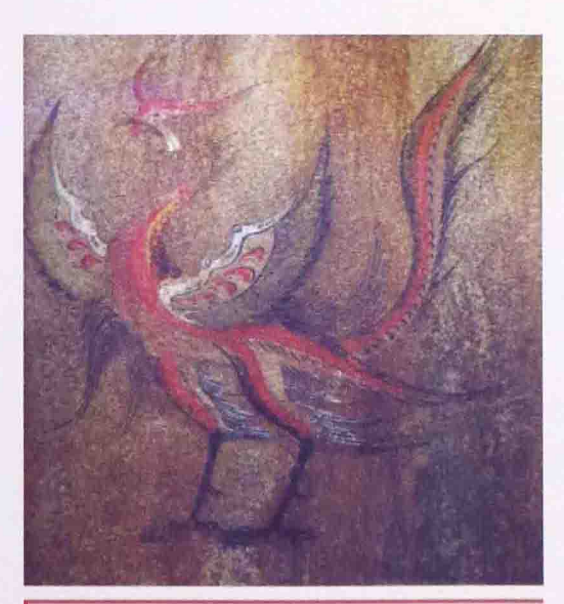
从上表可知，每一个王朝都对应一个“金木水火土”的德行，终而复始，而五德又和众多的信息一一对应，比如“五方”、“五兽”等。加上2012年是壬辰龙年，所以还特意多加了“五龙”一栏。

据表中的纵列，如汉、梁、隋等王朝对应的五兽就是朱雀，从火，火的德对应为仁。与黄巾起义有渊源的一部书《太平经》，其中

就有一句："火能化四行。"意思是火德能化其他四德，这种变化的内在力量，无疑来自于火德的核心——仁——使木变成灰，使金变柔软，使土变坚实，使水变温和。

仁鸟、瑞鸟，即是通俗说的火凤凰——炎凤。那么，疑问来了，隋代也尚炎凤没有问题，唐代却应该是黄麟啊！为什么这一节一开始，笔者会提到改元仪凤的事情呢？这就和五兽本身有关了，因为凤凰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祥瑞之兆，任何时代出现，都被视为美好的象征。尤其在中古时代，整个东亚世界都特别喜欢这一传说中的瑞鸟，它出现在高句丽的壁画、平安日本的宫殿塑像中。直到今天，日元面值最大的 10000 元上，还印有宇治平等院凤凰堂的凤凰像。平等院的历史，应该溯源到北宋仁宗时代。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存有一份珍贵的唐代旧钞本《天地瑞祥志》的影写件。在卷十八的第一条，就是"凤凰"。在此援引几句："其性仁也。雄曰凤，雌曰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也。"又说："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太安宁。"



高句丽江西中墓"炎凤"壁画图，韩国平安南道江西郡

炎凤只有在治世才出现，倘若乱世，必隐而不出。最有名的典故，是《论语》里面楚狂对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言下之意，这样的乱世，你孔子还出来干嘛？孔子自己也感慨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

矣夫！”

这里“河不出图”，指的是传说中，伏羲看到黄河里面的龙马背上之图，这和炎凤一样，是圣人降临的瑞兆，可惜，炎凤、龙马，孔子都没有看到，他是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导师。



《续修正仓院古文书别集第四十八卷》之手绘唐代四神（缺白虎）

其实世界各地，尤其是帝王将相对于祥瑞都有共同反应。比如罗马史公元前44年的彗星出现，就认为与稍后的三巨头之一的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被暗杀有关。

对于炎凤这样的瑞鸟，哪位帝王闻之不喜呢？特别是唐高宗身边还有一位强权女性则天武后。凤凰的到来，无疑说明了他们夫妇“合作”的成功吧？而东亚世界，也不仅仅是大唐帝国相信福瑞之兆，新罗、倭国都这样。《日本书纪》在推古天皇十年，有百济一位和尚献上“天文地理及遁甲方术之书”，大受欢迎。可见，中国思想对于朝鲜半岛、日本影响之深远。

大唐帝国的东亚世界虽然也有残酷的战争，不过，炎凤的仁的特质是其主流。

二 海东新世界

381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东亚同时存在着汉族的流寓政权东晋、氐族建立的前秦、新罗、高句丽、百济及倭国。

如上一章所指出，纵观五胡十六国史，前秦建元年间是罕有的安宁时期，志在统一天下的苻坚，在这一年接待了来自朝鲜半岛朝贡的新罗使者，朝鲜最早的一部史书——《三国史记》的记载如下：

> （新罗）遣卫头入符（苻）秦，贡方物。符（苻）坚问卫头曰："卿言海东之事，与古不同何耶？"卫头曰："亦犹中国时代变革，名号改易，今焉得同。"

苻坚隐约感觉到，以他所处时代为代表的"海东"关系已经不同于"古"，一些新的因素与新的变化让他感到疑惑。显然，新罗使者卫头仅仅从时代变革、名号改易的角度去解释，并不能让苻坚满意。

古文中的"海东"，部分与本书的"东亚"相吻合。"东亚"这一概念在广义的范围内应该包括东亚大陆、西太平洋岛链或花彩列岛（Festoon Islands）以及朝鲜半岛，此外，还有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以及地理学上从属东南亚的越南（越南在文化上从属东亚汉文明的卫星文明）等地。狭义上来说，指帕米尔（Pamir）高原以东地区，它以北纬40度为界，有时与早期西方学者的"极东"称呼一致。

在这里，几千年来重复着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不过，笔者以为冲突有广义的冲突和狭义的冲突之区别。广义的冲突自然应该包括文化的交流在其中。




唐鎏金熊纹、凤纹六曲银盘，陕西历史博物馆

需要说明的是，世界史中的欧洲史、西亚史以及东亚史，并非独立发展。在所谓先进国与后进国的称谓上，也并非一成不变。欧洲史上的日耳曼民族，起初被视为未开化民族，但史学家兰克却认为日耳曼的节俭、忠诚，与罗马帝国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同理，史籍所载亚洲东北部号为“夷狄”的诸民族，亦是全球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

下面从延长线上，考察一下六朝至隋、大唐帝国的海东的新世界。海东世界在这一时期很复杂。

大致对应中国的汉魏、六朝、隋唐三大段，朝鲜半岛经历了：初期“古朝鲜”时代，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

第三个“统一新罗时代”留待后章再详谈，首先来看前两者。

“古朝鲜”时代

“朝鲜”这一称呼，最早见于战国末年编纂的《管子》一书中。具体来说，“朝鲜”这一称呼可以涵盖古代的檀君、箕子、卫氏三个时段。第一个其实是神话时代，第二个则可以称为传说时代。檀君是

朝鲜本土的祖始与神灵，而箕子则是中国商代的贤人，据《史记》的说法，他晚年跑到了朝鲜，并教化那里的人，成为他们的君王。可以说，前两者分别代表了早期朝鲜人的两大思潮。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读书班，曾经研读过一份叫《海东要览》的古文献，对前两大思想有分析。据说，蒙古人大举进攻朝鲜半岛时，高丽组织的民兵抗击外敌，利用的就是本土的檀君思想；而当年大唐帝国治下的统一新罗时代，由于崇尚儒教，箕子思想风行一时。虽然这里不能一言而尽，但这确实是研究东亚古代思想史的好素材。

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今天均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了。可以详细考察的，是卫氏朝鲜，其种族源流，大约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濊貊种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种之结合体。

卫氏朝鲜的首领，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亡命者卫满。当汉朝统一中国后，卫满率领千余人逃至朝鲜，自立为王。卫氏朝鲜大约在汉惠帝时期逐渐强大。朝鲜半岛东南部的韩、濊等小部落国家群受到其压迫，在汉武帝时期不断上诉。汉武帝在处理完匈奴问题之后，于元封三年（前 108）出兵灭卫氏朝鲜，在其旧地设置朝鲜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实现了东亚史上第一次对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几百年后，不论是暴君隋炀帝还是名君唐太宗，他们出兵高句丽的共同理由都是朝鲜在汉代就是我们的郡县。

三国时代

所谓“三国”，不是《三国志》的魏、蜀、吴，而是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在横向时间轴上，同时于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存在的政权。

首先，再次提一下东汉末年，这是第一次东亚世界体系崩溃的前夜。三国分裂时代，辽东的公孙家族持续几代经营辽东地区，是一个

半独立的政权，并与朝鲜三国最早登场的高句丽发生了联系。公孙氏与高句丽对于曹魏和孙权，都采取首尾两端的政策。随着诸葛亮的去世，曹魏将精锐部队东调，由司马懿一举击破公孙氏政权，随即又派毌丘俭打败高句丽。



高句丽“广开土王”青铜盒，首尔博物馆

高句丽的社会形态，“种田养蚕，略同中国”，但是有几条法律很严酷，即守城降敌，临阵败北的行为，均斩首。后来隋唐帝国屡次征东，遇到高句丽顽强的抵抗，与此不无关联。高句丽民间信奉的神灵有：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可汗神也许是因为他们北接契丹等民族之故，而箕子神则代表了一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高句丽的再度崛起，要等到中国的五胡十六国时代。面对北方的鲜卑慕容氏前燕政权，高句丽采取的方略是南下，今存吉林省集安市的“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之碑文，很好地说明了当时朝鲜半岛之战略局势。1884 年，一名做谍报工作的日本陆军炮兵大尉，获得了这份碑文的拓本，由此被整个东亚学界所熟知。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所记载，清末如吴大澂等金石学家都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现在，东京博物馆还藏有这个拓本的墨水廓填本。1988 年，朝鲜古代史研究的专家武田幸男出版了《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今天在日本的旧书肆也是罕见之书了。此书系统讨论了这一古碑在东亚三国流传的诸多拓本。

随着高句丽的南下，三国时代另外两国百济、新罗，也逐渐登



（梁）萧绎《职贡图》“百济国使”与“波斯国使”，中国历史博物馆

场。百济，对于东亚国际文化的交流，作用非常大，尤其对于日本国家的形成，佛教、儒教的东传，甚至是政治制度，美术雕刻的开发，都有异常重要的作用。百济都城在慰礼城（今韩国京畿道河南），根据百济的立国神话，其始祖是高句丽始祖之子，故而《旧唐书》说：“（百济）凡诸赋税及风土所产，多与高丽同。”《三国志·东夷传》载，百济原是马韩五十四国（邑落联盟）之一，后发展壮大，掩有整个马韩之地。“百济”二字，有确切史料可考的是《晋书·帝纪》咸安二年（372），遣使来东晋朝贡之记载，其后，百济多次遣使东晋及南朝，百济佛教就是由东晋传入的。

新罗的开发时代则晚于高句丽、百济。《旧唐书》说新罗“其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好祭山神”。初期的新罗是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一个农耕社会共同体，核心地带是月城郡（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新罗的开国传说也是典型的从天而降的“卵生”神人，娶了在“鸡龙”的女子。所以今天韩国生产一种名酒，

叫“鸡龙百日酒”，酒很醇，不如白酒刚烈，也不像日本的清酒淡雅。酒瓶呢，则照出土的文物“鸡龙”瓷瓶模铸，古色古香。唐高宗册封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恐怕和该国的开国神话有密切关联吧。

实际上，当晋朝的控制力在东北亚逐渐消弱时，东北的霸主头衔首先在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前燕与高句丽之间角逐，永嘉之乱后直到南北朝时代，中国不论是北朝还是南朝，对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包括新罗），几乎都没有真正关心的余力了。

失去了中国中央王朝的实际制衡力量后，高句丽等三国之间就展开了乱斗，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时代相近的五胡十六国。

339 年，前燕慕容皝讨伐高句丽，破其都城。

346 年，百济近肖古王立。

355 年，高句丽向前燕朝贡。

369 年，高句丽攻百济，败北。

370 年，苻坚灭前燕，慕容评逃亡高句丽。

371 年，百济因军事需要移都汉山，此为百济“汉城期”。

377 年，新罗与高句丽一起向前秦朝贡。

382 年，新罗王楼寒向前秦进献美女。

384 年，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入百济传佛法。

391 年，高句丽广开土王立。

392 年，新罗送质子于高句丽。同年，高句丽攻百济，占其十余城。

400 年，高句丽广开土王率步骑五万，帮助新罗抗击倭军。

402 年，新罗通好倭国。

404 年，高句丽攻后燕。

408 年，高句丽与后燕修好。

427 年，高句丽移都平壤。

436 年，北燕不敌北魏，国君冯弘逃入高句丽。

438 年，高句丽杀冯弘。

450 年，新罗杀高句丽边将。高句丽侵入新罗西境。

455 年，高句丽讨伐百济。新罗出救兵。

463 年，倭人侵新罗。

472 年，百济请北魏出兵高句丽，北魏不应。

475 年，高句丽攻陷百济慰礼城，百济迁都熊津，是为百济“熊津期”。

490 年，北魏数十万骑攻百济。

495 年，高句丽围百济雉壤城，新罗救之。

496 年，高句丽讨新罗。

503 年，新罗正式定国号，称王。百济遣使大和朝廷。

517 年，新罗置兵部。

528 年，新罗始行佛法。

536 年，新罗始用年号“建元”。

538 年，百济迁都泗沘（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此为“泗沘期”。

540 年，新罗真兴王即位。

548 年，高句丽讨百济，新罗救之。

551 年，新罗攻拔高句丽十郡。

552 年，百济王先攻高句丽，进军至平壤；后高句丽联合新罗反攻百济。

554 年，百济王讨新罗管山城，百济王败死。高句丽攻百济熊川城。

561 年，新罗真兴王立《巡狩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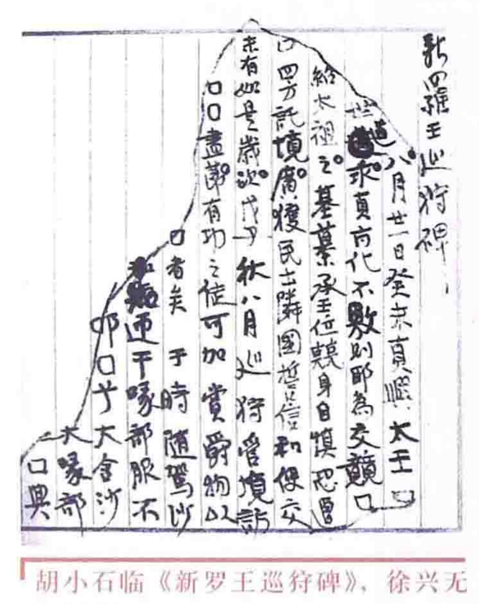
565 年，北齐敕封新罗乐浪郡公、新罗王。

……

589 年，隋朝统一天下。

以上的纪事主要梳理自中国正史以及《三国史记》等朝鲜典籍，

虽然有些记载，如北魏伐百济之事，韩昇教授就怀疑过是百济的吹嘘，但大致上还是可以看出朝鲜三国的发展脉络。固然，这几百年中尚有很多未列入上表的重要事件，但仅从所列可知，伴随着混乱的半岛局势，有几个倾向非常引人注意：即三国之中，高句丽实力属最强，从其迁都的轨迹来看，高句丽对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兴趣愈发浓厚；新罗虽然是国家成形最晚的一个，但实力上升急速。这一实力当然包括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后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把《新罗王巡狩碑》归为“神品”。



胡小石临《新罗王巡狩碑》，徐兴无老师提供

前秦帝王苻坚敏锐地感觉到了海东世界的不同，但就在他向新罗使者提问的两年后，便亲自从长安出发，率戎卒 60 余万，骑 27 万，怀着“平一六合”的憧憬南下与东晋决战，此战之结果虽然毋庸赘述，但对于匹马败北的苻坚来说，生命中剩余的最后时间已经永远不再可能让他来思考或是解答海东新世界的疑惑了。

最后统一半岛的新罗，一开始对于佛教有过排斥，随即于 528 年在全国范围内颁行佛法。至今还留下了大量的遗迹，比如始建于 553 年的皇龙寺，14 年后方才竣工，由今日残存的巨大石基可以推想，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丝毫不亚于北朝的佛寺建筑。海东的新世界就在这么一个看似混乱的时代中，逐步地成形、发展、成熟。但是，其成熟，却是伴随着佛教的“末法”时代的降临。那么，何为“末法”呢？

三 末法期的降临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对于时间的理解，中国早期的本土思想中，也有浓厚的相对时间观念，好比《庄子》中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一般的解释都从贬义色彩去考虑，如“目光短浅”、“见识孤陋”云云，但实际上《庄子》这一句后云：“笃于时也。”这里面并没有多少讥笑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朴素的“相对时间论”。或许博学的爱因斯坦也看过英译本的《庄子》受到启发？亦未可知呢。

而佛教中关于时间的描述，则更为精微。按照佛教的解释，在释迦入灭之后，约可分为三大时期（three ages of Buddhism）：正法期、像法期、末法期。虽然关于释迦牟尼入灭的时间推算不一，导致三个时期的准确时间在佛教各派中尚未统一说辞，不过大抵可以认为：正法期（the true Daharma age）——“千年”（1000 年），像法期（the imitation Daharma age）——“千年”（1000 年），末法期（the last Daharma age）——“万年尽未来际”（超过 10000 年）。这本是纪元前印度对于正法灭尽的忧虑，随着六朝时代大量佛经的译出，也引起了中国有心者的注意。但他们的分期法不同，如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有云：“然佛所说，我灭度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义如此。”就把第一正法期规限为 500 年。末法思想的典籍根据，主要是那连提耶舍在邺城译出的《大集月藏经》，特别是里面的《法灭尽品》，译书时间是 556 年，即北齐天保七年。

所谓“正法”，是指佛教（教）、修行（行）、果报（证）三者齐整的时代；“像法”指证已不存，只有教与行；而最后一期的“末法”（梵语，saddharma-vipralopa）

尤其引人注意，指行与证皆不存，只有教的时代。接着到了最后，连教也不存之时，就是所谓的“法灭尽”时期。在佛法完全消失之后，类似于基督教救世主色彩的、重新拯救全人类的，则是弥勒佛降生。力阐这一思想的，正是《大般涅槃经》(简称《涅槃经》)。今广州南越王博物馆还藏有一份“隋代《大般涅槃经》写本”，可以证明在六朝后期至隋唐，这一思想在社会上的流行。

大略说来，末法之说自北齐时代即已盛行。六朝后期陈代的慧思，于《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自记生于末法第八十二年，并书写金字《般若经》等，誓传至弥勒佛之世，就是一种在末法期的苦难等待吧！慧思后来被尊为天台宗的祖师。隋代僧人信行倡导“三阶教”，以正法为第一阶、像法为第二阶、末法为第三阶，认为于末法时当修普法。唐代道绰、善导等人亦谓当时已入末法，而主张“时教相应”之必要，并劝时人当以忏悔念佛为事。日本方面，源信、源空诸师亦皆鼓吹末法思想，尤以日莲宗为最力，今日犹然。

《涅槃经》梵语是 Mahāparinirvāṇa Sūtra，涅槃本身的意思为灭、寂灭、不寂不灭。炎凤凰与涅槃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北京大学季

高丽绀纸银字《阿弥陀经》，日本京都宝积寺

羡林译印度作品《罗摩衍那》，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便是此意。年轻的郭沫若在民国年间留学日本，有感于旧中国的腐败与落后，痛切希望祖国能像凤凰一样，于烈火中得到重生，于是写下了名篇《凤凰涅槃》，过了近一百年后再来读它，依旧有强烈的震撼力。

总之，所谓正法与像法，本是印度佛教固有的思想，而末法期的思想，大致在中国六朝时代，由印度发源，并迅速传入中国，也影响到了东亚诸国，比如入唐八家之一的日本僧人最澄，据说也有一部《末法灯明记》。伴随着末法时代的到来，利用弥勒佛思想进行起义的事件，在北朝至隋唐时代多有发生。

佛教史上有"三武灭佛"之说，除却第一次的北魏太武帝外，差不多都是发生在末法思想盛行的时代中，具体来说，即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因为这三位力压佛教的帝王，他们名号中都带一个"武"，故有"三武"之合称。从第二次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开始，末法思想已经传播开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的近百年间，佛教则再次复兴。

有意思的是，北周武帝曾经对一位还俗僧说过：

> 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仅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这位有着鲜卑族血统的帝王，居然说自己"朕非五胡"，可见是有心做个中原式的传统帝王了。只不过这位北周武帝在率军抗击突厥时，急病而死，其继承者又重新尊奉佛法。随后，代北周而起的隋王朝，也是意欲复兴佛教，之后到盛唐，佛法得以大盛。

相对于北周来说，北齐不仅经历了末法，也很快体验到了亡国的

痛苦。为了拯救末法，佛教徒们在中国东部发展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三阶教、净土宗的兴起。北齐的著名僧人灵裕，开始在河南省宝山石窟刻《大集月藏经》。隋代大业年间，又有静琬在今北京西南郊区的房山营刻全部之《大藏经》……如此的石刻历代不衰。遥想末法时期僧人们的壮举，实在令人感慨万分！

在中国末法思想兴起的约五百年后，日本认为自己国家也迎来了末法期。与中国、朝鲜半岛营造石经不同，日本则独创出了经塚来拯救末法时代。所谓"经塚"，即将经书誊写完毕后，装入金属制的经筒内，埋入土中，在其上部再营造小型六角石塔。至今日本的神社、寺庙、名山的路侧亦常能看到这类石塔，不过很多人对其在古代的作用，早已不甚了然，只是当作一处景点而已了。

接下来登场的，是于末法期诞生的炎凤凰，大唐帝国的前身——隋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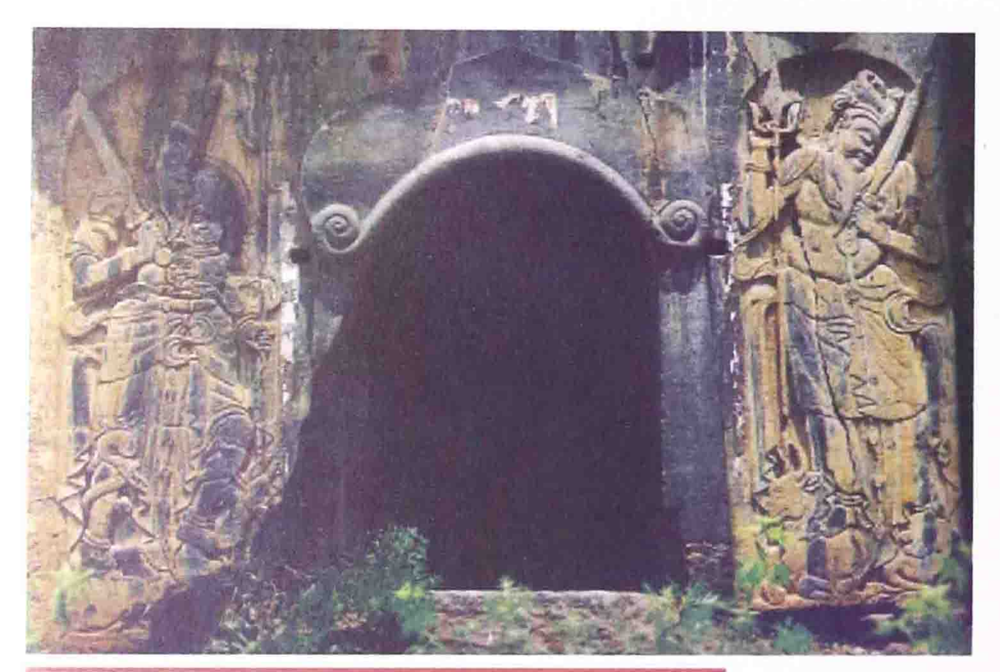
四 龙庭翠辇回

早年吕思勉先生写《隋唐五代史》，开篇即言“汉唐不同论”，认为唐代与西汉相似处少，与东汉相似处多，最大的原因就是“夷狄”入居中国者增多，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判断。东亚地区的诸民族，最先受到开化，比如高句丽民族就非常喜欢汉式的“三足凤”形象，这起源于《淮南子·精神训》的“日中有踆乌”，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三足乌”，但日本、韩国的很多学者，都坚持称之为“三足凤”。现今，日本足球国家队的队旗图案仍是三足凤。那么，这种思想的中土来源是什么呢？

在隋唐时代到来前夜，东西对峙的北齐和北周，各自发生过与炎凤凰思想有关的事件。《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一》有《北齐武舞阶步辞》一首，辞云：“大齐统历，天鉴孔昭。金人降泛，火凤来巢。眇均虞德，干戚降苗。夙沙攻主，归我轩朝。礼符揖让，乐契《咸》《韶》。蹈扬惟序，律度时调。”

炎凤凰源自北魏，后进入北朝隋唐的皇家音乐系统，也是有迹可循。譬如《洛阳伽蓝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这里的“王”，即是指北魏的高阳王元雍。《火凤》一曲到了唐代，亦为不衰。据《唐会要·燕乐》条记载：“贞观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晚唐人李商隐也有诗云：“拨弦惊火凤，交扇拂天鹅。”

结束了四百余年分裂的隋王朝，第一代帝王是隋文帝。



隋代迦毗罗神王（左）与那罗延神王（右）像，宝山灵泉寺

事实上，隋文帝杨坚的小名叫作“那罗延”，梵语是nārāyana，是隋文帝幼年抚养他的一位尼姑所起，这位尼姑还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那罗延在早期印度教中是一位重要的神灵，在汉文佛典中则指金刚力士的意思。今安阳市区西南25公里的宝山之麓，有一座隋文帝开皇九年（是年，统一中国）修建的灵泉寺，被称为“河朔第一古刹”。寺院后延伸的宝山沟中凿有石窟，窟门上即有迦毗罗神王像（左）与那罗延神王像（右）。其中那罗延神王像披挂铠甲，左手持利剑，右手持神戟，气势威猛无比，不禁让人联想这是不是隋文帝自我形象的神格塑造呢？

隋文帝在即位的第二年（582），就舍弃了西汉至北周的长安城，在其东南方位的龙首原处，重新建造了一座长安城，名曰“大兴城”。这也作为隋的遗产之一，被大唐帝国所继承，而当时日本的遣唐使则依葫芦画瓢，建筑了平城京和平安京。隋文帝之世，新的长安城简直

就是一座宗教国都，总设计师是宇文恺，原则是东西对称结构，主干道则被称为朱雀门街。最让世人瞩目的是大兴佛殿，其建筑样式几乎一同于隋王朝的太庙。据《两京新记》所载，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可见，这里面不仅有佛教、道教，还有来自西方的波斯教等，让人略有疑惑的是所谓的“胡天祠”，可能是早在五胡时代就传入中国的祆教的祭祀场所。

隋文帝和他的后任者隋炀帝性格迥异，隋文帝大力推行了地方行政改革。最著名的，当然是将原本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简化为州—县的二级行政机构，将原本的“十羊九牧”之弊端一扫而空，改革后一州管辖五县而已，这其实是隋文帝现实主义的一种体现。伴随着州郡制度的改革，隋文帝还开创了科举制度，初期的科举制，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试图将六朝以来贵族掌控的官职特权，收回到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一努力，当然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到了7世纪末，则天武后掌权时代，重奖进士科，使得更多的普通士人可以参与到中央政权之中。当然，到了10世纪宋太祖那里，又加上了殿试一关，彻底将官僚选拔权收至中央。

隋唐时代的第一对外重心还不是东亚，而是应对来自西方与北方的威胁。隋朝统一中国后，最大的外患是突厥。

在北朝末期，突厥强盛起来，“控弦数十万”。这虽然是史书形容北方骑马民族的常用语，但突厥在北周、北齐相争时，的确坐收渔翁之利。有一位佗钵可汗曾经说过：“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北周、北齐）孝顺，何忧无物邪！”然而，北周的武帝并不“孝顺”，他开始抗击突厥。到了隋文帝时，拥有统一中国实力的他，更是无法容忍突厥的猖獗。

不过，相比于北周的武力出击，隋文帝和贤臣长孙晟运筹帷幄，巧用离间计，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具体来说，隋文帝派长孙晟

出使突厥，向“西面可汗”达头，而不是“大可汗”沙钵略，赠送了狼头纛（突厥最高权力的象征），达头可汗大喜，派人入隋，这自然引起了沙钵略可汗的猜忌，终于在 583 年，突厥分裂成了东突厥与西突厥。隋文帝顺势文武并下，拉拢了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将他移住到今内蒙古的五原地区。启民可汗也对隋帝感恩戴德，上表都称“大隋圣人”云云。总之，经过隋王朝第一代君臣近十年的努力，东突厥完全降服，西突厥也不可能再有作为。

次年，契丹内附，虽然一般的读者认为契丹是在五代北宋才登上中国史的舞台，其实不然，早在隋唐时代，契丹就是游荡于隋唐、突厥、高句丽之间的一股强大的势力，各方都不敢忽视。随着突厥的降服、契丹的内附，隋王朝在东亚主动出击的资本就更大了。

由于地缘政治之因素，东亚诸国中，高句丽和百济对于重新一统天下的隋王朝表现出极大之关心，而新罗和倭国则相对迟钝。开皇年间，一艘隋王朝的战舰漂流到百济的济州岛，百济特遣使来朝，隋文帝对此大加赞赏。

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隋炀帝，其即位过程有很多谜团。据说隋文帝曾经让精通占卜的萧吉来为独孤皇后挑选墓地，当时迫不及待想做皇帝的太子杨广就对萧吉说：“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挑选皇后墓地），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萧吉回问“四年如何”，杨广大喜，说务必拜托了。于是萧吉选了一块墓地推荐给隋文帝，并且说道这块墓地风水极佳，“卜年二千”，意思说，如果葬在这里，隋王朝的国祚可以有两千年。结果隋文帝真的就在皇后去世四年后也离开了人世，而萧吉却对自己的族人说：“我们占卜者是不能说谎的啊，我说‘二千’，竖着看，也可以理解为‘三十’呢！”果真，狡猾的他利用占术帮杨广快速登上帝位的同时，也预算到了隋王朝的真正命脉——30 年而已！据说这位神

通广大的萧吉的占卜著作《五行大义》，后来在中国亡佚了，但被遣唐使带回日本，至今还在日本保存着。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在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中提到，《五行大义》这部书是中古中国最重要的五行思想著作。

登上帝位的隋炀帝是一个有些歇斯底里的人物，对外关系上，也是穷兵黩武。启民可汗曾经率兵受隋朝将军节度，一同平定了契丹的叛乱。大业三年（607）正月初一，启民可汗入朝觐见，隋炀帝高兴极了。四月，隋炀帝到北方巡游，启民可汗就不断派自己的儿子、侄子沿途请安慰问。六月，隋炀帝出关展示兵威，但要经过突厥的驻地，于是先派长孙晟宣旨。启民可汗马上召集部落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首领在牙帐候旨。长孙晟看见启民可汗牙帐杂草丛生，心生一计，想让启民可汗亲自锄草，以展示隋王朝在东亚地区的威望，就说："草很香啊！"启民可汗闻了闻说："不香啊！"长孙晟就回答道："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可汗恍然大悟，连忙拔出佩刀，亲自锄草，这一来，突厥各贵酋和其他部族的首领都争相锄草。本好虚荣的隋炀帝闻之大为满意。

八月，隋炀帝的巡游大部队，由榆林出发，经过云中，溯金河，



隋大业年间安济桥"镇桥神兽"，河北省赵县

向东北方向启民可汗的牙帐而去。一路浩浩荡荡，极尽威风！特别是由隋代第一著名工程师宇文恺制作的可行走回转式的“观风行殿”，让塞外游牧民族的民众望之如天宫焉。2012 年是宇文恺诞辰 1400 周年，前面提到他设计了长安的大兴城、洛阳的新城，以及大运河的一部分，后来征辽战役时他又负责浮桥等攻城设备。如果这位胡族的伟大科学家晚生 50 年，一定会在唐代发挥更大的光彩！

隋炀帝进了启民可汗的牙帐后，启民可汗下跪伏地，极为恭顺，其他贵酋也以突厥礼仪脱衣袒臂以表忠诚，这时的隋炀帝，可谓达到了人生的最满足之时吧！于是他酒酣之际写下了一首诗：“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但是，就在“龙庭翠辇回”的极大满足高峰体验之后，随即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甚至可以说是隋炀帝最后死于扬州的导引吧！

原来是高句丽也派了使臣到启民可汗牙帐，业已完全臣服于隋王朝的启民可汗，本着“人臣无境外之交”的古训，将高句丽使臣引至隋炀帝帐下。这一下，触动了隋炀帝那根敏感的神经，隋炀帝派大臣对惊吓万分的高句丽使臣说道：“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尔还日语高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

拉开隋唐两大帝国与东亚朝鲜半岛近七十年的合战之宣言，恐怕就是当日在东突厥可汗牙帐中的这句愤愤之辞吧！

隋王朝的五德是火，瑞兽是凤凰。可惜这是一只炎凤凰，在随即展开的东亚世界的混战中，将自己焚烧殆尽，但在这一堆死灰中诞生了新的凤凰——大唐帝国。



第三章

天可汗

“天之骄子”，最初出自一位匈奴单于的自称，汉朝史官用汉语记下了匈奴语“天”的发音——“撑犁”。中央亚细亚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对天及“天神”的崇拜，延绵数千载不绝，无论是匈奴、鲜卑还是突厥均如此。从隋文帝的“圣人可汗”，到最终唐太宗的“天可汗”（即突厥蒙古语系中的“Tengri Khagan”），无一不体现了鼎盛时代的隋唐帝国对北亚游牧民族的巨大支配力量。不过，在“天可汗”的征途上，还有一个颇为强大的对手盘踞在东北亚大地，严密、紧张地注视着来自帝都长安的一举一动……

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愤怒之辞恐怕有两个缘由：一则当然可以从隋炀帝杨广本人的性格上找理由；二则也可以透射出再度统一中国的隋王朝之整体信念。举一个小例子，《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将行幸江都，留诗与洛阳宫人，全诗见于《说郛·隋遗录》中，有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留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这首诗置于隋初唐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并无特别出彩处可言，然而却可以从一个细微的角度反映出隋炀帝的愤怒之火。因为"偶然"二字除了为配合诗歌技法外，并不是他真正的心声。从他即位到被弑的 13 年间，几乎没有哪个重大的举措不与营建东北亚的整体格局有关，"偶然"只恐是"定然"吧！

隋王朝建立之时，就继承了五胡北朝的诸多特质。有着鲜卑姓名"普六茹氏"的杨氏家族，从第一代帝王隋文帝开始，就积极留心于东亚的经营。

事实上，从北魏中世以来的一百多年间，高句丽不仅与漠北游牧民族（如突厥），也与江南政权长期保持联系。反而对于处于华北地理中心的北魏—北周—隋唐这样的中央王朝，常常抱有戒心。倘若我们翻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从东北的地理方位来考察，高句丽与隋王朝在辽东的接壤边境其实并不多，因为中间实际上还隔着契丹、奚等东胡系的少数民族；而高句丽的南部又与隋王朝隔着大海，直接进攻隋王朝本土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那为什么隋王朝和此后的大唐帝国，都积极于东亚新世界的打造呢？这只能从隋初谈起。

开皇元年（581），天下尚未一统时，高句丽就遣使赴

隋，对于与北周断交多年的高句丽来说，这一次出使刺探的意义大于朝贡。隋文帝也深知其意，故顺水推舟册封高句丽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公。此后至开皇四年，高句丽对于这一在中国崛起的新帝国，几乎年年遣使。但在东北地区的两大强劲力量突厥与契丹名义上皆附属于隋王朝之后，高句丽出于恐惧，就与隋王朝断交了。

隋王朝平陈之战中，滞留于江南的高句丽、百济人也被陈朝编入防守军队中，最后在建康募兵时，据说“唯负帆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所以平陈之后，高句丽王高汤就大惧，“为守拒之策”了。

这时朝鲜半岛的三国中，除了高句丽即将直接与隋唐帝国展开碰撞外，新罗尚未卷入其中，而百济则竭尽所能向隋王朝献好。因为百济与高句丽苦大仇深，彼之所恨，必为我之友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之理。

的确，当隋文帝连续打败突厥、陈朝、吐谷浑后，就对与陈朝泛海交通的高句丽给予警告，这份警告书载于《隋书·高丽传》，措辞非常激烈：

> 朕受天命，爱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籓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籓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驰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
>
> 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赐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王专怀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纯

臣之义，岂若是也？

盖当由朕训导不明，王之愆违，一已宽恕，今日以后，必须改革。守籓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籓，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王必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往者陈叔宝代在江阴，残害人庶，惊动我烽候，抄掠我边境。朕前后诫敕，经历十年，彼则恃长江之外，聚一隅之众，昏狂骄傲，不从朕言。故命将出师，除彼凶逆，来往不盈旬月，兵骑不过数千，历代逋寇，一朝清荡，遐迩乂安，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黜陟幽明，有司是职，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



高句丽双龙纹长方镜，东京博物馆

后人动辄批评隋炀帝好大喜功，但其实在征高句丽的问题上，隋炀帝杨广可谓是“无改于父之道”。总之，这的确称得上是一封绝佳的赐予藩国之辞令，高句丽王高汤收到这份玺书后，为之大惧，不久惊惧而死。复旦大学韩昇教授曾经指出，这份玺书的高明之处在于故意不谈六朝时代被高句丽抢占去的辽东领土问题，是因为

如果谈了，就承认高句丽是对等国家，自降身份。

到了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联合反叛的靺鞨诸部，入侵隋王朝的辽西边境，虽然这一次入侵很快就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但刺激了“欲征之久矣”的隋文帝。于是派出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然而因遇到夏秋雨季，军队未能东征，但惊吓万分的高句丽王连忙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这一次不了了之的东征，一定给尚为皇子的杨广以深刻的印象！不过，当时的名儒刘炫反对征伐，并著有名文《抚夷论》。

总之，恢复古代汉武帝朝鲜四郡的既定版图，是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则天武后一脉相承的信念。六朝动荡期，高句丽向北、向东侵占的土地，不仅是要夺回的，而且实现在朝鲜半岛的郡县化直接统治，是上述这些有为君王们不言而喻的默契。

如果将唐高宗与则天武后视而为一体，那么上述四位帝王，正好似接力赛跑的四位选手。第一棒的隋文帝，主要通过文的途径，首先在义理上，以天子即将讨伐逆臣、救邻国四夷于水火之中的大义震住了“高丽小竖”（隋臣陆知命语）。接住第二棒登场的选手，就是汇集了千古骂名与恶名的风流皇帝——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第二子。13 岁时，就担任过驻守华北平原新设检查区的长官（河北道行台尚书令）。此后在平陈战役中，又担任过名义上的总司令（行军元帅）。尚为晋王的杨广，就娶了一位南朝梁王朝皇室的女子（昭明太子萧统的重孙女），即后来的萧皇后。因此，杨广对于江南文化非常醉心。隋文帝是在末法思想盛行的时代中登上帝座的，故而隋文帝自称“我兴由佛法”，被尊为“转轮圣王”，可谓笃信佛法。和其父隋文帝不同，隋炀帝信佛但不佞佛。隋炀帝在位期间，他扶持了影响后世甚大的两大宗派的开山鼻祖——天台宗的智𫖮与三论宗的吉藏。智𫖮和吉藏都是六朝后期的

同时代人，他们两人分别以《法华经》、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中心，一统了南北朝佛教，这一举措得到了志在天下一统的隋炀帝的大力支持。其中，智顗就给杨广赠送了一顶"菩萨天冠"，在现实与神圣两个领域，都加强了隋炀帝的正统性。类似的情景，让人想起了现藏法国巴黎卢浮宫《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的油画。相对于拿破仑一把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的急迫心情，隋炀帝倒是礼数毕至，他写了一篇《受菩萨戒文》，有云："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这里的"小径"就是"小乘"之义，小乘佛教只能度己或极少一部分人，然而大乘佛教却以普度众生为旨归。所以智顗说："匹夫行善，止度一生；仁王弘道，含生荷赖。"这位宗教领袖已经把泽及群生的重任，以"仁王"之誉，交给了现实政治的领袖——隋炀帝。

仁王是守护佛寺的金刚力士，目前国内寺庙的护法金刚仁王塑像大都建于明清之后，身穿铠甲，华美有余，古意不足。而日本奈良法隆寺前两尊仁王像，上半身裸露，显出强健的肌肉与筋骨，充满了喷薄欲出的力感。右边一尊张口，左边一尊则是闭口，这才算保存了隋唐时代的古意。有机会去奈良旅游的朋友，千万别一跨而入寺门，错过这两尊仁王像。至今日语中还在用"仁王立ち"一词，就是指像仁王一样，威风凛凛地叉腿站着。

隋炀帝，这位"普度众生"的仁王，怎么能让帝国的四周感受不到大乘的光辉呢？对于"规摹宏侈，掩吞秦汉"的隋炀帝来说，在"王途既一"之下，绝对不容许有四夷脱离新帝国的册封体系之外。那么，已被漠北尊奉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的隋文皇（据谷霁光考订，"莫缘"即"圣人"之意）以及尊奉为"圣人可汗"的隋炀帝，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统治下的帝国边境吧！

东北边

以往最强大的突厥已经降服，启民可汗心怀对隋王朝的感激之情，终生服之。此外，靺鞨、契丹等东胡民族也名义上归顺了隋王朝。此时，扶桑倭国也发生了一件与隋王朝有关的“国际事件”。在607年，即隋炀帝大业三年，倭国派往隋王朝的遣隋使，居然向隋炀帝递交了这样一份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愤怒的隋炀帝对外交官说，以后蛮夷们这样无理的书信，不要送到我这里来！愤怒归愤怒，隋炀帝还是对这个海外之国颇有了解之兴趣，所以第二年就派了文林郎裴世清和遣隋使小野妹子一同去倭国视察。《日本书纪》也记载了裴世清来访之事。其实当时倭国的文明程度已经不亚于朝鲜三国了，《隋书·东夷传》记载：“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但将其抬高到与隋王朝的“对等外交”（不少日本东洋史学者持此论）上，则颇有曲解史料之嫌。

南边

这里的南边，指陈朝以南的土地。具体来说，用一向严肃的魏征之语，就是：“炀帝嗣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除了“志求珍异”一句有些刻意贬低外，其余都可谓是大实话。隋炀帝即位后的大业元年（605），就立刻发兵出击林邑国，将隋王朝的领土一直拓展到现在的越南北部境内，即交州。越南南部属于林邑国，隋军顺海岸线南下，林邑王以象兵对抗，隋军用陷阱巧妙破之，然后一举灭了林邑国，光复了西汉以来的旧土。

大业三年，隋炀帝派一位叫朱宽的官员到海外各国巡视，这个朱宽，就到了流求国，一说是现在的琉球群岛，一说是台湾，还有一说

是菲律宾。又过了三年，隋炀帝就派兵攻打流求国，斩杀了流求王，俘虏了一万多人带回了隋王朝。还有一个叫赤土国的地方，可能是苏门答腊岛，据说隋炀帝也很感兴趣，只不过赤土国很快就向隋王朝朝贡，故未加兵威。总之，在东、南、西、北四境的开拓上，南边可谓是花力气最少（如攻打林邑和流求的部队仅有万余人，领军将军也是偏将。反观早年出击突厥，动辄数十万以上之兵力），拓境最广的一方。

西边

突厥自从被隋文帝第一代君臣成功分化后，东突厥启民可汗内附，西突厥则向中亚迁徙，横跨天山南北，雄踞其中。虽然与隋王朝的核心地带并不靠近，但也影响了当时世界上东西几大帝国（隋王朝、拜占庭、萨珊王朝）的势力均衡。当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西方世界非常喜好中国的物品，中国也对西方的特产很感兴趣。然而，西突厥盘亘其间，阻隔拜占庭与隋王朝的直接联系，从而坐收中间之利。比如玻璃，据齐思和先生说，南北朝时代就传入中国，价值连城，但在原产地，却不见得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有珊瑚、水银等，都是六朝隋唐中国人喜欢的拜占庭特产。2012 年 10 月《文物》杂志上公布了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墓的发掘报告，其中有金币一枚，正面为东罗马皇帝胸像，头戴盔，耳际有垂索，身穿铠甲。右侧有铭文“DNIVSTIN □”，左侧有铭文“ANVSPPAVI”。金币背面是胜利女神像，背生双翅，右手执十字架，左手托圆球。据考证，是查士丁尼一世（527—565）的金币，恐怕这就是众多通过西突厥人辗转流入中土的东罗马钱币。其实，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东罗马银币，此前也在关陇、河南地区出土过不少。

总之，隋炀帝学习其父隋文帝的经验，对西突厥依旧采用了以政





查士丁尼一世金币正反面，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墓

治策反为主的攻势。果然，在隋炀帝登基的第一年，原臣服于西突厥的铁勒、薛延陀诸部就给隋炀帝送了一个大礼——连败西突厥，并建立了铁勒汗国。西突厥处罗可汗也只能入长安朝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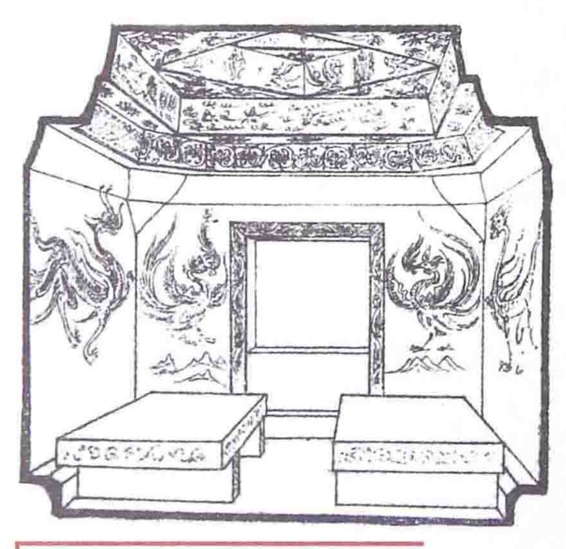
隋炀帝时代第一“西方问题专家”裴矩，此后又上奏了《西域图经》(已亡佚，内田吟风有考证)，极力怂恿隋炀帝经营西域与中亚。经过努力，除了铁勒外，高昌、伊吾、中亚昭武九姓诸国等都向隋王朝朝贡。其中，吐谷浑自恃强大，初未服，被隋将宇文述攻破其地，在其旧处置鄯善、西海等四郡而返。于是，就如巡游启民可汗牙帐一样，隋炀帝又开始了万乘西出玉门关的巡游，这真是戈壁滩上千古未有的壮举！司马光《资治通鉴》也不禁赞道：“隋代之盛，极于此矣！”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开始了他第一次征讨高句丽之前的军礼仪式。对隋炀帝征高句丽战争，重臣裴矩就上言："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

除了隋要雄心勃勃地恢复汉代朝鲜四郡外，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也不断上乞师表，请求隋王朝出兵高句丽，百济还屡次说自己愿意作大军的先导。于是，第二年，百万隋军浩浩荡荡向辽东地区挺进，这百万大军又分为 24 路军，"每天遣一军发，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后勤部队更是不计其数。略有常识的读者，看到这里都会问：这是去打仗吗？不错，第一次征讨高句丽，隋炀帝本来的出发点就不是打，而是通过军事仪仗式的大型演习，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最初就有谋臣建议，如果真是"打"高句丽，那当然是速战速决最好，可是已经拥有四海的隋炀帝，这时的心境非常像淝水之战前欲"混一六合"的苻坚，以为百万大军一至，高句丽王定会俯首称臣。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 24 路大军外，还有一个完全独立的、直接受隋炀帝指挥的"受降使者"团队，每军均有驻扎，他们乘坐二马轺车，手持白虎幡一幅（《隋书》因为避唐太祖李虎的讳，改为白武幡或白兽幡），专管接受高句丽的受降军民。如果说炎凤为仁，那么白虎的意象则主杀伐，将白虎的图案绘制在大旗上，意味着不降则杀。可惜隋炀帝费尽心机，却已经被高句丽看破了，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死战不降。

高句丽在文武双全的宰相乙支文德指挥下，边打边



高句丽江西大墓透视图，朱荣宪绘

退，保存实力，反而耗尽了隋军的士气与辎重，最终在平壤城下开始展开反攻，将帅指挥出现严重失误的隋军开始撤退，但就如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被四面袭击一样，高句丽的游击部队四处袭击隋军，最终隋军丢盔弃甲，一败涂地，好不容易渡过辽河的约有 1/3 的大军（30 万人），竟然只有两千余人最终逃回了辽西。直到唐贞观十九年（645），其战场依旧是"骸骨相望，遍于原野"。乙支文德还写了一首据说是朝鲜现存最早的五言诗来讥讽隋军："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惨败令不可一世的隋炀帝懊恼无比，丧尽颜面。他立刻准备第二次征讨高句丽。这一次，不再是军事示威与演习性质的了，而是鼓足了力气要拿下"高丽小丑"。一年后，隋炀帝不顾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现状，宣布发动第二次征讨之战。

实际上彼时中国国内，民众已经不堪接连不断的劳役之苦而四处起义。山东邹平地区一个叫王薄的人，编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最有代表性：

> 长白山上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
>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浪死"就是白白送死的意思。隋王朝的普通民众，并不支持征伐高句丽。但是，未把农民起义放在眼里的隋炀帝，依旧准备第二次出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恨恨地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这次，他不再摆出长蛇阵了，也没有手持白虎幡的招降使者了。然而，对手高句丽依旧是坚壁清野的战术。第一战在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隋军先锋猛将王仁恭以一千铁骑冲垮高句丽数万军队，军威大振。隋炀帝亲率大军随后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云梯、飞楼、橦、地道四法俱攻，此时隋炀帝必胜之心甚高，在辽东城下赋诗《白马篇》，收载于《文苑英华》卷 209 中，有云：

> 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
> 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
> 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
> 射熊入飞观，校猎下长杨。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良。
> 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
> 进军随日晕，挑战逐星芒。阵移龙势动，营开虎翼张。
> 冲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汤。尘飞战鼓急，风交征旆扬，
> 转斗平华地，追奔扫带方。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功彰。
> 会令千载后，流誉满旂常。

收在《文苑英华·白马篇》中的，还有李白、杜甫的同题之作，只可惜他们都是诗人之白马，很难想象彼时帝王之白马吧。总之，"岛夷时失礼"的高句丽坚守了 20 天，眼看就要城破了。说实话，倘若一年前如此打法，高句丽足能拿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负责粮草督运重任的杨玄感，在这个节骨眼上于黎阳造反了，起兵迅速逼

近东都洛阳——身为朝廷高官的杨素之子杨玄感反叛，这使得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句丽计划不仅全部被打乱，而且面临着出征将士前后受敌、无家可归的危险。同时，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句丽，隋军的全部战略布局统统拱手送给高句丽，无疑是送了高句丽一份大礼。鉴于这些突发事件，隋炀帝不得不放弃前线的大好攻势，立刻班师回朝。退兵是秘密进行的，但人心惶惶，诸道争退，其实是乱成一团。但高句丽不知深浅，未敢立刻追击。然而对于欲重建东亚秩序的"大隋圣人可汗"隋炀帝来说，这又是一次巨大的羞辱啊！

空有项羽之勇的杨玄感，实在谈不上什么战略，他的起义虽然被四面扑来的隋军平定，但他点燃的反隋之火，很快就烧遍了中国大地。起义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前后历史之罕见。更有甚者，有不少自称是弥勒出世的人，利用末法思想，收买人心，举起了反旗。就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隋炀帝不思平定国内，反而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句丽之战。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以收埋战死将士骸骨为理由，试图将民众之仇恨转移到外敌高句丽身上。

就高句丽一方来看，虽然成功顶住了前两次隋王朝的百万大军之猛攻，但国力耗尽，民众也是疲惫不堪了，再打，也无必胜之把握。加上这一次隋朝水军在名将来护儿的率领下，于辽东半岛成功登陆，迅速逼近平壤。高句丽王高元心惊胆战，就送还了隋王朝的叛臣斛斯政，并上表乞降，满足了虚荣心的隋炀帝再次下令班师。

这不仅使得隋王朝在东亚的直接统治没有实现，也直接导致了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东亚面临崩坏。回到京师后，四面的起义已经不单单是农民了，高门权贵、江南旧臣尽皆举起了反旗。617 年，仓皇巡游至江都的隋炀帝被部将缢死，殆笑千古。

隋炀帝被弑，随同到江都的隋宗室诸王皆难逃一死。其中蜀王杨秀也被乱军所杀，杨秀的名字也许知道的人不多，但是《美人董氏墓

志铭》则广为喜好书法的朋友所知（墓志在嘉庆年间出土，咸丰年间即被毁），杨秀就是这篇墓志的作者。美人董氏是杨秀的侍女，天下绝色，“态转回眸之艳，香飘曳裾之风”，可惜美人仅仅19岁就病死了，墓志哀悼她说：“依依泉路，萧萧白杨，孤坟山静，松疏月凉。”我们在读这篇哀悼美人早逝的文章时，是否也会感慨，本拥有雄厚实力的隋王朝，过早地崩溃了呢？

隋《美人董氏墓志铭》

长篇评书《兴唐传》中，有一回回目叫“李元霸遵命救杨广”，里面那位老百姓喜闻乐道的英雄李元霸，胯下一匹万里烟云罩宝马，手持一对雷鼓瓮金锤，在四明山前大战诸雄，隋炀帝得以脱逃，只不过现实中却没有这样的“大鹏金翅鸟”（李元霸前身）来救驾了。

隋王朝的五德历运是火，隋也正像一只烈火中的凤凰，迅速地焚烧了自己。在一片废墟上重新诞生的则是大唐帝国。

近代以来，史学界对于隋炀帝的批判之声一直占据主流，倒是金毓黻说过：

> 盖基于攘外自一义言之，辽东旧壤之必须恢复，高丽野心之必须膺惩，主中国者应视为天经地义刻不容缓之图，至其出师无功，又别有其原因，以此为咎，何异惩羹吹齑，世多以成败论人，其此之谓欤！（《东北通史》）

金毓黻曾经在日寇控制下的伪满忍辱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任教。他这些对古代的言论，可以视作对当时世局的愤慨吧！

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失败，最严重的后果倒并不是高句丽领土在辽东的扩张，而是原本臣服的东突厥日复一日的强大，再次将漠北草原的广阔土地纳入统治范围内，中央王朝到了无力与之抗衡的程度。隋末群雄在逐鹿中，纷纷向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称臣，接受始毕可汗授予的狼头纛。只是在太原起兵的李渊，一开始就不接受狼头纛而自称大将军，并最终一统中国建立大唐帝国。在一开始的几年中，唐并不具备与复兴的突厥一决高下的实力，主要专心经营着内地。在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有一头石犀与石虎，后来被移至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犀的特点是隐忍与勤奋，虎的特点则是雄武与勃发！这恰好说明了大唐帝国开国之君要在隐忍之后，重新勃发。汉鉴于秦，唐鉴于

隋。在再度聚焦到东亚世界之前，还是首先来看一看大唐帝国初期的国防重心——北境吧。

东北边

相对于国内的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东突厥方才是唐军的心腹大患。最初，唐高祖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在与隋末诸雄争霸时，对北方强敌东突厥采取了示弱政策，大大刺激了东突厥进犯的野心。休养生息，聚集力量，是唐高祖和唐太宗初期的国策。实际接过隋炀帝接力棒的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头号大敌是已经成为东北亚霸主的东突厥。玄武门兵变不到一个月，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就率兵一直攻入离长安只有十多里的渭河边，刚刚即位的唐太宗不得不亲自到渭水边与可汗盟约，这好听一点叫“渭水之盟”，但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渭水之辱”。正像两位摔跤的大力士，当弱的一方渐渐壮大时，原本强的一方却渐渐衰败。东突厥此后由于内乱，实力开始下降。唐太宗通过册封从属于东突厥的部落首领，一步步分化他们。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令名将李靖、李世勣率领十万大军出击东突厥，一举摧毁漠南可汗牙帐，翌年生擒颉利可汗。李靖可谓大唐帝国的第一战神。后在传说中被尊为毗沙门天王。《西游记》中的托塔李天王形象就源于战功显赫的李靖，到了《封神演义》中，李靖就直接成了哪吒的父亲。李世勣（唐高宗即位后，避“世”讳，单称李勣）则一直活跃在朝鲜战场上，后文还要多次提及。

总之，从 630 年开始，欧亚大陆东半部新的帝国——大唐诞生。在被消灭的东突厥故地，大唐帝国设置了都护府（后来六大都护府之一单于都护府的前身），实现了统治的直接化。

西北边

当东突厥在隋末、唐初与中原王朝争雄时，被东突厥称为“十箭”部落的西突厥正一门心思地经营着西方，他们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联手，攻击波斯萨珊王朝。唐高祖曾经想联合西突厥来进攻东突厥，但似乎是不了了之了。据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的《西突厥史料》考证，在唐太宗时代，西突厥实际控制了东自玉门关、西至波斯萨珊王朝、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袤地域。不过，这无法阻挡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的西征步伐。

首先，大唐帝国降服了青海地区的吐谷浑部落，虽然对吐蕃不能完全制服，但也迫使他们遣使朝贡。接着在640年，唐军攻灭了西域要津之高昌国，完全掌握了对西北及中亚用兵的主导权。此后，焉耆、龟兹、疏勒诸地皆降，唐太宗在此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前身是西州都护府）。并在此后的日子里，逐步超过了西突厥在此地区的影响力。十多年后，西突厥可汗也被捕获入唐，西突厥控制地区成了大唐帝国的羁縻州。

贞观四年春，北方诸族以及各国使者纷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李世民笑笑却没有接受，他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天可汗乎？”李世民是一个重实大于重名的帝王，此一品质，就远远优于“大隋圣人可汗”隋炀帝了。不过这一被外族尊奉的事实，却让后世文人兴奋不已，比如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高昌》一诗即有云：

麹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
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龙旂翻海浪，驲骑驰坤隅。
贲育搏婴儿，一扫不复馀。平沙际天极，但见黄云驱。
臣靖执长缨，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

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

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

柳宗元这组诗，共十二篇，自题："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兵之艰难。"上举诗句中的"文皇"就是李世民的谥号。后来清代在蒙古发现了突厥的《故阙特勒之碑》，中间称唐帝为"Tabgac Qaganqa"，据日本早期著名的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考订，就是"天可汗"一词的对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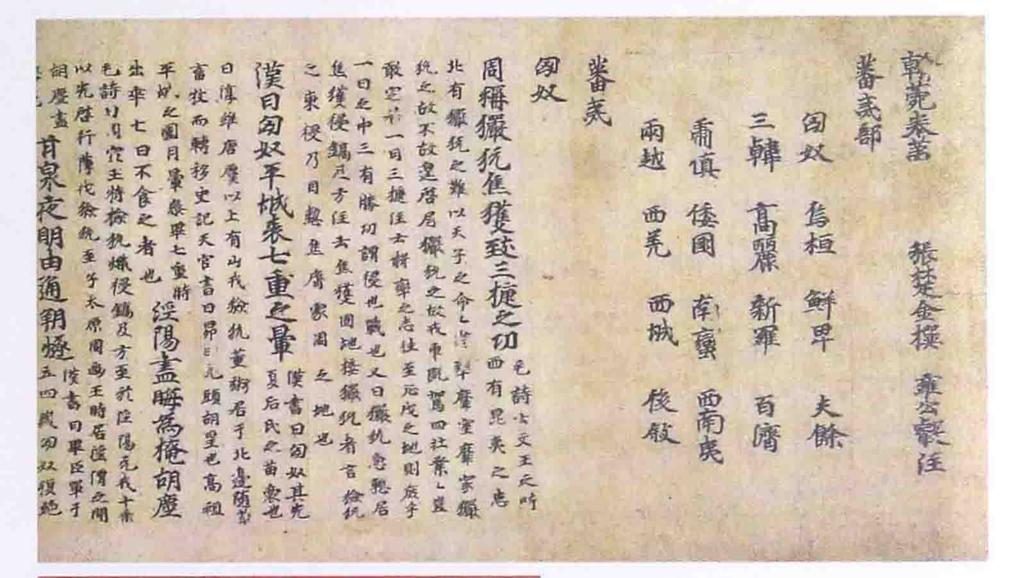
唐《故阙特勒之碑》拓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

又据罗香林先生的《唐代天可汗制度考》名文考证，自从西北诸族、突厥余众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来，影响所及，中古时代凡波斯、阿拉伯作家称呼中国皇帝，就多用"天可汗"了。

这样，平定了北部边境的大唐帝国，光披四表。君臣们的目光，不久就集中到第二棒选手隋炀帝跌倒之处——朝鲜半岛。正如东京大学西嶋定生所言："朝鲜三国的问题，特别是高句丽的问题，业已是中国王朝肉体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了。"

在降服东西突厥，灭高昌，败吐谷浑之后，唐太宗“克胜四夷”的雄心壮志勃发，但他深知实力方才是树立大唐帝国威望的第一途径，叫不叫“天可汗”那只是无关紧要的外交辞令。然而，焦慌的高句丽在唐太宗灭东突厥时，就遣使送来封域图，似乎是承认了大唐帝国作为东亚宗主国的身份，并送回了隋炀帝时代的俘虏一万余人。但随着大唐帝国越发强盛，特别是唐太宗遣侯君集攻灭了高昌后，高句丽更加紧张。

在法国巴黎图书馆中，藏有一份伯希和在敦煌鸣沙山所获的唐太宗《温泉铭》天下孤拓，里面有这样句子：“是以秦皇锐思，不免兹山之尘；汉帝穷神，终郁茂陵之草。”探究这些文字背后的思想可知，虽然降服了北亚大敌突厥，国内也日趋稳定，但是一门心思想要超越秦始皇、汉武帝的唐太宗，是无法容忍自己在朝鲜半岛无所作为的。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派人去高句丽摧毁当地所建的京观——累积隋军阵亡将士尸骸的建筑。这种建筑本身就有夸耀军事胜利的意味，比如今日在日本京都尚存的耳冢，就是丰臣秀吉当年侵略朝鲜，割下朝鲜人耳朵堆砌而成的。唐太宗这一强势举动，引起了高句丽紧张的同时，也激发了大唐帝国国内有志之士的愤慨之情。事情一直到了贞观十五年（641），国内愈加稳定的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必须重拾接力棒的时候了。《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一年，唐太宗对臣下的明确说辞：“高丽本（汉）四郡地耳。”而这一点，几乎在大唐帝国的多个层面都有细微的体现。比如唐代官修史书《晋书》，《高句丽传》的位置就不在传统的《东夷传》中（卷97），这意味着大唐迟早要将高句丽纳入帝国版块的雄心。所以《晋书》就不能单单说是两晋的实况，而是唐人心态的一种表现。需要留意的是，《晋书》修成之后，是作为皇家礼物赐予新罗等国的，其中的国际政



翰苑卷第
張楚金撰 雍公叡注
蕃夷部
匈奴 烏桓 鮮卑 夫餘
三韓 高麗 新羅 百濟
肅慎 倭國 南蠻 西南夷
兩越 西羌 西域 後敘
蕃夷
匈奴
周稱玁狁，焦獲致三捷之功
漢曰匈奴，平城表七重之暈
涇陽盡晦，為掩胡塵
甘泉夜明，由通朔燧

唐钞本《翰苑》，日本福冈县太宰府天满宫

治寓意十分明显。

但即便是号称“贞观之治”的大唐帝国，其户口数尚不敌隋炀帝时期，对此史家多有议论。那么，除了重建朝鲜四郡的雄心壮志外，还有什么是促使唐太宗出兵的理由呢？那就是朝鲜半岛的内斗。

半岛三国中，最后一个崛起的是新罗，隋唐之际其实力开始急速上升，虽然尚未达到可以单独抗衡高句丽的程度，但对于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却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遣陈大德作为使臣赴高句丽。这位使臣同时成功地扮演了军事间谍的角色，记录了高句丽的山川形势、官职制度等，回长安后递交了一份相当于军事情报书的《高丽记》——这部书汇集了大量有用信息，可惜今天已经亡佚，不过尚有不少遗文保留在日本国宝级唐钞本《翰苑》残卷中，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唐钞本〈翰苑〉残卷考正》的长文，结尾处曾经提道：“唐代作为亚欧大陆上的统一帝国，伴随着华夷观念的变迁，知识人有着对帝

国四方情况之热情与研究动力。”这种热情和动力，不单单是唐太宗一人而已。

一个契机是，贞观十六年（642）朝鲜半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是年，高句丽的第一权臣泉盖苏文（原叫“渊盖苏文”，中国史书避唐高祖李渊讳改名）发动政变，将高句丽王杀死并抛尸投诸沟，另立新王。泉盖苏文自立为“莫离支”——这一官职在高句丽也并非常态，略相当于大唐帝国的兵部尚书或中书令。他自己则“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在对高句丽国内实行残暴恐怖统治的同时，泉盖苏文对唐态度也越发强硬。在小说《说唐后传》中，是这样描写泉盖苏文的：“只见盖苏文头如巴斗，眼似铜铃，青脸獠牙，身长一丈，果是威风。”后来征讨时，不知多少唐将死于他的赤铜刀和柳叶飞刀之下——大概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泉盖苏文的恐怖吧。《日本书纪》中的“伊梨柯须弥”就是泉盖苏文，“伊梨”日语叫“いり”，现代韩语为“연개소문”，古高句丽语是“水源”之义，《三国史记·盖苏文传》一开始说“自云生水中”，大概就是此意。

另一个契机是次年，贞观十七年（643），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新罗遣使入唐求援，上表曰：“高句丽、百济侵凌臣国，累遭攻击数十城。两国连兵，期之必取。将以今兹九月大举，下国社稷必不获全，谨遣陪臣归命大国，愿乞偏师，以存救援。”

按照新罗的说辞，是受高句丽与百济联兵侵略。当时新罗的国主是真德女王，上表前一年，新罗的大耶城（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等就陷落于百济。然而，按照正常的国际关系逻辑，往往是第一名拉上第三名，打压第二名。所以不能简单理解为新罗的穷乏，当然唐太宗也心知新罗的真正心意——依靠大唐帝国扩充在半岛的势力，于是因势给了新罗三策：一是大唐帝国启用边疆守备部队，带领契丹、靺鞨

等东北部族攻入辽东以解新罗之围。二是发给新罗唐军旗帜、战甲，待高句丽、百济兵至，可吓退彼二国。三是由大唐帝国亲自出动海军大部队保卫朝鲜半岛，但条件是敌退之后，须由大唐帝国的皇室成员统领新罗。

新罗使者对此三策唯唯不能作答，唐太宗叹其庸才，非乞师告急之士。实际上，不论哪一策，唐太宗只需要新罗答应其中任一，就有出兵半岛的充分理由了。

在尚未准备充分之际，唐太宗先派使臣至高句丽，一面责备其与百济联兵侵略新罗，另一面再次重申了朝鲜半岛三国皆大唐帝国之藩国，藩国之间有冲突，当求诸宗主国解决，不可私自出兵相攻。



唐三彩釉神将像，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

泉盖苏文狡辩说，是新罗在隋炀帝征辽时，趁机侵占了高句丽的土地。大唐使臣义正严词地回答："朝鲜半岛本来都是汉武帝四郡之地，岂有私下被你们划分你的、我的之道理！"双方其实都知道，大战在所难免，高句丽从扶余城（今吉林市）至渤海，大修长城的举动依旧进行着。

使臣回国后，向唐太宗报告了泉盖苏文的言行，盛怒的唐太宗决定要征讨这个不臣的番邦，长孙无忌表示反对，然而唐太宗身边的首席军事谋臣、平定东突厥的名将——李勣却力主出兵朝鲜，他提醒太宗，正是皇帝自己多年前听从了魏征的劝告没有乘胜追击薛延陀，从而导致该部至今不断骚扰帝国的北境。薛延陀本是漠北

铁勒诸部之一，德国学者夏德最早提出薛延陀是由薛（Syr）和延陀（Tardouch）两个部落组成，继东突厥之后建立了汗国，一度称霸漠北。雄心勃勃的皇帝受到职业军人李勣这席话的刺激，于贞观十八年（644）十月，下达了《讨高丽诏》，举出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我大而击其小；二曰以我顺而讨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乱；四曰以我逸而敌其劳；五曰以我悦而当其怨。"

这一诏书收在宋人编的《唐大诏令集》中。两个月后，唐太宗又颁布了《亲征高丽诏》，在这份诏书中，行军的将领安排被公布。于是海陆大军将领中有突厥人，骑兵中则包括契丹等杂胡部队，这支名副其实的"联合国部队"一起浩浩荡荡地开赴辽东，杀奔朝鲜而去。

四 白虎转世

贞观十九年（645）三月，唐太宗亲率部队从洛阳到达了定州（今河北定县），对全军发表战前总动员："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

接过第三棒的名君唐太宗与此前第二棒的暴君隋炀帝，出师的结果都很相似，"四出师而不能得"。当然此为后话，首先看看大唐帝国的第一波强劲攻势吧！

首先是渡辽水。主帅李勣利用声东击西之术，成功地渡过了辽水——这次渡辽经由的浮桥，还是第二棒选手隋炀帝的首席科学家宇文恺留下的遗产呢。如此一来，高句丽耗费多年人力物力修建的长城防线就形同虚设了。紧接着，就是泉盖苏文的防守重镇——辽东城了。隋炀帝虽然兵锋三次直指平壤，但都没有拿下辽东城，一来是高句丽军民的顽强抵抗，二来是因为辽东城的城墙之高、之厚，罕有能敌者。因此对于唐太宗来说，真正的难题现在才开



唐白虎石镇子，日本正仓院北仓

始。《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对此下评判说："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标而深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虽然此书是海外汉学名著，但此论实在是纸上谈兵、书生议政，倘若不攻拔屡次阻扰隋炀帝的第一重镇，何以让许多初踏辽东战场的年轻将士燃其斗志？何况如果唐军绕过辽东城，任由高句丽人在背后骚扰袭击，恐怕也是必败无疑吧。

李勣攻城，首先利用数千骑兵击退了企图前来救援辽东城的高句丽数万部队。然后唐军攻城部队利用了先进的抛石机（可以将 300 斤的巨石抛至一里之外，所遇尽溃）等器械猛攻，七日之后，艰苦地拔下了辽东城。唐太宗当时带着近卫骑兵部队万余人督战，身着铠甲为百济所献金甲，甲光炫日——真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兴奋无比的大唐帝国的皇帝，将到手的辽东城改为"辽州"，一步步恢复汉武帝朝鲜四郡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了。这时是阴历五月，大唐帝国的海军也成功在辽东半岛登陆，于是唐太宗立刻下令继续向前进攻。

六月，唐军又利用撞车、飞石车等攻下白岩城，改名为岩州。同月，又进攻高句丽另一重镇，"城险而兵精"的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这一仗非常艰苦，彼方守城约 10 万将士，高句丽派来援军联合靺鞨兵，共 15 万来救，合约 25 万兵力，总数上远远超过了攻城的唐军数倍。兵法上云"十围五攻"，对于此时的唐军来说，攻与围都十分艰难。因此，只有抓住先机"围城打援"。

唐太宗观察了山川地形后，分兵三路：李勣率唐军步兵 1.5 万人正面迎敌；长孙无忌率 1.1 万兵绕至背后夹击；唐太宗亲率步骑 4000 人驻扎敌背面山峰上，约诸军听到鼓角则同时猛攻。

阴历七月廿日，大唐帝国第一次征讨高句丽、兵力悬殊最大的一战拉开了序幕。唐太宗也深知，自己深入虎穴，试图以自己的中军帝座、仪仗旗盖吸引敌军，绝对是一个险招。万一失败，下场将落得连

隋炀帝都不如。据后来长孙无忌主修的《太宗实录》记载，天空顿时出现雷电。李勣首先以一万手持长矟的步兵方阵整齐有序地冲向敌军——这一战术从他在隋末群雄争霸时就屡试不爽，果然高句丽仗着兵多，轻率迎战，被李勣方阵冲垮，长孙无忌又从高句丽援军背后继续冲杀，最后唐太宗亲自从山坡上攻下，三面夹击，高句丽大败！首尾不顾，留下了两万具高句丽士兵的尸体！

这一次郊外野战，却让另一位白袍小将初现峥嵘，虽然到他大显身手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那就是民间评书中常常提及的薛仁贵。薛仁贵据说是二月初二出生，乃是上方白虎星转世，白虎是主兵的星宿，仿佛是上天赐给大唐帝国开拓疆土的名将。根据当时的行军制度，他所从的马队本来是跟随在李勣步兵方阵之后，但遇敌之后，薛仁贵突入敌阵，欲立奇功的他卸下铠甲、身着白袍，一手拿方天画戟，一手张弓，大声呼啸杀来。《旧唐书》本传说他："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戟，这一本不属于唐代的武器，分量比普通的枪要重得多，不是一般将士可以拿得动的。西晋的名将周处说戟是"五兵之雄"，可惜到了南北朝时代，马矟作为骑兵的主要武器，代替了做工考究但沉重不便的戟；到唐代，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大唐帝国骑兵部队的主要攻防武器中根本没有戟。工艺复杂、难以掌握格斗技法的戟，它的命运也如同它所处时代的魏晋贵族一样，逐渐消失在战场上——在这一前提下，白袍小将薛仁贵手提一柄本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武器重戟，同时放弃了可以护身的铠甲，以决死之志突入敌阵，不仅让敌军，也让山坡上的唐太宗大为惊叹！

照《旧唐书》的说法，首先是这只白虎杀入敌阵，才使得李勣主力部队士气大振。后世的宋元评话基本也按照史书的说法加以推衍，

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敗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
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
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怱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乘
薛仁貴征遼事畧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
史隋唐五代宋全收話說昔日唐　宗皇帝即位貞觀十八年天下太平
諸國來朝海外高麗國東有四國一曰新羅國一曰伯濟國一曰龍益國
一曰花樓國一日太宗皇帝設朝升殿文武班齊閤門使出班奏曰今有
海東伯濟王遣使呂黑飛來進奉陛下宣入近臣引見帝來使以是紗裳
而帝不曉其由遂問使進者何物呂黑飛下殿請死太宗問其故呂黑飛
奏曰臣有本國之恐罪當萬死帝曰赦卿無罪當言其故呂黑飛曰臣奉
三命將所進陛下寶物前來至海東黑風口從登州進發聞說摘海經過
高麗國遇高建莊大兵截其路旅一員將身長一丈掠峰蹤嚴踡赤虬爲
膝斷而維弓身背飛刀五口乃高麗虎將葛蘇文也密討兵難文殺本主
高建莊爲主挾天子之命威鎮群臣乃東海王蘇也將臣所進之物盡皆
劫去以針黑於其面佩刺陛下臣不敢去其字而若陛下見了臣該萬死
帝日赦卿無罪呂黑飛去其裳而之物却見面上刺着四句言語道甚來

永乐大典本《薛仁贵征辽事略》，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如赵万里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中，辑出《薛仁贵征辽事略》一书，于此有云："忽见白袍年少跃马横戟，冲突辽阵，如入无人之境。"大胜之后，薛仁贵又将高句丽兵败欲逃的桥梁折断，这样对方主帅就只得率余众向唐太宗投降了。

一天之内经历了如此大胜的唐太宗，下马向上天拜谢，然后还是显示了他的大度，将高句丽投降士兵三万人全部遣返，但对于与大唐帝国为敌的靺鞨兵三千人，则全部坑杀。为了纪念这一战，他将自己驻扎屯兵的山峰命名为驻跸山，当时有个聪明的臣子就说："山名驻跸，此盖以銮舆不复更东矣。"这很像三国时杨修听到"鸡肋"这一军令后的猜测。的确，这一仗对于唐太宗来说颇有豪赌的味道。《唐语林》这部书记载了大战将开之际的情形："驻跸之役，高丽与靺鞨合兵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

安市城野外的"围城打援"虽然在一日之内就大获成功，不过，真正的攻城战却遇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一直到阴历九月，安市城依旧没有打下，眼看寒冻就要来临。于是，唐太宗不得不下令班师回朝，同样收在《唐大诏令集》中，有贞观十九年十月的《高丽班师诏》，这篇洋洋洒洒的诏文，最核心的只有如下数语："忽属徼外霜

严，海滨寒冱”。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于辽东的季节“时间点”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餱粮之运输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

的确，到了十月寒冻之时，辽东、高句丽皆苦寒，士马难以发挥效用，再战无益。故而就堂而皇之地撤军吧！

大唐帝国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攻拔十城，杀敌四万。唐太宗回到营州后，一面祭拜战死将士的骸骨，一面奖赏臣民以及契丹等从军之胡族酋长。善于自我检讨的唐太宗还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但这一次大战，唐虽曰胜，未完胜；高句丽虽曰败，未完败。透析唐太宗的懊悔之辞，绝不是真的希望魏征复活来劝阻自己，而是一种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遗憾。



《成实论》卷末人物绘，日本天平17年写经生钞

而白袍小将薛仁贵，也从马军后队一下子升为北门长上，进入了唐太宗的近卫部队，为这只白虎日后成长为大唐帝国第二代军事首领之一，在东亚战场上发挥效用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件与此战有关的事情，即唐太宗第一次出师的贞观十九年，恰巧也是玄奘大师西土求法归来的同一年，当时信心满满的唐太宗，已经把关中的兵马集中到了洛阳，准备大举出兵。于是他立刻把玄奘招至洛阳，一席长谈之后，玄奘对西域诸国问题对答如流，唐太宗大加激赏，感慨当年苻坚尊道安为“神器”，举国尊之，诚为不虚。同时强烈劝说眼前这位俊秀魁伟的有道高僧还俗辅政。但一心想译出佛经的玄奘婉拒了这一恩典，唐太宗于是邀请玄奘一同去辽东战场，说道：“匆匆言犹未尽意，欲共师东行省方观俗，指麾之外，别更谈叙，师意如何？”玄奘一再苦辞，最后说道：“陛下东征，六军奉卫，罚乱国，诛贼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阳之捷。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以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伏顺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

玄奘和临出兵前唐太宗的这些对答，记载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观看玄奘最后的却辞，虽然满言必胜之意，但除了反战的意味外，似乎也有对此战不可能完胜的担忧，因此不如留在帝都一心从事佛经的翻译。

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四位译经家：鸠摩罗什（龟兹）、真谛（天竺）、玄奘、不空（锡兰）。只有玄奘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位伟大的、以弘扬佛法为目标的高僧。没有玄奘大师护佑的唐军，依旧按计划向辽东出发，最后飒羽而归。对于早已威震四海的“天可汗”李世民来说，他坚毅的性格绝不容许这样不彻底的征伐，虽然他深知前一棒选手“大隋圣人可汗”隋炀帝就是败在不服输三个字上，但如何不服输以及怎样不服输，这先后两位帝王选手，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第四章

朔之龙

661 年的初春，帝都长安的天气尚十分寒冷，接过父亲李世民的遗产与遗志的唐高宗李治，将原初的年号“显庆”改元为“龙朔”。“朔之龙”——大唐帝国的初、盛期绝对当之无愧！

“请大唐帝国一定帮我们打败阿拉伯人！请一定要帮我们复国啊！”这是被阿拉伯人灭国后的波斯流浪王子卑路斯（Peroz）恳请唐高宗的哀切之辞。被奉为亚欧大陆“共主”的唐高宗，有义务帮中西亚的属国“存亡断续”，但在此前后，唐高宗和他的贤内助则天武后，最急于处理的还是天可汗唐太宗留下的高句丽问题。

一 新罗女王

隋唐之际，第二棒（隋炀帝）与第三棒（唐太宗）帝王选手先后出兵辽东，朝鲜半岛的三国态度也值得玩味。首先看一看这一时段在位的朝鲜半岛三位国王：

高句丽　宝藏王（642—668年在位）
百　济　义慈王（641—660年在位）
新　罗　善德（女）王（632—647年在位）

高句丽一直是孤军奋战隋唐帝国的大军；百济最初号称要做隋唐大军之向导，但是战事一开，却采取静观其变的中立态度；新罗呢，则努力越过高句丽、百济两国，试图与大唐帝国建立直接的联系。

对于新罗这种急迫的“亲（隋）唐”心态来说，可以举出两个新罗僧人的例子，一个是圆光，一个是慈藏。僧侣在乱世中，往往会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充当间谍情报人员的角色。这种情况，早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就屡见不鲜了。两位新罗僧人亦如此。

圆光的传记见于《续高僧传》，为唐新罗皇隆寺僧人，其实皇隆寺就是新罗著名的皇龙寺。圆光出使过隋王朝，在隋炀帝征讨高句丽之时，圆光把佛教的世俗“五戒”之一“不杀生”（梵语，ahijsā）去除，改成“杀生有择”。他的“五戒”中还有称“临阵无退”等，鼓励新罗人配合隋军去和高句丽战斗。本来佛教的世界观分真谛与俗谛，真谛（第一义谛）即“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超越国境、超越人种，当然是反对战争的；而俗谛（第二义谛）则承认现世的存在意义，包括国家与价值的差别。中古时代所谓的

护国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护国经》等就是阐发此第二义。《金光明最胜王经》尤其被推崇，有五种汉译本（五胡北凉昙无谶、唐义净等）、梵语原典、藏语译本、回鹘语译本、蒙古语译本以及满语译本，可见确实有“护国克敌”之奇效。

唐玄宗时代，一位叫作太贤的新罗僧人给新罗王讲授《金光明最胜王经》时说道：“以怜悯心而断彼（恶众生）命，由此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此阙烦恼故，意乐善故，生多功德。”这种僧人为战争、杀人辩护，同时自己亦举起破邪之剑，指挥降魔之军的情景，不仅在新罗，在敌对的高句丽、百济也有存在，让人不禁联想到欧洲十字军东征时的僧侣们。

第二位僧人慈藏，年轻时是花郎（本书后文会详谈），636 年入唐求法。归国时正好遇上唐太宗欲起兵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慈藏主动“乞偏师”，仅仅从这些本不会关心战争的僧人身上看到的举动，就可以知道新罗上下对于祈求大唐帝国出兵半岛是多么的渴望。

善德女王自己与唐太宗也有多层面的沟通，有一次唐太宗派人送给这位美丽的女王一幅牡丹图和一些牡丹花种子（唐人尚丰腴之美，刘禹锡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新罗大臣们都来庆贺，但善德女王却说，这花一定不香，因为画上面有花无蝶，“斯乃唐帝欺寡人之无偶也”。后来花开，果如其言。可见太宗与女王关系的一个侧面。

在女王统治下的新罗国内，有亲唐的归顺派，如新罗的旧贵族代表的毗昙；也有亲唐的自立派，典型代表即金春秋。毗昙于 647 年发动政变，企图推翻善德女王的统治，但政变被新罗新势力的代表金春秋成功压制。金春秋于 648 年入唐，回国之后，成为了新罗的新君主“武烈王”。在后期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他还在整个新罗境内大力采纳大唐帝国的舆服制度，也奉行大唐帝国年号。



新罗瑞兽形土器，韩国庆州博物馆

善德女王企盼唐太宗出兵能够攻克高句丽，谁知第一次不果，加之国内旧贵族毗昙政变，她也在 647 年去世。接替她的，在金春秋回国成为国王之前的，又是一位“胜曼资质丰丽”的女王——真德女王（647—654 年在位）。

再将视角从女王移到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五月，高句丽宝藏王与泉盖苏文遣使入唐谢罪，还献给唐太宗两位高句丽美女，这一次与其说是谢罪，倒不如说是出使刺探。“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唐太宗当即就退还了美女，还送了一张弓给泉盖苏文。泉盖苏文这次对待唐使，依旧倨傲无礼。也许他已经知道，即便再恭敬，大战还是难免。

一年多前，在驻跸山之役时，深通兵法的泉盖苏文，曾经勾结代替突厥而兴起的薛延陀部落可汗，企图夹击唐太宗，虽然没有成功，

但着实让大唐帝国重新考虑，如果要继续对朝鲜半岛用兵，那么漠北草原则不能出一点乱子。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铁勒部首先出击薛延陀部之后，动员了数州兵力，再次给予重击，让薛延陀实力大伤，无法再觊觎大唐帝国北部边境了。大唐帝国在薛延陀汗国故地设置了燕然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前身），不过对于雄心勃勃的唐太宗来说，何时才能在朝鲜半岛设置安东都护府，一了心愿呢？

北荒悉平之后，唐太宗再次将高句丽问题提上议程。这次有谋臣提出了一条与隋王朝平陈同样的战略，不断出动小股部队骚扰高句丽，伺机烧毁其粮食储备，则可一举平之。唐太宗采纳此议，同年三月，派海军万余，陆军精锐三千，出击高句丽，大小百余战，不以拔城为目的，俘获无数，有效地歼灭了大量高句丽有生力量。高句丽面对大唐帝国的新战术，大为惊恐，随即高句丽王就派其子高任入长安谢罪，于是第二次出征暂告一段落。

贞观二十二年（648），这一战略继续实行，同样也是海陆混合编队。消灭高句丽万余人。

不过这一战略最大的弱点就是时间，上天是不是留足了时间给唐太宗和真德女王处理半岛问题呢？经过接连两次的小股出击，唐太宗"议以明年（649）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这一年的冬天，新罗的新贵族代表金春秋（回国后成为真德女王下一任的新罗君主）入唐求助，宣誓对唐效忠，留子在唐宿卫。似乎，这次攻伐高句丽的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贞观二十三年（649）的五月，唐太宗因病去世，有人说是因为铅丹中毒，一代明君留下的遗诏是："罢辽东之役。"在他去世之前，继承人的问题甚至比高句丽问题更伤他的脑筋，最终选择李治为太子也是在其去世前一个月方才确定。详细的过程在此无法展开，只不过唐太宗写了一部四卷本的《帝范》留给了李治。东亚文明圈的

其他国家也视《帝范》一书为珍宝，晚近杨守敬就从日本带回了《帝范》古本（原收在日本《佚存丛书》中，“佚存”两个字至此也在近代学术史上愈加重要）。

据《唐会要》的记载，在唐太宗昭陵琢像侍立的蕃夷名位中，除了有“深鼻大眼”的铁勒、突厥各部酋长外，尚有一个令人醒目的名位：新罗王女德真。游玩过古都西安的读者都知道，唐太宗昭陵有所谓“十四蕃君长石像”，乃是其子唐高宗李治“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服、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新罗女王就位列其中，她当然不属于“擒服”，故当属于“归化者”，也就是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观念中，新罗是自己的小盟友。但这十四石像在清末就已遭到了破坏，2004 年《碑林集刊》公布了最新的考古报告，据说发现了新罗女王下半身的残石。

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649—683 年在位），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巨大遗产，也继承了父亲没有解决的朝鲜半岛三国问题。让李治最无法释怀的是父亲遗著《帝范·阅武篇》的几句话："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唐太宗把这句原本是六朝《刘子》中的话，抄入《帝范》规劝儿子。按照六朝人的文法，这两句话，重心不在前而在后，即忘战则民"殆"上，天资不如其父的唐高宗，自然不敢"怠"慢当时最大的朝鲜半岛问题。

当然，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武曌（即"武则天"、"则天武后"），她在唐高宗在位的三十余年中，产生了很大之影响，这种影响，不待她成立大周政权之后才发生，而是伴随着整个唐高宗执政时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把唐高宗和则天武后合二为一，视作解决朝鲜问题的第四棒帝王选手。史书上称呼这对皇帝夫妻为"二圣"，颇有一视同仁的意味。

虽然唐太宗三次征讨高句丽并不完全成功，但绝不能说是失败，他留给唐高宗的遗产相当丰富：广袤的国土，高效的行政机构，作战有力的胡汉混合部队，以及充足的赋税。尤其是一批身经百战的将领，如契丹松漠都督府都督李窟哥（契丹人），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击败来犯的高句丽、靺鞨连兵，斩首数百，"契丹聚其（高句丽士兵）尸筑为京观"，虽然战役规模不大，但是却大大鼓舞了唐高宗继承父亲遗愿，出击高句丽的信心。此外耆旧名将如李勣、程名振、契苾何力（铁勒）、阿史那弥射（突厥），新锐如薛仁贵、婆闰（回纥）等人，让唐高宗和则天武后手中有充足的出牌选择。

尤其是三朝老将李勣，唐太宗李世民临终时将其外贬，并对儿子李治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一代雄主唐太宗，怀着对儿子李治的不放心，终于离开了人世。其实他最后还对李治耳语说，如果李勣"徘徊顾望"，就立刻处死！老辣的李勣早已看出这一戏剧性的"致命"考验，所以自然是毫无怨言地接受外贬，再顺理成章地被唐高宗召回，成为唐高宗时代出击高句丽的第一主帅。

再看一下唐高宗初期的朝鲜半岛，由于649年唐太宗大举出击的计划没有实现。泉盖苏文在边境问题上愈发强势，频频出击契丹、新罗，扩大高句丽在地区的影响力。

新罗亲唐派唐化政策的核心部门叫执事部，设立于真德女王执政期间，权力相当于唐代三省之总和。尤其是金春秋于648年入唐，参观长安的国学释奠，此后劝新罗人采用大唐章服，并劝新罗王废除新罗年号，奉行大唐帝国唐高宗的永徽年号，并于651年正月元旦正式贺正。这些举措，除了迅速提升新罗的汉化水准外，最直接的利害处在于让唐高宗觉得，新罗是半岛三国中唯一的合作对象。

这一阶段半岛南部的局势发展如次：

649年，百济出军攻陷新罗十余城，新罗真德女王派金庾信等出击，互有胜负。

650年（永徽元年）四月，真德女王派金春秋长子金法敏赴唐告捷。真德女王这次亲自手制一面《太平颂》的锦绣，文曰：

> 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
> 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
> 幡旗何赫赫，钲鼓何锽锽。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
> 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

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皇。

诗文本身无太多文才可言，但煞费苦心的暗示性极强。在尊奉大唐帝国的同时，女王反复提醒唐高宗，对于不奉命的外夷，当“剪覆”之。这几层意思，当然被唐高宗及他身边远比女王更加智慧的武则天读懂，当场册封使者金法敏为大府卿。唐罗联盟实际已经成立，并得到了加强。

永徽二年（651），百济义慈王也遣使入唐，但是，显然前一年新罗使者金法敏的出行大获成功。唐高宗降玺书与百济义慈王，明言：“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从金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度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这份玺书是唐、百济、高句丽最后决战前的非常珍贵的资料。从中大致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第一，百济在新罗之后，也想试探一下大唐帝国新皇帝对东亚局势之态度，但碰了一个大壁；第二，唐高宗已经看出百济、高句丽之间有同盟关系，并有大力介入半岛局势的决心；第三，大唐帝国拥有蕃汉“多国”部队，主力虽未定何时进发，但会先令契丹族骑兵试探性进攻。

从唐太宗去世，直至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大唐帝国一度停止了对高句丽的用兵——永徽六年是一个国内、国际都潜伏着巨变的年份。

国内，武则天终于说动唐高宗废王皇后，顶住关陇集团的压力，成为皇后，与唐高宗同掌政权，《旧唐书》上说：“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多病的唐高宗被称为“天皇”，而他强势的妻子则天武后被称为“天后”，这是中国史上少见的“二圣”时代。古今中外对于则



唐章怀太子墓《朝贡图》，陕西历史博物馆

天武后的兴趣，远远高过她的丈夫。早年，唐太宗有一匹叫作狮子骢的千里马，无人能驾驭，时为宫女的武则天对太宗说："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唐太宗"壮其志"，实际上，当他听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妙龄女子说出这席话，其惊讶程度不亚于突然面对百万敌军吧！

虽然则天武后已经准备好了对付高句丽的铁鞭、铁挝和匕首，她要说动自己的丈夫派出雄兵，征服她的公公所不能征服的烈马，但对于这时的"二圣"来说，首先面临的是西突厥、铁勒等西北问题，因为他们再次使得大唐帝国核心层无法抽身对东亚用兵。

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在唐太宗死后，再度公开叛唐。永徽二年（651），大唐帝国与西突厥的战争再次拉开序幕，总指挥依旧是李勣，他史无前例地创造出双行军总管制度：一位汉将（梁建方）率领三万

府兵，加上一位蕃将（契苾何力）率领五万回纥骑兵。这一制度极其有效，为此后东征高句丽、百济打下了基础。李勣在平定西突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名新秀——苏定方，苏定方在与沙钵罗可汗决战的过程中，面对十倍于己的突厥骑兵，摆开了步兵长矟方阵——这一阵法正是李勣当年随唐太宗出征高句丽的得意之笔。此战一举击败沙钵罗可汗，尽平西域。这一年是显庆二年（657）。

这一时期，大唐帝国的军事高层实际在酝酿着如何形成一个新战略。此后众所周知的先攻百济，再攻高句丽之计划，契机正在永徽年间。由唐归国即位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654—661 年在位）掌权，作为亲唐派的他，上表称遭到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报复式的打击，新罗已经连续丢了 30 余座城池。于是，这给了对于东亚问题沉默了好几年的大唐帝国一个绝好借口，“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

三 百济亡，百济亡

收到唐高宗玺书的百济王，惊恐万分，愈发加强了与高句丽、倭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同时，直到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大唐帝国灭国，它都没有再遣使入唐。

如前所述，西北问题一旦解决，大唐帝国就决定用兵东亚了，不过为了迷惑对手，依旧派出偏师，首先数次出击高句丽。如显庆三年（658），老将程名振及新锐薛仁贵率领府兵和契丹骑兵，大破高句丽，斩首 2500 级；显庆四年（659），老将梁建方和薛仁贵搭档，面对高句丽大将温沙门，薛仁贵再次“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又单骑突击，生擒十余位高句丽的神射手，高句丽人惊骇奔溃。这样的骚扰战术，在唐高宗时代共进行了三次（655年、658年、659年）。

遭受如此重大打击，高句丽国内万分紧张，就在龙旗飘扬的大型舰队，已经接近打造完毕，所有人都以为大唐



百济王妃彩画金装枕，韩国公州博物馆

帝国准备发重兵一举拿下高句丽之时，他们的兵锋却绕开高句丽，直指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原来在显庆四年间，大唐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准备攻伐百济，并限制日本遣唐使的在唐活动——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唐深知百济和倭国的同盟关系，防止遣唐使把情报告知百济。诡异的是，百济在灭国的前一年，灾异现象不断：白狐跑到宫中书案上；女尸浮生草津，长十八尺；鬼夜哭不绝……

次年（660）春，大唐帝国启用在征讨西突厥之战中立下大功的苏定方，为神丘、马韩等十四道大总管，正式发兵13万人，联合新罗兵5万人，同伐百济。百济都城井水赤如血色，似乎预示着灭顶之灾的到来。这次唐军的部队中，继续采用平定西突厥时的混合编队，有府兵，有蕃兵。大唐帝国的战术意图非常清楚，速战速决，拿下百济，以便今后对高句丽形成围剿之势。

苏定方的远征舰队发自山东莱州，舳舻千里，约与新罗王会师于百济都城。传说，一鬼夜入百济宫城，大呼："百济亡，百济亡！"旋即入地不见。百济义慈王觉得很奇怪，派人在鬼入地之处挖掘，得一龟，背有文："百济同月轮，新罗如月新。"巫者说："同月轮者满也，满则亏。"王怒杀之。另一位巫者吓得赶紧说："同月轮者盛也，如新月者微也。意者国家盛而新罗浸微者乎？"义慈王这下方才高兴，其实他哪里知道，大唐帝国的舰队已经快到白江（今韩国锦江）了。

据李氏朝鲜时代编修的地理史料《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说："谚传：苏定方伐百济，临江欲渡，忽风雨大作，以白马为饵而钓得一龙，须臾开霁，遂渡师伐之。"似乎指代苏定方即将钓得的"龙"就是百济义慈王。

敌报传来，百济义慈王赶紧问臣下攻守之策，有几位深谙兵法的谋臣，分别给出了三种迎敌方案：

甲：唐兵远涉溟海，不习水者，在船必困。当其初下陆，士气未平，急击之，可以得志。罗人恃大国之援，有轻敌之心。若见唐人失利，必疑惧不敢锐进。故行先与唐人决战可也。

乙：唐兵远来，意欲速战，其锋不可当也。罗人前屡见败于我军，今望我兵势，不得不恐。今日之计，宜塞唐人之路，以待其师老，先使偏师击罗军，折其锐气，然后伺其便而合战，则可得全军而保国矣。

丙：唐兵既众，师律严明，况与新罗共谋掎角。若对阵于平原广野，胜败未可知也。白江、炭岘，我国之要路也。一夫单枪，万人莫当，宜简勇士往守之，使唐人不得入白江，罗人未得过炭岘。大王重闭固守，待其资粮尽、士卒疲，然后奋击之，破之必矣。

甲、乙、丙三策虽然攻、守之程度不同，但均可一试。甲策意在攻，但对唐军江南部队的水战能力估计不足；乙策意在“各个击破”，攻新罗，守唐军，但能否同时应付唐罗 20 万大军是个未知数；其中，丙策最为稳妥，因为它直接击中大唐帝国远征军的软肋——以持久待劳对抗速战速决。但是，也许真的是天亡百济，义慈王居然三策均不取，听信了如下一条亡国之策：“莫若使唐军入白江，沿流而不得方舟；罗军升炭岘，由径而不得并马。当此之时，纵兵击之，譬如杀在笼之鸡、离网之鱼也。”此策居然自动放弃百济的南北两个天险——白江之口与炭岘（今韩国忠清南道大田市西）之关，危矣！苏定方和金庾信自然不会放过义慈王送的这一份大礼，于是大唐帝国的远征军渡过了白江口，而新罗部队也进入了炭岘山。百济最后的名将堦伯，率领死士 5000 人，与新罗 5 万部队大战于黄山（今韩国忠清南道连山），虽然四战皆胜，但寡不敌众，最终战死。2003 年，韩国拍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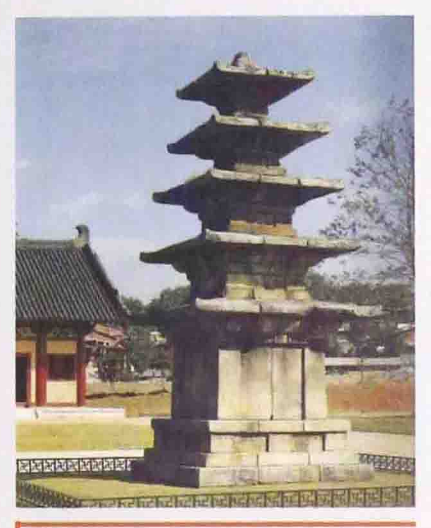
部叫作《黄山伐》的电影，就是以新罗、百济的这一战为背景。然而，该片多有脱离史实之处，且滑稽不堪。

于是，大唐帝国和新罗成功会师。苏定方又率军大败百济海军，上岸后以步骑直捣都城。苏定方严军兵列城下，义慈王自知不免，率太子大臣投降。苏定方将百济王和太子等人一同押回东都洛阳，从此，所谓的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一去不复返矣！



百济砂宅智积碑，韩国扶余博物馆

此后，大唐帝国将百济故地一分为五个都督府：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留郎将刘仁愿驻守百济故都。当时，有些唐军将领对于镇守百济感到没有必要，一位叫作刘仁轨的儒将，一语向大家道破了唐高宗的心思：“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睿智的刘仁轨此后到了则天武后的大周时代，依旧在政坛上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其敏锐的洞察力不无关系。从此，大唐帝国在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物资可以从山东半岛由海路补给，不必非要通过寒冷的辽东了。灭百济之役，韩国和日本的史料记载详于中国，因为，百济与高句丽，无疑高句丽



大唐平百济国塔，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定林寺

更吸引大唐帝国史官的注意力，而百济之灭亡，对于当时的半岛以及隔海相望的倭国来说，则是天塌一角的巨大事变（故而此后倭国决计出兵，企图支持百济遗族复辟）。彼此轻重不同，故详略不同。韩国最重要的一部古史《三国史记》在《百济本纪》的最后部分感叹道："以获罪于大国，其亡也亦宜矣。"

春天出兵，夏天破敌国都城，这一仗可谓是苏定方一生中的著名战役了。同年八月十五日，即灭百济都城后三日，大唐帝国的将士们于此地竖了一座大唐平百济国塔，此塔今存于韩国扶余郡定林寺，塔上的铭文则收载于清儒王昶的《金石萃编》中。

离拿下高句丽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作为第四棒的选手，大唐帝国的唐高宗、则天武后，无疑兴奋不已！特别是则天武后，她极力鼓励怯懦的丈夫大举前进的旗帜，因为一旦彻底打败隋文帝、隋炀帝，甚至唐太宗这前三位选手都没有拿下的高句丽，那么，不就证明了她自己是最伟大的"帝王"了吗？但是，两唐书的记载却隐隐有一些怜悯百济末代皇帝义慈王的味道，比如《旧唐书》称其为"海东曾、闵"，《新唐书》称其为"海东曾子"。这位亡国之君，到达洛阳之后不久就忧疾而死。唐高宗将其葬于洛阳，并"特许其旧臣赴哭"，但是至今"扶余义慈王墓"也没有在洛阳发现。据朝鲜古代史专家拜根兴教授介绍，2000 年，韩国扶余郡郡守（相当于市长）俞炳敦先生特地来到河南，将洛阳北邙山 20 公斤"灵土"带回韩国扶余郡祭坛，招魂、下葬，以慰这漂泊在海外 1300 余年的亡国之君之灵。

实际上，高句丽远比百济难缠得多。

平定百济的当年冬天，唐高宗就迫不及待任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为三大行军总管，分道进攻高句丽。虽然说，在半岛南部建立的大唐帝国远征军基地不断受到百济遗民的反攻，但南北合围高句丽之势，业已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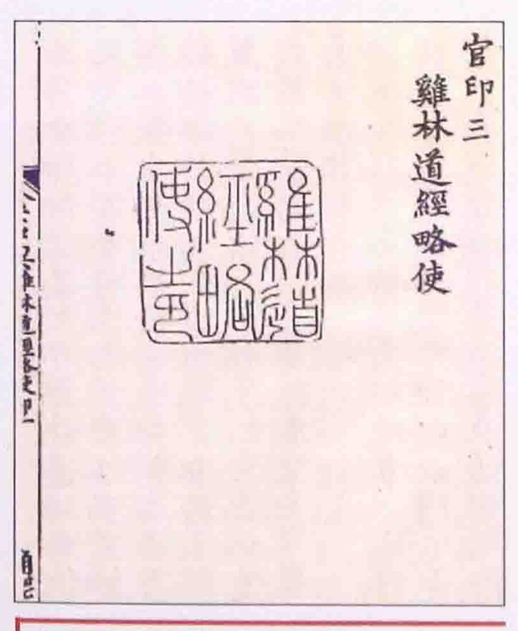
661 年的二月三十日，数州上报，均言见到了神龙，信心满满的唐高宗将显庆的年号改为龙朔。“朔”的含义很多，一为“始苏”，又为“北方”，清代的著名学者段玉裁解释道：“朔方，始万物者也。”五行中，北方尚黑，于五龙之义中正属黑龙，年轻的唐高宗和野心勃勃的则天武后，他们选择这个年号，大有玩味之处。韩非子说，龙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对于屡次触犯大唐帝国“逆鳞”的高句丽来说，这一次，发威的朔龙势必一举吞噬它！

“九虎一时入城，食人，捕之不获。”就在大唐帝国总动员之前，高句丽都城平壤也频频出现灾异现象。“九”乃天数，代表阳极之满，满则亏；“虎”则代表伐钺。改元“龙朔”后，唐高宗发动了河南、河北、淮南 3 道 67 州 4.4 万军士，外加回纥族骑兵——这或许是则天武后的怂恿，全部开赴辽东战场。这一次，生性懦弱的唐高宗，居然也欲像伟大的父亲李世民一样，自领大军，御驾亲征，不过最终还是被强势的妻子拦下了。此外，又有臣下劝谏，说了一套高句丽小国“征之未如勿征，灭之未如勿灭”的俗话，配合武后将唐高宗亲征之议拦下。武则天深知，第一，高句丽不讨不行；第二，自己的丈夫没有实际带军经验，直接指挥三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证明，她的两点预测

完全正确。

"朔之龙"的龙威，最先由出击的先锋契苾何力吼出，这位出身于铁勒可汗世家的名将，在鸭绿江岸边遇到了泉盖苏文之子泉男生的拼死抵抗。契苾何力趁天寒鸭绿江结冰之际，率领铁骑渡江，鼓噪大进，一举击败对岸的数万高句丽精锐守军，斩首三万级，追击数十里，仅泉男生一人逃走。正在唐高宗以为可以像数月前击败百济一样，一举拿下高句丽时，大唐帝国的北部边疆再次出现问题，回纥、九姓铁勒部试图反叛，唐军不得不回师击之。同时，伴随着大唐帝国几乎一同崛起的西方大患吐蕃，也趁唐军东征之际，对西域虎视眈眈。再加上随即严冬来临，外加百济故地的唐军基地出现问题。结果，短期内速战速决攻破平壤的计划没有成功。此外，这次出征，由于老将李勣并未出马，各道总管即便英勇过人，但缺乏统一部署，虽将平壤围城，最终未能攻拔之。

龙朔元年，新罗王金春秋卒，其子金法敏嗣位。唐廷诏以新罗国为鸡林州都督府，授予亲唐派的金法敏鸡林州都督之称号。当然，唐廷还同时派出了鸡林道经略使负责半岛事务。清儒阮元藏有一方鸡林道经略使之印的唐印，后来经过钱大昕等学者的鉴定，确凿无疑。清儒张燕昌《金石契》收有此印，并云："嗟乎！李唐拓地仅一方，华官杂治非久长。一印流传阅桑海，武功照耀今犹在！"



唐鸡林道经略使印，张燕昌《金石契》收

整个出征的转机，最终还

是发生在高句丽内部。

乾封元年（666），泉盖苏文去世，长子泉男生代父为莫离支，总掌高句丽军国大政，这引起了其兄弟泉男建、泉男产的不满，反目成仇，发兵攻击泉男生，泉男生逃至国内城（今吉林集安），遣子紧急向大唐帝国求援。泉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也受到攻击，他也想亡命大唐，但是受到发动政变的两个侄儿的阻击，只能率领4000余户向南逃至新罗。总之，这次唐廷不再犹豫，立刻派出契苾何力为安抚大使，率大军（古人受降如临敌）前往接应泉男生。事实证明，在不确定泉男生是否真心投诚之前，派出曾经大败他的契苾何力接受其投降，形成心理上的威势，是非常高明的手笔。

孟子曰："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这样的天赐良机，唐高宗和则天武后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派出的三军大元帅——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是70多岁高龄的李勣。对他来说，这是第三次踏上高句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东征，而此后的战绩足以给这位隋、初唐史上战神级名将的一生，画上一个极其完美的句号。

这次共有六位将官受李勣直接指挥，比如契苾何力等老将均为李勣副手，薛仁贵等猛将则统一受其节度，刘仁愿则从百济故地熊津都护府发兵，联合新罗部队一同北上与唐军主力会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李勣有了充分的指挥权，《资治通鉴》称"并受（李）勣处分"就是此意。大军一开始就摆开打持久战的架势，由北及南，步步推进，一则遇重城必攻，二则坚持围城打援的策略，伺机消灭高句丽的最后力量。于是连破新城（今辽宁抚顺北）、扶余城（今吉林四平）两座重城，在破城同时，消灭了高句丽有生力量十万人。这两次攻城战，薛仁贵均有极佳的表现。第一次在新城，唐军曾经遭到泉男建的夜袭，有赖薛仁贵的赴救方才挽回；第二次扶余城一役，薛仁贵再展

神勇，以 3000 人的先锋军破敌大部队。

高句丽君臣上下，对于唐廷重新启用李勣作为三军统帅惊恐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流传一部谶纬《高丽秘记》，有一句话叫："不及千年，当有八十老将来灭之。"高句丽建国从西汉算起，及此大略 700 余年，李勣年登 80，可谓与符记同。通晓天文的许敬宗还说："彗见东北，高句丽将灭之兆也。"负责运粮的大唐御史回朝曾经对唐高宗、则天武后汇报："李勣先朝旧臣，圣鉴所悉；薛仁贵勇冠三军，威名远震；契苾何力沈毅持重，统御之才；然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者，莫逮于李勣。"最高统帅能够"忘身忧国"，诸将又皆一时之选，故此次可谓步步为营，拔塞摧城，无坚不摧。第三座城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市郊）也被攻破，平壤就在眼前了！

总章元年（668），又是契苾何力率领胡族骑兵首先兵临平壤城下，李勣大军随即跟进，将高句丽国都团团围住。持重的李勣意图非常明显，乃是长期围困。一个月的坚守之后，平壤周围的高句丽部队几乎被李勣消灭殆尽，平壤沦为孤城，不久破城。



唐天王石像，上海博物馆

同年九月二十日，高句丽王高藏持白幡率泉男产等臣下投降。泉男建自杀未遂，一同被捕获，该年十月，出师在外近两年的李勣，押送近 20 万人的俘虏，振旅回朝，凯歌入长安。十二月，大唐帝国将高

高句丽旧地五部100余城划分为九个都督府，于旧都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辖之。至此，大唐帝国东至朝鲜半岛大部、南至中南半岛东部（印度支那半岛）、西至中央亚细亚、北至西伯利亚南部，这样广袤的地域均实现了羁縻统治，安东、安北、单于、北庭、安西、安南六大都护府均成功建成（其中北庭设置的时代略后）。作为第一长官的大都护，则由长安政府直接委派。

驻守平壤的大都护为20多年前的白袍小虎将——薛仁贵。这位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大都护，当他站在平壤城头，轻抚自己的白须，极目远望尚弥漫硝烟的战场，眼前是否会浮现出年轻时独闯敌阵的一幕？是否会想到当年在驻跸山大战时，唐太宗那赞许不已的目光？“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唐太宗这句话一定又在他耳边回荡。至今，辽东妇孺老幼仍无人不知“威震辽海”的薛仁贵。笔者留学日本时，遇到来自东北的朴彦兄，他告诉说当地父老闲聊时，还是常常以“想当年，薛仁贵征辽的时候”开场。

一切都暂归于平寂了。高句丽王死后葬在长安东突厥颉利可汗墓的左侧，一同作为大唐帝国功勋的证明。三军统帅李勣在回国一年后，病死于长安，唐高宗给予罢朝七日的殊礼，谥号“贞武”，陪葬唐太宗李世民昭陵。

最早投诚的泉男生，入唐后获得了高官厚禄。其后由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欧阳通所书《泉男生墓志》，这方墓志在民国年间于河南出土，据说险入日本人之手，最终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它不仅是书法史中的上品，也可从中看出唐、高句丽最后一战的激烈程度：

> 其年秋，奉敕共司空英国公李勣相知经略。风驱电激，直临平壤之城；前哥（歌）后舞，遥振崇墉之堞。公以罚罪吊人，

悯其涂地，潜机密构，济此膏原。遂与僧信诚等内外相应。赵城拔帜，岂劳韩信之师；邺扇抽关，自结袁谭之将。其王高藏及男建等咸从俘虏，巢山潜海，共入堤封；五部三韩，并为臣妾。遂能立义断恩，同郑伯之得隽；反祸成福，类箕子之畴庸。其年与英公李勣等凯入京都，策勋饮至。

其中，“五部三韩，并为臣妾”是大实话，但对于背叛自己国家、引唐军入境的泉男生自己来说，是不是真的“反祸成福”，则永远是一个谜了。至于说被俘到大唐的义慈王、泉男产，他们的墓志虽然也于民国年间出土，但因为在书法史上的名气不如《泉男生墓志》，所以至今只在极少数学者的研究中略有涉及，可谓不无寂寥吧。经过近二十余年的连番征伐，终于将高句丽克服。大唐帝国的东亚版图，终于恢复到盛汉时代的旧域了。父亲没有完成的遗愿，由唐高宗完成，隋唐两代四位帝王选手 4×100 米的接力赛跑，终于将东方顽敌高句丽拿下。朝鲜三国之中，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固有不同之处，盖高句丽本吾中华民族之一部，立国于东北，其种族与朝鲜半岛之南部别种，虽渐有繁殖，然究其源头，乃吾人之同根同源也，未能全然以“外”视之。至于说，当下欧美学界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以及日、韩一些学术书籍中，屡屡用“侵略”、“入侵”等字来形容隋唐诸帝的匡复旧境之伟业，乃不通古义，甚至可以说是曲解之心也。吾乡先贤柳诒徵《国史要义·史统第三》开篇即云：“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对于国际上某些不持正义的说法，作为中国的学者、读者，当保持十二分的警醒。

对中国国内来说，大唐帝国对东亚用武的时间，在有唐三百年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然而却影响至深。它一改以往的守势国防为攻势国防，几乎都是在境外用兵。虽然国内民众赋税加重，但国内几十年无战火，本土安全，由此奠定了有唐三百年的国际地位之基础，

甚至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在古代世界史上之地位。众所周知，三教圆融的大唐帝国，对于道教非常信奉，唐末五代时候有一本道教典籍《化书》，其中有一条叫《止斗》，文曰："止人之斗者使其斗，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斗者预其斗，善解忿者济其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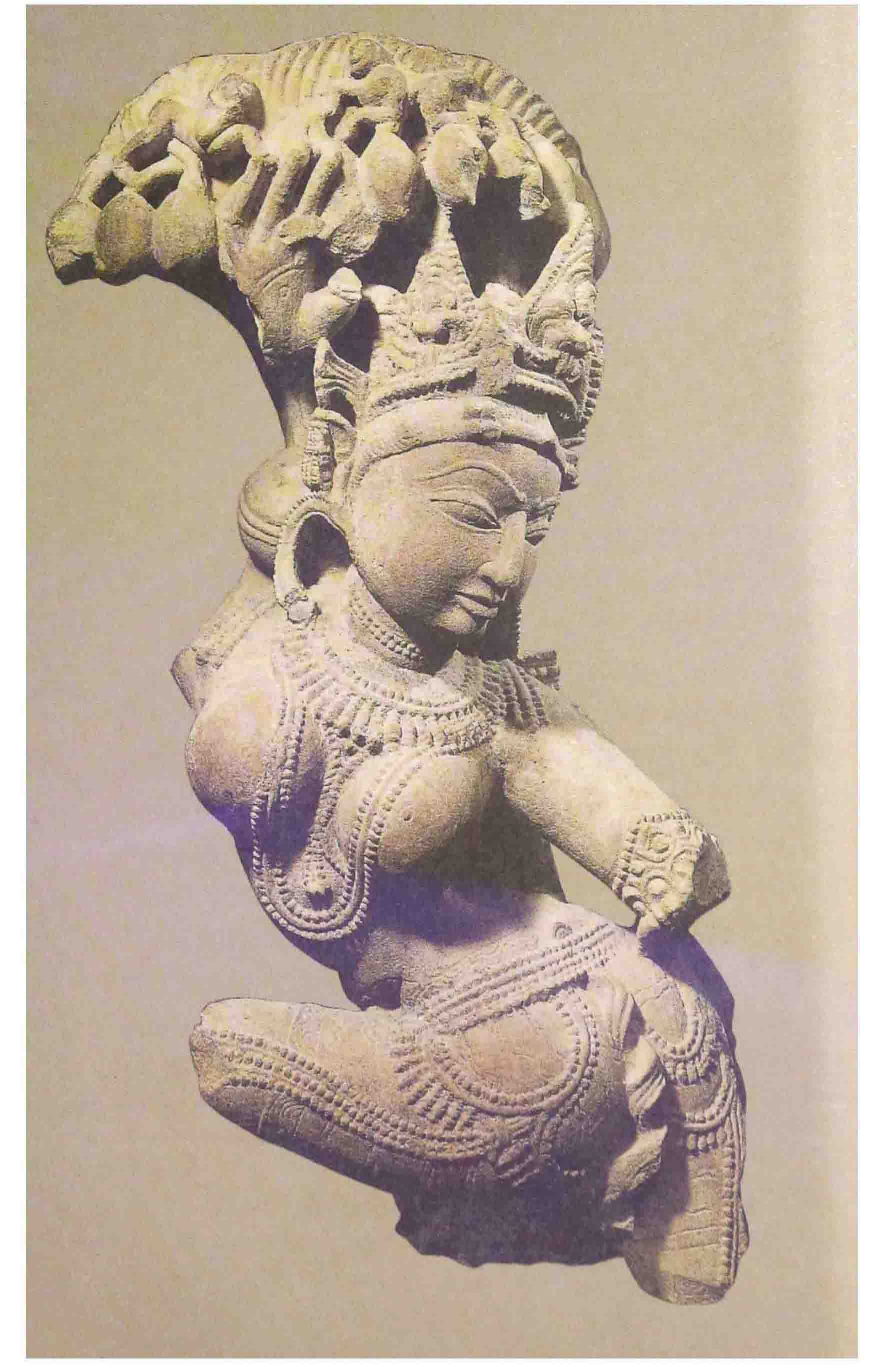


新罗金龙头饰，韩国庆州博物馆

就在大唐帝国龙朔年间大力经营东亚时，西边的吐蕃势力开始坐大，龙朔三年（663），吐蕃人侵占了原吐谷浑地区，而唐高宗正在全心关注着倭国与百济叛军的复辟阴谋，无暇西顾。当大唐帝国认真考虑西部问题时，吐蕃已经和西突厥残部结成联盟，大有切断西域之势。于是，朔之龙遂将龙首由东转向西，在东亚战场上的名将猛士如刘仁轨、薛仁贵等，多被抽调回大唐帝国的西边战场。同时，由于新罗自始至终承认大唐为宗主国，奉行大唐正朔，所以双方达成一致，最后由新罗成为了代表大唐帝国管理朝鲜半岛的新主人。

初唐大家骆宾王诗云："遥瞻丹凤阙，斜望黑龙津。"朔之龙很快又要以一个全新的炎凤凰形态再次出现了。676年，这一年的年号是唐高宗仪凤元年，从龙朔变成了仪凤，敏感的人已经预料到大唐帝国的最高层可能会发生巨变。同年，大唐帝国把安东都护府从平壤回撤至辽东城，原本留在远东震慑诸夷的龙爪收了回来。

大唐巨龙的宿命，很快就被则天武后暂停了近20年，这位志向谋略远高于新罗女王的女帝，随即建立起了周朝，定五德为火德，于是，一只新的炎凤凰从巨龙体内诞生了……



第五章

观音像

大唐帝国终于彻底击败了百济、倭国联军。再战失利的百济王族携带着大量珍贵书籍、礼器、佛像，在倭军的掩护下，永远地离开了朝鲜半岛，远渡扶桑。其中，也许就有一尊成了今天日本的国宝——百济观音像的原型。大唐帝国则天武后，也是一位热心佛教的人。而则天武后本人几乎又是东亚范围内女帝的偶像。日本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之间的关系，几乎就是唐高宗和则天武后的扶桑版。这位光明皇后极其崇拜则天武后，模仿中土的大云寺建立了国分寺。甚至则天武后喜用的四字年号也被模仿，“天平感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都可以瞥见则天武后的影子。

一 最后的荣光

平定百济之后，大唐帝国原本计划于龙朔年间，以百济为南部基地，合围高句丽之役，却未能完全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另一个东亚国家——倭国，加入了这场东亚大角逐。而这其中的经纬，恰恰又联系着中国、朝鲜、日本列岛，同时缓缓地把叙述的视角从武移向文。

可看出，倭国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利益角逐中，在与半岛三国的关系上，高句丽与倭国最远，百济和倭国是盟友，故而新罗就成了倭国战略进攻的主要目标。历史上，新罗最南部的某些地区，在4—5世纪的确存在过倭人的集团势力，而进入大唐帝国时代之后，百济灭亡也大大刺激了欲保有半岛利益的倭廷。近代明治维新之后，为了配合“征韩论”，有些日本东洋学者如那珂通世，甚至凭空捏造出一个六朝时代在朝鲜半岛的“任那日本府”。其说含有浓厚的政治殖民目的，早为中国、韩国、朝鲜的学者所弃（六朝时代，根本无“日本”这一国名）。

显庆五年（660），大唐帝国由名将苏定方率领大军，一举拿下了百济，但攻灭百济并不是大唐帝国的最终目的，



百济王妃用银制龙纹钏，韩国公州博物馆

苏定方旋即押送百济义慈王等人班师回朝，此后准备作为主帅讨伐高句丽的战争，留下了刘仁愿将军驻守百济泗沘城。

然而，百济灭国后的残兵依然占据着都城外的一些地域，不断骚扰唐军的驻地。这也是此后龙朔年间一时没有形成南北夹击高句丽的主要缘故——半岛南方基地之不稳。百济故将福信（又称“鬼室福信”）与僧人道琛据周留城（今韩国全罗北道扶安郡）谋反，并试图迎立作为人质留在倭国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中国史料有时称其为“余丰”，朝鲜史料称其为“余丰璋”，日本史料称其为“扶余丰璋”，实际是同一人）为新百济王。倭廷对此请求虽然答应了，然而在扶余丰回国前，妻以倭妇，授以倭官——其欲扶植傀儡政权之野心，路人皆知也！

各地百济残军得知王子回国之事，纷纷举兵相应。残军很快就将泗沘城团团围住，收到告急的唐廷立刻派出了带方州刺史刘仁轨率军救援，刘仁轨临行留下壮语：“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刘仁轨治军严整，一路战斗而来，大破城下之百济残军，百济死者万余人，遂解围城之兵。

关于刘仁轨，其实他本是一位文官，刺史一职就是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中国文化严格意义上的文武分途，似乎要到中唐之后。大唐帝国初前期的很多有责任心的文官们，领兵出阵，其智勇丝毫不逊武将。《论语》上说：“仁者必有勇。”真是千古明言！宋以后，过分崇尚文，社会风气以兵将为耻，文弱书生的形象于是被定格在中国人的潜在思维中，其实何尝知晓，从周秦至隋唐的漫长时间里，文官不一定文弱！

被刘仁轨击败的福信与道琛退军而走，因为两人失和，福信杀道琛而并其兵，兵势又大涨。另一个对唐军极其不利的因素是，龙朔元年的出师高句丽，并没有能一举拿下平壤，再加上西北局势又起风

云，故苏定方的高句丽征讨大军撤围回国。这一来，对于留在百济的刘仁轨与刘仁愿孤军来说，局势愈发险恶，很可能会遭到高句丽与百济残军的报复性猛攻，而且，新罗的运粮之路也被百济残军阻隔，唐高宗赶紧敕书与刘仁轨说，“一城不可独守”，要么退至新罗境内，要么赶紧回师。大唐帝国的远征军见皇帝敕书，也人人欲西归，但是英勇的儒将刘仁轨以《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助国家的事情，则可专之——坚决劝留这万余名帝国的将士，晓以厉害，众情乃安。而得知征讨高句丽大军回师的福信，愈发狂妄，甚至不把王子扶余丰放在眼里，军事部署一人大权在握，福信还写信给刘仁愿戏弄说：“大使等何时西归？当遣相送。”二刘乘其狂悖，再破福信之军于熊津，导致福信与扶余丰相互猜忌，最终扶余丰杀福信，同时遣使至高句丽、倭国请兵。

接到求救信号的高句丽虽然有心南下，但自己年年抵抗唐军，力有不支。而倭国在接到百济的救援请求后，最终决定出兵朝鲜半岛，对抗唐罗联军。因为自古倭国就谋求在半岛有一个立足点，百济是其盟国，今盟国被灭，眼看新罗有一统半岛的趋向，倭国决定力挺百济残军，亲自出兵。

早在 662 年，福信欲迎回百济王子扶余丰时，倭国天皇就派大将阿昙比逻夫率水师 170 艘战舰护送扶余丰回国，并资助福信大量军用物资，给大唐帝国的刘仁轨、刘仁愿造成不少麻烦。现今福信死，扶余丰独木难支，于是在 663 年，即大唐帝国的龙朔三年秋，倭国正式派出海军参战。

半岛南部的局势变化之快出乎唐中央核心层的预料，也超出大唐帝国的原出兵计划，于是唐高宗果断地向百济故地驻军的刘仁轨增派一支部队，由孙仁师率领，火速开赴半岛南部唐军阵地，与刘仁轨、刘仁愿合军，史书称“兵士大振”，形势逆转，唐军将百济残军彻底

从朝鲜半岛抹去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663年的八月二十七日，大唐帝国对阵百济、倭国联军开战，这一战一直打到第二天才结束。它决定了东亚中世此后文化、政治、外交发展的主脉搏。首先是大唐帝国分兵两路，一路由新来的孙仁师率领，连同新罗部队，直捣百济残军基地周留城；另一路由儒将刘仁轨率领水师及粮船约170艘，由熊津江开往白江。在白江口，刘仁轨遭遇到倭军主力，狭路相逢勇者胜，刘仁轨指挥分毫不乱，初一合战，倭军不利退守，唐军严阵以待。决战在第二日，当时的战况以《日本书纪》的资料来说明：

> 己酉（二十八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指倭兵）败绩。赴水逆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

这里的"不观气象"，并不是指玄虚的奇门望气术，而是说倭国和百济叛军没有审视他们的对手：治军严整的刘仁轨及其摆下坚阵的大唐水师。"夹船绕战"是指唐军从两翼攻击倭军，而且显然用的是火攻。据清儒汪宗沂所辑《卫公兵法》卷下"攻守战具"诸条可知，唐初大破突厥的名将李靖，就可以运用车弩、炮、抛车远距离发射"火箭"、"火杏"等火攻武器。此战，中国的《旧唐书》则说：

> （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我国众并耽罗国（今韩国济州岛）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

古人言："不期而会曰'遇'"。唐、倭海军在白江口遭遇，"烟焰涨天"，这一次刘仁轨围剿倭军之火攻战术取得大胜，百济叛军国王宝剑丢失预示着其大势已去。朝鲜的史料《三国史记》记载这一海战有"倭船千艘"，大唐帝国的水师以百余艘战舰，一举击溃倭国近千艘战舰。苏轼词所述"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儒将，不单单只应有诸葛孔明、周公瑾，大唐的刘仁轨也算一位吧。

这样的海战成绩，古代西方历史上，似乎只有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大海战可以类比，公元前480年的这次希腊同波斯帝国的大海战中，希腊人以300余艘战舰大败波斯帝国薛西斯的600余艘战舰，以己方损失40艘战舰的代价，击毁波斯人200艘战舰。战争经过被记载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第8卷中，此书商务印书馆早年有译本，此后不断重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与唐、倭白江口大海战对比一番。但从数量上看，刘仁轨的战绩远超当时的希腊联军。

白江口之战将此后大唐帝国在文和武两个领域统御东亚诸国的格局彻底奠定。所以于此役之后，高句丽讨平之前，唐高宗就让刘仁轨带回新罗、(故)百济、耽罗、倭国的使者，在乾封元年(666)，并同率领突厥、于阗、波斯、天竺诸蕃的使者，大封泰山，这又是一件其父唐太宗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史称："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

关于留守"远东"的二刘将军，《旧唐书》、《新唐书》都只有刘仁轨的传记，而均无刘仁愿的传记。论者皆以其颇为奇怪，其实在整个大是大非的半岛决断性问题上，均是刘仁轨拿定的主意，甚至不惜与皇帝冲突，可谓是帅，而刘仁愿则是一位非常称职的武将。有一方《刘仁愿纪功碑》现藏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博物馆，据说就是从泗沘城遗址出土的。从碑文可知，刘仁愿祖上是西魏、北周、隋的北方镇

将，和隋唐帝室武川—关陇系有深厚的渊源。彻底击败百济叛军后，刘仁愿和孙仁师凯旋归朝复命，刘仁轨统领驻军镇守百济故地。

百济复国运动失败后，不甘心在世仇新罗统治下的百济皇室、士族与遗民，源源不断渡海逃至倭国。这些人中间，除了携带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背着汉文典籍、佛经、医书，拿着农用、百工器械，甚至虔诚地捧着观音菩萨像，纷纷来到倭国，此后虽然复国无望，但百济文化的种子，却在扶桑的土地上发芽、生长……倭廷对于旧日盟友的故臣给予较高的官职，大多发挥其才智，使之效力于东瀛。

至今在日本的滋贺县蒲生郡日野町，还有一座鬼室神社，据说就是为了祭祀白江大战后，率领一部分百济遗民来到倭国的鬼室集斯。鬼室集斯和被杀的百济残军首领鬼室福信是亲族，据日本史料《新撰姓氏录》记载，约一个世纪后，这一家族被日本天皇授予了“百济公”姓。这部《新撰姓氏录》书的“右京诸蕃”下专门有“百济”条，可见渡来扶桑的百济遗民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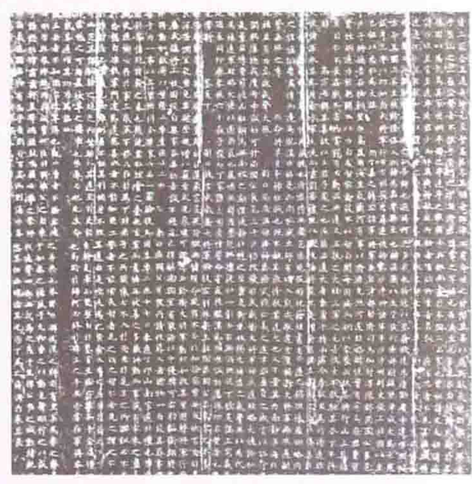


唐刘仁愿纪功碑，韩国扶余博物馆

当然，也有一部分百济遗民被带到了唐朝。比如，此后在西北战场上为大唐帝国效力的百济投诚名将黑齿常之，其墓志虽然于1929年就在洛阳出土，



汉“乐浪富贵”瓦当（平壤乐浪区出土）



《燕国公黑齿常之墓志》

但直到被收录在李根源的《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6年版）中方才被今人广知。章太炎先生曾经在苏州给其中黑齿常之的墓志题跋云：“前数岁洛阳新出泉男生墓志，逾五六年而此志（黑齿常之墓志）继之。二子皆乐浪名将。地不爱宝，先后献瑞，岂三韩王气未尽，犹有楚人三户之望耶？”章太炎先生所谓“乐浪名将”，就是指高句丽的泉男生与百济的黑齿常之。又如2011年在西安郭杜镇出土的百济《祢军墓志》，也引起了中、日、韩三国学界的关注。

虽然纯粹武力的角逐在整个东亚的中世里，占的份额并不大，但却决定了此后整个文（文化、文学、典籍交流等）的发展趋势，甚至是发展基调。可以说，如果没有白江口之战，也许历史上就没有那么多遣唐使；如果没有征服高句丽之战，大唐帝国的璀璨文化就不会以如此深广的幅度泽被整个中世的东亚……

二 百济观音

在今天日本奈良的生驹郡斑鸠町，有一座世界闻名的法隆寺。它创建于日本飞鸟时代的607年，即中国的隋炀帝大业三年。其中，西院伽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在它的大宝藏堂里面，供有一尊国宝级文物——百济观音像，像高210.5厘米，与我们通常所见的佛像相比，瘦长了许多，右腕在肘部垂直前伸，手掌朝上，左腕自然下垂，但从侧面看，则略有一些向前抬起，手中拇指、食指二指夹持一法器水瓶。上半身着僧祇支，下半身着裳，披以天衣。整个观音像飘浮在一种奇妙的缥缈氛围中，早期在未能定名时，又一度被人称为虚空藏菩萨像。

古文书《法隆寺诸堂佛躰数量记》云此尊百济观音："虚空藏菩萨百济国ヨリ渡來"（虚空藏菩萨来自百济国），但是这一段重要史料，却有意无意被现今日本的博物馆、图书资料所隐去，给民众造成百济观音从古至今就是日本国宝的错觉。然而，这尊宝像到底是不是白江口之战后，百济流亡王族带去日本的呢？抑或是大战爆发前（唐高祖、唐太宗时期），由前任百济王送往日本？似乎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百济观音像，日本奈良法隆寺

早期的日本学者并不

隐讳其由朝鲜半岛渡来的事实，如和辻哲郎《古寺巡礼》一书就说："百济观音是经由朝鲜渡来日本的显著样式之一例，起源是中国的六朝时代，甚至有人说可以追溯到由西域来的犍陀罗。从其上半身几乎裸露的形态来推测，也有可能是印度风格。然而，不论是像犍陀罗还是像印度系统的百济观音，与其说他是犍陀罗佛或印度佛，毋宁说更像汉代的石刻画像，我想它整体上是没有西域风格的。"《古寺巡礼》一书文辞优美无比，这里所谓的犍陀罗，是指诞生在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的多元化佛教艺术，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长安、新罗、日本……不过这尊百济观音，和辻哲郎认为，属于不含西域元素的、典型的汉—南朝中国本土纤细风格。

1997年，这尊百济观音出国，在巴黎的卢浮宫作为"法国的日本年"唯一国宝展出。后来到了"日本的法国年"，巴黎方面则展出了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不过当时就有人质疑，为什么日本拿来的"国"宝是百济观音呢？这就要追溯本书所涉及的东亚中世纪时代，倭国日本与百济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今天，百济已经成为嵌入日本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了。

大约尚在南朝梁元帝时代，据《日本书纪》倭国钦明天皇即位第十三年（552）十月的记载所书，百济国王送给倭王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并经论、幡盖等物，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由百济渡来佛教、佛像的记录，非常重要，原文引用如下：

> 冬十月，百济圣明王（又称"百济圣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驱、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别表赞流通礼拜功德云：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办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

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是日，天皇闻已，欢喜踊跃，诏使者云：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

可知，倭国此前没有佛教，佛教的传来是经由“天竺—中国—三韩—倭”这样一条线路。百济王在送佛教、佛经之时，称其“周公、孔子尚不能知”，这大约是比附之辞。此外，同书同一年的五月记载中，高句丽联合新罗攻百济，百济即遣使倭国求救兵，可见中古时代百济与倭国在政治、军事、文化多个层面的互动。但是，百济王在这里说佛教“远自天竺，爰洎三韩”，因为六朝骈文文法“远”、“爰”二字的缘故，所以中间没有提到中国。

中国佛教传入朝鲜三国，以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

高句丽的佛教是在 372 年，由前秦帝国传入；百济的佛教则由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由胡僧摩罗难陀传入。

《大毗卢遮那成佛经》部分，日本奈良西大寺

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的君王们就十分信奉佛教，比如有人劝石虎废除佛教，石虎就反驳说："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同时非常尊重龟兹僧人佛图澄，氐族的君王苻坚也同样尊佛，派往高句丽的僧人为胡僧的可能性极大。高句丽接受佛教后，举国上下都很信奉，比如高句丽辽东城的名僧——僧朗，南齐时来到南京的栖霞山成为住持，弘扬三论之学。后来中国三论宗的鼻祖吉藏，就极其追崇这位高句丽僧人。吉藏临死前写了《死不怖论》，认为死不可怕，生才可怕，因为有生必有死。后来吉藏的高足又有一高句丽人，法名慧灌，隋代入华求法，于唐高祖年间东渡扶桑，弘扬三论，是日本三论宗的鼻祖。

另外，关于高句丽末期佛教值得一提的事件是，泉盖苏文独揽大权后，也许是因为他个人的信仰问题，或许欲以鬼道降众之故，强迫高句丽王废佛崇道，源源不断从大唐帝国引进道教元素，比如竟然让全国人疯狂地信奉五斗米教等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中国道教思想。《三国遗事》记载了住在高句丽盘龙寺一位高僧普德的故事："时普德和尚住盘龙寺，悯左道（即五斗米教）匹正，国祚危矣，屡谏不听，乃以神力飞方丈，南移于完山州（今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孤大山而居焉。即永徽元年庚戌六月也。未几国灭，今景福寺有飞来方丈是也。"

全罗北道的全州，定名于统一新罗时代。高句丽的高僧将方丈佛寺用神力"飞"到新罗去，这一故事背后其实暗示着高句丽灭国之前夜，大量僧人、文化人士南逃的事实。与大唐帝国征讨高句丽战争有关联的高句丽僧人，还有一位叫惠亮，临阵投靠了新罗的将军。还有，当李勣大军最后兵临高句丽平壤城下时，泉男建主张固守，委托自己信赖的僧人信诚守城，但信诚却"密遣人诣（李）勣，请为内应"，结果终结了高句丽的历史。

从东晋赴百济的僧人虽然也是胡僧，但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高句丽导入的是北方（十六国北朝）系统的佛教，而百济导入的是南

方（东晋南朝）系统的佛教，此后正如法隆寺的百济观音一样，被百济又传至倭国。南朝时代的陆杲撰写过一部《观世音应验记》，说一位百济僧人发正来华之事："有沙门发正者，百济人也。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义趣，亦明精进。在梁卅馀年，不能顿忘桑梓，还归本土。""不能顿忘桑梓"，就是不忘百济之意。百济僧人发正在梁朝三十多年，在归国途中听闻了《法华经》中关于观世音菩萨信仰的故事。众所周知，中国的观世音信仰由来已久。早在三国东吴的五凤二年（255），西域胡僧支疆梁接就译有《法华三昧经》六卷。西晋的竺法护在太康七年（286）译有《正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最为世人推崇的译本，则是姚秦的胡僧鸠摩罗什在弘始八年（406）译出的《妙法莲华经菩萨普门品》（简称《普门品》）。鸠摩罗什的这一译本精妙无比，伴随着法华思想在中古时代的普及，观世音菩萨的信仰渗透到六朝的庶民社会中，并在唐代定格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将近1600年后的今天，各大寺庙的佛经流通处依旧提供的是鸠摩罗什译本。



唐兜跋毘沙门天立像，日本京都教王护国寺

观音信仰在六朝隋唐时代大盛，以至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动手创作的佛典，被称为"伪经"或"疑经"（相对于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典

而言），其中就有不少六朝观世音的伪经，比如《高王观世音经》，牧田谛亮博士、周一良教授都说此书与东魏北齐的强权者高欢有联系，不无道理。还有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佛说观世音三昧经》（估计是奈良时代的钞本）等，可见六朝隋唐时代中国的观世音信仰，有力地影响到朝鲜半岛三国和倭国。除了“伪经”，六朝人还大量写作了一些《应验记》之类的作品，日本京都大学现今还藏有《观世音应验记》古钞本的写真件，原件即在京都的青莲院。

在半岛三国中，新罗接受佛教最晚，采用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的说法，应该是在第 23 代新罗法兴王时期（从“法兴王”三个字也可以看出端倪），后来第 24 代真兴王接受了南朝陈文帝的经书馈赠，佛法在新罗方才“真兴”。在新罗一统半岛的过程中，上层社会不遗余力地推崇佛教。其中，圆光、慈藏这两位新罗僧人的特殊言论，非常引人注意。可以说：僧人、战争、外交，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比如《三国遗事》记载，慈藏入华，忽然神人问他为何至此，慈藏答曰：“我国北连靺鞨，南接倭人。丽、济两国，迭犯封陲。邻寇纵横，是为民梗。”这是很典型的佛教为本国服务的第二义。当然，新罗的最高统治者看到佛教有助于一统民心，共同对外，当然也就十分尊奉这样的高僧了。在慈藏回国后，雇佣百济工匠建成的九层皇龙寺，据说每一层都是要降服一个国家：

第一层：日本
第二层：中华
第三层：吴越
第四层：托罗
第五层：鹰游
第六层：靺鞨

第七层：丹国

第八层：女狄

第九层：秽貊

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高宗和则天武后，如果知道新罗修建皇龙寺的最终目的，决计不会将在平壤的安东都护府回撤到辽东，而将整个半岛放手给藩属国的新罗。

五百多年后，最终朝鲜半岛没能抵挡住蒙古铁骑的进攻，皇龙寺被蒙古人付之一炬，今只留下了一些断石残垣。

百济亡国后的残军首领一度是鬼室福信与道琛，后者就是僧人，实际在三国乱斗中，新罗僧人也冲锋陷阵。朝鲜封建时代末期的一位叫李能和的学者，于朝鲜被日本吞并后，在日本的严酷殖民统治下写了一本《朝鲜佛教通史》，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一名叫道玉的僧人，在新罗统一战争时，就对弟子说："我形桑门，无一善可取，不如从军，杀身以报国！乃着戎服，改名骤徒，诣兵部请从军。及战，突阵力斗，亦死之。"还有，新罗一统三国的文武王金法敏，临终遗言，死后要在国家的东海口遵照佛教仪式火葬，并以一个"爱国"佛教徒的口吻说："朕身后愿为护国大龙，奉崇佛法，守护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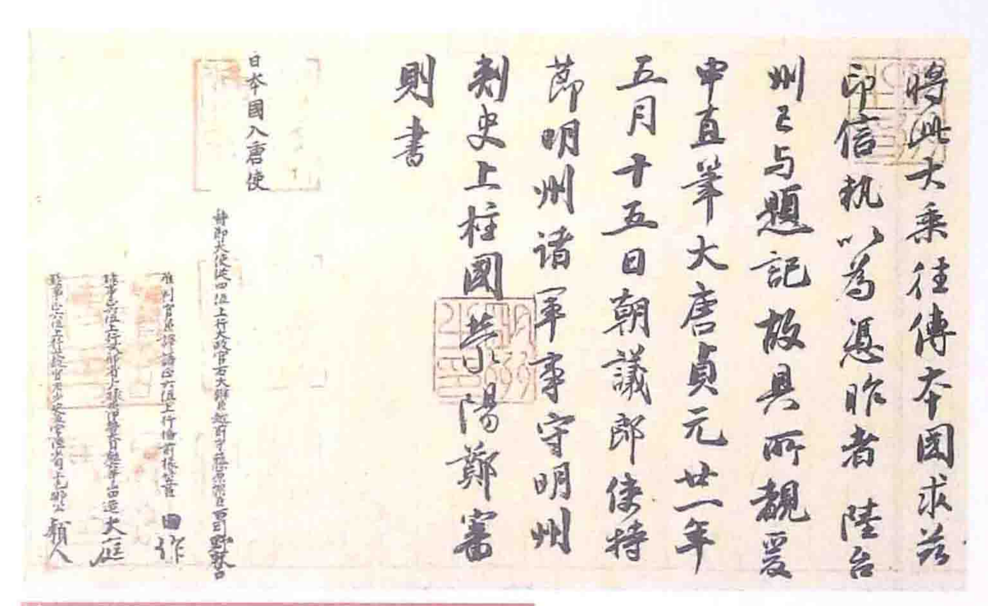
在统一新罗时代，最为有名的僧人，当然是超越了保家卫国第二义的慧超。他在唐玄宗时代入华，23 岁从广州出发，从海路赴天竺求法，回到长安后，像前辈名僧玄奘一样，远离尘世，一心译经，弘扬佛法。玄奘留下了《大唐西域记》，而慧超则留下了《往五天竺国传》，后一部书的钞本残卷于 1905 年被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发现，公之于众，举世大惊。两书相隔半个世纪以上，但同为不朽之著作。

三 遣唐使的侧面

大唐帝国体系下的中世东亚诸国的联系，业已越发紧密，最大的例证是，当一国发生巨大变化时，其冲击力往往会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波及东亚其他国家。

白江口大败之后，“日本的势力从此在朝鲜半岛一扫而空”（外山军治《隋唐世界帝国》语）。《日本书纪》记载大败翌年夏五月，刘仁轨遣使入日本。刘仁轨此举无异于敲山震虎，因为此时高句丽未下，唐军无法分兵继续追击日本；但为防止日本再度进入半岛，故遣使宣大唐之威。此举果然有奇效，日本朝廷自从战败之后，就组织大量的民力，在本岛各战略要地，修建防御工事。为了防止唐军进攻本土，日本在政治中心太宰府周围筑建山城，全力加紧防人、烽火制度。667 年，又将都城迁至易于防守的近江。同时派百济故臣、工匠连筑三城以防唐军来袭。日本近代研究“满鲜史”的著名学者之一池内宏说：“若吾人知晓当时之情势，可知此（大修防守工事）为杞人之忧。”这也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后知之明，开个不恰当的玩笑：假使池内教授自己“穿越”回大唐帝国时代，看到一波又一波倭人败军和百济残众仓皇渡海逃来，恐怕也会迫不及待地给天皇出谋划策如何在海边修建围墙吧？

更重要的是，一直到则天武后的大周时代（8 世纪初），日本因为恐惧都暂停了遣唐使的派遣（这是遣唐使的空白期，历来为了将遣唐使塑造成和平交流使者形象的人，大多对此视而不见）。不过，当他们重新派出遣唐使时，发现大唐帝国的胸怀，根本没有日本人自己想象得那么斤斤计较，依旧向这个曾经开战过但现今亟须提升文化的国度，源源不断地输出了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先进的汉文明，包括


将此大乘往传本国求法
印信执以为凭昨者 陆台
州已与题記故具所覩覆
中直筆大唐貞元廿一年
五月十五日朝議郎使持
節明州諸軍事守明州
刺史上柱國滎陽鄭審
則書
日本国入唐使

《传教大师将来目录》卷末，日本滋贺延历寺

知识、典籍、文物、人员等，给予日本的制度、学问、思想、宗教、科技、艺术、风俗习惯以巨大影响。古代日本文化的最大一次飞跃就在大唐帝国统御下的东亚世界里完成的。

遣唐使，又称“西海使”或“入唐使”。白江口之战前，虽然倭廷也派出过遣隋使、遣唐使，但态度傲慢，比如第二章提及的致隋炀帝无理国书事件。加之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让倭国有些小视中华王朝，以为不过如此，所以才敢贸然支持百济残军，与大唐开战。一败涂地后，方晓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之大。在目前可考的 19、20 次遣唐使中，除了唐太宗时期一次外，其余全部集中在唐高宗（7 次）和唐玄宗（12 次）时期，而奠定倭廷下决心学习大唐的，绝不仅仅是大唐的文德，最直接的原因，依旧是白江口之败的武威。夫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到了中世之后，这种反求诸己的行为，只能说是外交的一个侧面。遣唐使的派遣频率如下表。

隋唐时代与日本遣唐（隋）使派遣对照表

中国	遣唐使次数	出发时间	大使名称	备注
隋王朝				隋王朝期间日本共派出三次遣隋使。
唐太宗	第一次	630 年	吉上长丹	
唐高宗（则天武后）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653 年 654 年 659 年 665 年 667 年 669 年 702 年	高田耕麻吕 高向玄理 坂台部石市 守大石 伊吉博得 河内鲸 高桥笠间	案，669 年为唐高宗击灭高句丽之翌年。第七次与第八次遣唐使间隔长达 31 年。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日本遣唐使派遣间隔平均在 1.5 年左右。
唐玄宗前期	第九次 第十次 第十一次 第十二次	717 年 733 年 746 年 752 年	阿部安麻吕 多治比广成 石上乙麻吕 藤原清河	前后期转折点初步定在唐玄宗天宝十载的怛罗斯河之战。
唐玄宗后期	第十三次 第十四次 第十五次 第十六次 第十七次 第十八次 第十九次 （第二十次）	759 年 761 年 762 年 777 年 779 年 804 年 838 年 （894 年）	高元度 仲石伴 中臣鹰主 佐伯今毛人 布势清直 藤原葛野麻吕 藤原常嗣 （菅原道真）	最后第二十次遣唐使由于中国本土的时局并不安全（黄巢之乱），故而未能成行。

可见在第七次（669）和第八次（702）之间的时间间隔最长，这不是文化原因，而是明显的政治军事原因。遣唐使在大唐帝国东亚政策格局下，长久以来被“和平文化交流”旗帜掩盖了多面相。

比如，初唐的八次遣唐使中，有七次都是处于对外极盛的唐高宗时期。奈良时代前半期又恰好相当于唐玄宗执政时期。安史之乱发生以后，从奈良时代后半期至平安时代，仅仅三回而已——强则学之，弱则弃之。这正是日本民族的固有心理。以古视今，当下的美国可谓

曾经让日本吃尽苦头，而日本犹以宗主国尊之。

又如，日本入华，自古有通过半岛的北路，以及直接渡海的南路。按常理判断，当然是北路安全，毕竟当时日本的航海术远远谈不上先进二字（走南路几乎每次都有灾难）。但从第七次和第八次遣唐使之间有一道分水岭，即第八次开始几乎全部是由南部海路入唐，为什么呢？因为原本半岛上的亲倭政权高句丽、百济都相继灭亡，新罗一统半岛后，本质上与倭廷抗礼相争，从敌国境内通过就十分困难了。

从日本派往大唐的人员约可分为三类：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我们习惯上通称为遣唐使，其实细分来看，以第一类人装备最为充足，但他们抱有浓厚的政治目的，稍有风波，往往爱惜生命就推辞不来中土。比如，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年间，原本已经任命了遣唐使，结果第二年又改为送唐客使，终不了了之。又如，有一位遣唐使的副使叫小野篁，自己称病不肯去大唐就算了，还作了一首《西道遥》（收在《古今和歌集·羁旅歌》中）讽刺遣唐使。原文是：

わたの原　やそしまかけて　こぎいでぬと　人にはつげよ　あまのつり舟

有人把它汉译为："我向茫茫岛上行，生涯从此类浮萍。孤舟一棹成千里，借语渔夫告友朋。"怨恨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第二类是留学生，又可细分为长期在唐的留学生与短期学习的请益生。从推古天皇十六年（622）开始，圣德太子第一次送出留学生，此后一直络绎不绝。日本的留学生来唐后，大都在文化核心的洛阳、长安等地活动。其中有两位成绩斐然，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一幅珍品《吉备大臣入唐绘卷》，非常有趣，描绘



井真成墓志，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了吉备真备入唐接受测验，得到鬼（仲麻吕）的帮助，逐一解决了难题。中世纪亚洲人对鬼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恐怖，不如说憨态可掬。

此外，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一些原本在历史上没有留名的日本遣唐使也逐渐被世人获知。2004 年 9 月，在西安东郊出土了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铭》，所谓姓“井”，有人推测应该是“葛井”或“井上”的单字化处理，很可能与北魏孝文帝将鲜卑复姓改为汉式单姓一样，都是景仰汉文明之故。这方墓志铭记载了一位鲜有提及的日本遣唐使之生平，它目前藏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2005 年第一次东渡扶桑奈良，回到了它的故国参展。大致说来，第二类留学生入唐的政治目的也很重，比如学习唐朝的法律、教育、政治制度，再一一应用于本国。据东野治之教授的研究，日本国内开始让有学问的人担任类似宰相一职，也是明显地学自唐朝的政界。

在三类入唐的日本人中，留学僧可谓是政治目的相对较小而文化意义最大的一类人。

日本入唐的僧人，如果细分的话，则有留学僧、请益僧和还学僧三种。留学僧是指长期在中国求法学习的人；请益僧指短期在中国求法的僧人；还学僧指本人学问传自中国僧人，再度回中国来留学。从广义上统称为留学僧。

东亚中世的文明圈纳入大唐帝国的天下秩序之后，宗教传习方面，日本留学僧逐渐登上主要舞台，他们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业绩。

从推古天皇开始至阳成天皇 270 多年间（约中国隋文帝至唐僖宗），日本留学僧在史籍上可考的不下八九十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遣唐使。

这其中，对于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贡献的被称为平安朝的“入唐八家”：最澄（传教大师）、空海（弘法大师）、常晓、圆行、圆仁（慈觉大师）、惠运、圆珍（智证大师）、宗睿。从士人（遣唐使、留学生）与僧人的比例上来看，前者往往怕远怕苦、推三阻四不来，而后者却呈现出越来越庞大的趋势。甚至在遣唐使废止之后，留学僧依旧络绎不绝。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恐怕与宗教的执着信念有关。比如，日本总持院一位叫做济诠的名僧想留学唐朝，故而向圆珍大师求教唐土风俗以及唐语的学习法。但是大师一言不答。济诠离开后，圆珍大师对弟子说：“济诠乃为求名而去唐朝，非为信念也，无信念则不可入唐。”其二，寺庙团体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比如，日本留学僧的经费来源除了朝廷以及显赫家族（藤原）等的援助外，尚有比叡山、高野山等教团的支持。

一位明治时期的佛教学者村上专精论述道：

> 从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到奈良朝（710—794）终了，其间有二百三十馀年。当时的佛教，按其性完全可说是现世佛教。



唐钞《五部心观》，智证大师圆珍携归，日本滋贺园城寺

作为现世佛教的结果，便是与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当时的佛教可称之为政治佛教。

这一段分析非常精辟，再略加申发一下：第一，中国中世的佛教虽然也有政治性的倾向，但大唐帝国的高僧辈出，于整体风气上试图摆脱政治佛教。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僧人自始至终有一种自觉地摆脱王权的努力，而日本僧人则自觉地向世俗王权靠拢。比如说，虽然中国六朝前期有过“沙门不敬王者”论，但在刘宋时期最终被迫确立了沙门拜王之制度，正如中村元博士在其名著《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中所云：“虽然最后中国的宗教变得从属于国家了，但是佛教徒本身从来没有强调过国家意识。”第三，贯穿六朝、隋、大唐帝国初盛期，日本、朝鲜半岛等政权的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远还未达到学派佛教的境地。特别是日本的佛教，可以说甚至到了21世纪之后，都依旧主动地与政治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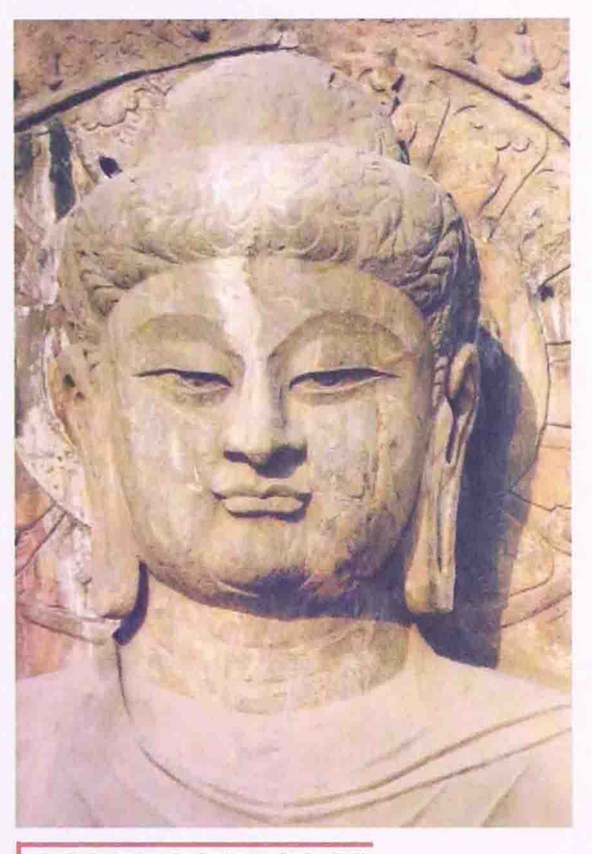
四 大云经与女帝

白江口之战后至则天武后执政时期，中国佛教与日本留学僧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隋唐佛法的东渡，使日本之佛教寺宇、僧伽制度，均效法中土。比如日本各地的国分寺，就是由留学僧回国后，模仿则天武后的大云寺建成。在唐中宗复辟之后，中土的大云寺摧毁殆尽，今天也只有在日本尚可一睹其遗容余韵。又如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大佛，就是效法则天武后的龙门石窟大佛或洛阳白马阪的巨铜佛像。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分出新的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玄奘也创立了一宗：法相唯识宗，但这一宗与印度渊源比前三者深，而且对于信奉者本身的学问修养要求极高，换言之，就是要读极多的佛经才能入此门，所以玄奘的宗派让僧人望而却步，但玄奘始终受到唐皇室的信赖与尊敬。

显庆元年十一月，则天武后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唐高宗的第七个皇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在皇子诞生前一个月，玄奘奏启唐高宗："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则天武后临盆时，恰巧又有一只炎凤凰——赤雀飞到庭院上，为玄奘所见，后果生下一皇子，按照和帝王的契约，这位皇子被称为佛光王，他的名字叫李显，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愚钝的他，后来竟然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将大唐帝国被则天武后中断的国祚重新振复。

当百济、高句丽降服之后，大唐国内的环境也愈发对则天武后有利，此后她的政治野心越加膨胀，欲代替大唐帝国的龙脉，成为新的皇帝。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

则天武后充分利用了佛教的力量。今天，游玩洛阳龙门石窟的旅客在奉先寺那尊巨大的、高约 18 米的卢舍那佛前，一定能听到导游小姐说："这是则天武后自己的形象。"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北魏的皇帝就曾经明确下令按照自己的相貌铸造大佛。这尊由则天武后特捐两万贯钱修建的卢舍那佛，正是她踏上大唐帝国最高帝座的一个步骤。因为卢舍那佛，又称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卢舍那佛与密教有非常深远的联系，是密教最高的佛，其梵语本义是"光明普照"，指万物之慈母。末法时代到来时，拯救世间的，正是这样光明普照的大地慈母般的佛，故塑造成则天武后自己的形象，其义就不言而喻了。

此后，在现实王权已经不成问题的基础上，则天武后为了达到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亟须摆脱一个理论上的困境：女人可以称帝吗？这在儒家经典中是绝对不可能、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于是，她再一次把希望寄托到了佛教上。很快，她的男宠、白马寺"妖僧"薛怀义报告，在佛教经典中找到了女人称帝的依据！原来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北凉的名僧昙无谶于417年所译的《大方等无想经》，简称《大云经》，

此部佛经收在《大正藏》第 12 册中。此经的第三十六、三十七品讲述了一位净光天女的故事，为了拯救众生，她保留了女儿身。佛陀预言，在她涅槃后的 700 年，她将以公主的身份重新降生，世界也将接受她的统治。原文是：

> 汝于彼佛暂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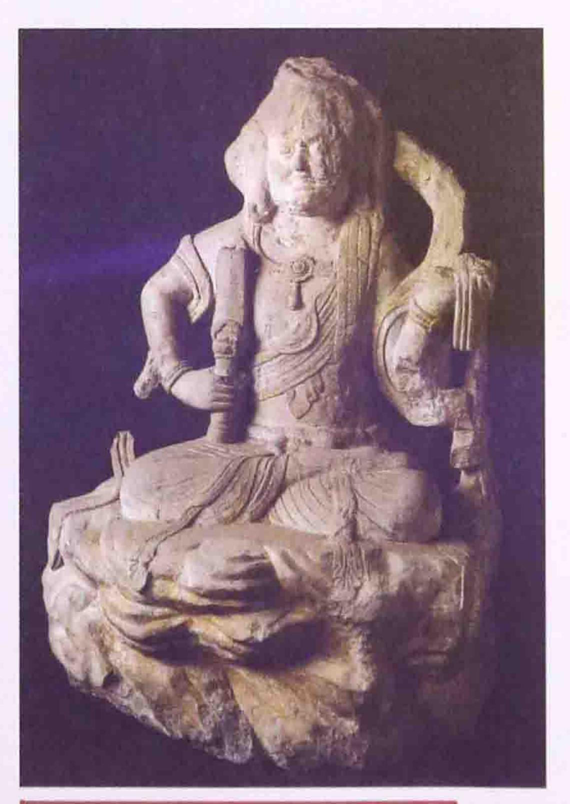
则天武后闻听大喜，命令众僧对《大云经》重新作“疏”，告知天下，佛已经转世为女王了！同时她以圣母般的身份，敕令大唐帝国统御下的各蕃国（北至大漠、南迄交趾）、各州郡，均建立大云寺，专门讲授《大云经》。据《旧唐书》记载，在接受此经后的两个月，信心十足的她宣布“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此后，因为历代正统史家对这位女性的痛恨，所以大多说这部《大云经》是伪造的佛经，清代第一流大学问家沈曾植看到相关的敦煌卷子，最先告知王国维，内典中确有“黑河女王”（即净光天女）之事。后来王国维、陈寅恪等，根据敦煌发现的《大云经疏》，考证出本有此经，非则天武后全盘伪造也。另一位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因为得到了一份敦煌出土的北朝《大云经》钞本，兴奋地建了一座大云书库。

佛光王唐中宗重新恢复了唐国号之后，取缔了大云寺，而在各州各地重新设立了中兴寺（旋即又改称龙兴寺），大唐帝国的龙脉再次复苏了。

中国史上的女帝时代，则天武后是唯一的。然而在彼邦日本，且不说与隋文帝、隋炀帝约同时的推古女天皇，仅在飞鸟、奈良时代，就至少出了六位女帝。则天武后无疑都是这些女天皇学习、效仿的最

佳对象。尤其是称德女天皇（764—770 年在位），她宠幸僧道镜的事件，好似则天武后与薛怀义的日本版。今天在奈良的东大寺，也有一尊卢舍那大佛，气势撼人，也是效法则天武后龙门大佛的一个翻版。特别是则天武后那种将现世王权与佛教结合，尤其是与密教结合的做法，深深地影响到了扶桑。这其中的传递者，无疑以留学僧为主，而且很可能是 702 年入唐的日本僧人道慈，他在帝都长安向名僧善无畏（637—735）学习法相宗、密教长达 18 年之久。

密教与显教相对，兴起于天竺，尊奉最高的神为大日如来，又称"摩诃（大）毗卢遮那（日）佛"，也就是则天武后在洛阳龙门石窟所凿的卢舍那佛。密教的经典，在西晋时就已经译成中文，日本空海非常推崇的《孔雀王经》（讲述密教真言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神），但大规模的翻译、传习，还是要到唐代。至于说密宗，指其进入中国后形成的与华严宗、天台宗等相提并论的宗派。密教最初由天竺的龙树、龙智创立，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所谓"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土。其修行有特殊的秘印（手势）、秘明（咒语）。六朝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外国胡僧，一般兼修密教；而大唐帝国将东亚纳入自己的天下秩序后，来中国求法的东亚诸国僧人也对此十分热衷。日本



唐不动明王尊坐像，西安碑林博物馆

僧人道慈在唐期间，恰好善无畏译出了密教第一经典《大日经》。日本佛教史上的大名僧空海，不仅是善无畏的再传弟子，而且融会贯通了《大日经》，在日本创立了至今还有很大影响的密教真言宗。

日本密教与现世王权结合紧密的最好证据，可以从空海与护国经（《金光明经》、《仁王经》）的关系窥见一斑。这与朝鲜半岛征讨战争中，新罗僧人向新罗王讲授《金光明经》的情形类似，不过空海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护国经讲授，把“镇护国家必须依靠密教教法”的新概念加之于日本。空海特别推崇的是《孔雀王经》等密教经典，通过“咒力”，达到驱难护国的效果。唐末，密教极盛，故成一宗。日本、新罗来学者极多，携带回大量密宗经典。倒是中土经过唐武宗“会昌灭佛”的法难之后，加之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密宗经典散逸，学者凋零，密教于此失传，但在日本反较盛行了。



第六章

秦王乐

《兰陵王入阵曲》、《秦王破阵乐》，真的是一种纯音乐的交流吗？在古代，音乐的内涵和影响是超出乐曲本身的，其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出了后人的想象。隋唐时代的乐曲与尚武的精神，是互为表里的。朝鲜半岛乐舞文化与大唐帝国的东亚秩序也有千丝万缕的瓜葛。鲜卑武士之美，在乐舞中有深刻的表现，花郎道又将乐舞与武术结合得更加完美。纯粹文化交流的背后，其实也包含了东亚政治的大背景。

一 兰陵王入阵曲

日本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时代，一位来自安南林邑国的留学僧佛哲，在大唐帝国看到了一曲奇异的乐舞，音乐修养极高的他，立刻将其记下，后来带到日本。这就是《兰陵王入阵曲》，简称《兰陵王》。这舞曲传入日本的时间，大约比鉴真东渡早十余年，但一度被保存在鉴真于日本奈良所建的唐招提寺中。当时，败于白江口之战的日本朝野，均欲一睹这位林邑僧人带来的与战阵有关的大唐舞曲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朝野上下择吉日在奈良的春日大社观看此舞。《兰陵王》的表演者头戴一副类似恶魔的狰狞恐怖面具，锐鼻怒目，身穿紫衣，腰横金带，手持一鞭（或称执桴）开始起舞，伴随着雄浑的乐曲，左突右刺，节奏越快，则舞姿越刚猛，仿佛一位叱咤风云的神秘将军……天皇观看了这一曲悲壮醇厚、苍凉古朴的乐舞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兰陵王”彩绘插页

后，大喜过望，立刻定其为日本“雅乐”之最正者，并于每年开春在奈良的春日大社演奏祭祀，直到21世纪的今天。

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兰陵王》呢，要从头说起，兰陵王，高肃（字长恭），为北齐皇族名将，按辈分他是东魏权臣高欢的孙子。正如唐诗所云：“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肃自幼精于骑射，武艺超群。十几岁就参加正式战斗，屡立奇功。

北齐河清三年（564），北周联合突厥人以十万大军围困北齐重镇洛阳，情况十分危急。在洛阳城外的邙山之侧，一位身披重铠、面戴一副恶魔面具的将军，率领500骑兵，突入北周大军，左击右射，往复冲击数次，使北齐军心大振。但守城的北齐将士不知城下这位恶魔是谁，迟迟不敢放下吊桥开门。于是恶魔摘下面具，原来是北齐皇子、兰陵王高肃！大家欢呼雀跃，军心大振，一举击败了北周、突厥联军。为什么兰陵王高肃要戴着面具出阵呢？原来他是一位美男子，史书称“貌若妇人”，自以为如此俊美的容貌不足以威慑敌人，所以戴着一副雕有盘龙的恶魔面具杀入敌中。北齐的鲜卑武士们为了纪念这次反败为胜的大捷，共歌谣之，时人“效其指挥击刺之容”，把这一歌谣编成舞曲，称为《兰陵王入阵曲》。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这可谓是非常精当的推论。虽然在政权的正统继承权上，隋唐承接北周，但音乐系谱上，则应该是北齐—隋—唐。隋文帝灭陈之后，有所谓“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含《百济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后来隋炀帝时又增至“九部乐”。其中第一个《国伎》即是《西凉伎》，大有西北苍凉之气；第二个《清商伎》则是南朝之乐。大唐帝国继承了隋王朝“乐有四海”的宏大气势，对于英勇的胡族将士，尤其推崇，当年这位勇冠三军的兰陵王，其精神正是大唐帝国建业

期所亟须的。故而《兰陵王》这一雄浑的破阵舞曲，入唐后依旧风靡全国。

则天武后当政时期，她的皇孙、年仅五岁的卫王（唐玄宗的弟弟），就当着则天武后的面，起舞弄《兰陵王》，表演之前，口中还念念有词："卫王入场，咒愿神圣。神皇万岁，孙子成行！"遗憾的是，这一经典舞曲，在初盛唐之后，雄浑之气慢慢被改掉了。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被归为软舞。而且这一由北齐、隋、唐相继传承的军阵之舞，大约在五代北宋之后，就于中土完全失传。今天尚可窥得一些当年此曲之鳞爪的，只有当年留学僧带去日本的《兰陵王》了。



兰陵忠武王墓前石像，河北邯郸

中世日本的音乐，大致可分为古乐和新乐。中国唐以前的古曲称为古乐；新罗、渤海一带传至日本者称为新乐。如果再用舞蹈分类，则从大唐帝国、天竺传至日本者称为左舞；从原高句丽、百济、新罗传至日本者称为右舞。《兰陵王》无疑属于古乐和左舞类。

1920 年，河北磁县兰陵王高长恭的墓在修建公路时被发现，出土了一方《兰陵王高肃碑》。这一碑的碑首也有六龙盘绕，龙尾细长而下蜷，好似"恶魔"面具上的蟠龙。主额镌阳文四

行16个篆字："齐故假黄钺太师太尉公兰陵忠武王碑"。碑阴则有五言诗一首，其中两联是："望碑遥堕泪，抚墓转伤情。轩此终见毁，千秋空建名。"这位美男子兰陵王高肃，最终没有死于战阵中，而死于北齐宗室之间的猜忌，让人不无感慨！施蛰存《北山集古录》有吟咏云："兰陵王气未终穷，大字丰碑出閟宫。虎跃龙骧真健笔，长歌破阵想雄风。"

近1400多年后，果真有人在其墓前"长歌破阵想雄风"了。那是距今二十年前的1992年，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那一年中日两国的氛围比当下要好得多。中日官方和民间都安排了许多文化活动予以纪念，最让人兴奋不已的是：日本雅乐的重要演奏机构——奈良的春日大社，来兰陵王墓地"供奉演出"舞曲《兰陵王入阵曲》。人类历史的回环往复，有时真让人难以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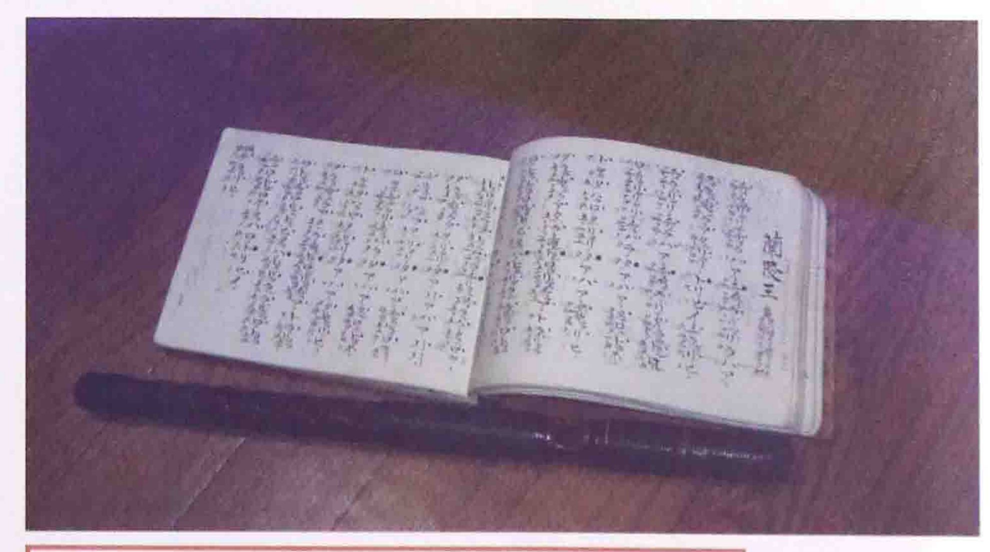
2007年岁末，喜爱古琴的日本友人稻垣裕史兄在自己的京都住所中召开古典音乐雅集，当时来了好几位会演奏乐器的日本同学，京都大学中文研究室的二宫美那子弹了琵琶，东洋史的太田麻衣子弹了和琴（日本古筝）……我是其中唯一的中国留学生，所以也应邀弹了两首古琴曲目《良宵引》和《酒狂》。最让我难忘的是，同在中文研究室的八木坚二君，用"龙笛"演奏了《兰陵王》的第三节，声音跌宕起伏，抗坠有序，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冲击力，让举座屏息。八木君是奈良春日大社乐团最年轻的成员。正是这一乐团，曾于1992年赴河北兰陵王墓前演出。当我提及此事时，八木君兴奋地说："是的！当年就是吾师去了邯郸演出，我所用的龙笛就是吾师所传呢。"他演奏之前，先将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春日大社"御用"龙笛给我抚摩，并将春日大社的钞本《兰陵王》古谱摊开。目前这份古谱，除了曲目是中文外，记音大多已经用类似中国古代的工尺谱，间有假名，笔法工整。

日本的《兰陵王》等雅乐所用笛中，分“龙笛”和“高丽笛”。“高丽笛”顾名思义来自中世的朝鲜半岛，有六个小穴一个大穴；“龙笛”则特指来自大唐帝国，有七个小穴一个大穴。八木君自己的专业是研究语言学，他曾开玩笑地告诉我，正是因为奈良春日大社每月有集体演练，无法脱身，所以暂不能来中国留学；倘若来中国留学，老师傅就不会将这把世代相传的“龙笛”托付给他了。八木君看到我意犹未尽，就极力邀请我来年去奈良春日大社看一出完整的《兰陵王》舞曲。

2008 年春，我如约坐电车去了奈良，照地图很快找到了春日大社，完整地观看了一次《兰陵王》乐舞。可惜当时不能摄像、拍照，我只能根据自己的日记，用文字回忆一下当时无比激动的心情：

《小乱声》：龙笛独奏，随着拍子，头戴蟠龙“恶魔面具”的兰陵王，盛装踏入场内。

《陵王乱序》：龙笛和其他笙、筚篥等乐器同时和声奏起，



奈良春日大社龙笛与《兰陵王谱》，日本八木坚二藏，笔者摄

兰陵王舞者左突右刺般地开始起舞。

《啭》：音乐停止，兰陵王独舞。

《沙汰调音取》：兰陵王舞曲停止，诸种乐器演奏。

《当曲（陵王破）二帖》：应该是此曲的主旋律部分，往复似有两次。

《安摩乱声》：兰陵王缓缓退场，龙笛独奏，结束。

以上是按照曲目记载了各部分的内容。此曲唐代传到日本总分为“序”、“破”、“急”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破”中，本应有“舞”和“啭”，今日只留存“舞”而已。的确，在春日大社的演出中，到了《啭》的部分，音乐就戛然而止。有人说《啭》即是用唐音演唱，而我私下以为，《啭》应该最初是用北齐的鲜卑语演唱。可惜千百年后，当时大唐帝国如何用“唐音”来“唱”出《兰陵王》，我们已经无缘再聆听了。

中日两国的古典音乐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兰陵王》其实传自唐代的林邑曲目《婆竭罗龙王》（简称《罗龙王》），而非大唐本土之曲目。对此有一个铁证反驳之：所谓林邑曲目《罗龙王》来自天竺佛教故事，龙太子为了拯救本族被大鹏金翅鸟吃光的命运，主动舍身饲“鸟”，其舞则表现龙王之八岁女得佛教“正觉”的内容。总之，其主旋律是佛教中不作抵抗的“大慈悲”精神——与头戴“恶魔面具”突入敌阵的鲜卑武士之精神完完全全相反呢！

二

秦王破阵乐

传入日本的唐乐，还有《秦王破阵乐》。

秦王李世民曾经大破西北军阀刘武周与突厥联军（有些类似北齐兰陵王大破北周与突厥联军），那一仗史书称“日中八战”，战况惨烈无比，突厥人从此记住了这位叫“秦王”的皇子。为了纪念这场著名的战役，将士们制作了这曲《秦王破阵乐》，后来唐太宗亲自画了《秦王破阵乐舞图》：队形为左圆右方，前方战车，后方有编队；有的像水中的鱼儿，排开鱼丽阵，有的像群鹳散开，排开鹅鹳阵；将士交错相应，首尾呼应。共有强壮的乐工 120 人，披甲执戟。整个舞蹈凡为三变，每变又换为四阵。进退击刺，总听号令。《唐会要》称，当时帝都的文官、百姓观看后惊讶万分，武将则慷慨激昂。“观者覩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烈将咸上寿云：‘此舞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对于《秦王破阵乐》的意义与影响，音乐史研究大家任半塘先生曾经说：“《秦王破阵乐》，乃唐代第一乐曲，犹近世国家之有国歌。传于外国，远达吐蕃、日本、印度。”诚是不刊之论。然而，唐太宗更希望将自己的兵法精髓传于后人，这一点，似乎只有大破东突厥的名将李靖看出来了，他说，此《秦王破阵乐》前出四表、后缀八幡，乃四头八尾的“八阵图”！唐太宗赞许地说，兵法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所创的这一破阵乐，只有你能知道它的奥义！

到了唐高宗当政初期，文弱的他不敢观看这一粗狂的、阳刚之美的乐舞，所以一停就是近 30 年。直到臣下及则天武后给他建议，方才重启《秦王破阵乐》，且将乐舞人数减了近一半。然而，为了表示对父亲艰辛创业的追慕与尊

重，据说每奏《秦王破阵乐》，唐高宗总是站立而观。所以，消灭百济之后，天后则天武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公公——“天可汗”唐太宗，不等高句丽讨平，就迫不及待地劝说丈夫唐高宗去泰山封禅。作为封禅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大宴群臣的盛会上，则天武后特意让人演出了一出《秦王破阵乐》。战士们穿着银铠甲，手执长戟或斧钺，一进一退，战斗击刺，均跟随音乐，一如在真正的战场上，听从战鼓而冲锋……舞团的最前面由一个金铠甲的将军带领，仿佛当年征讨第一次高句丽时，唐太宗近卫队所披的黄金甲，他们共分八个单位，整个乐舞场面壮观无比，完全是大唐帝国盛世武威的写照。则天武后观看后亢奋无比，而她身旁那位多病的丈夫则在兴奋之余略有些惊恐。

即便大唐帝国经受安史之乱，到了中衰之际，《秦王破阵乐》武的精神仍然被保存着。据说有一个叫作“石火胡”的幽州妓女（很可能是胡人），曾经独自一人“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虽然只是一个胡女，但这里的“目眩心怯”四个字，不正是和唐太宗最初百人演奏此舞时，群僚百姓的“懔然震悚”是一个效果么？



唐石刻南方增长天王，法门寺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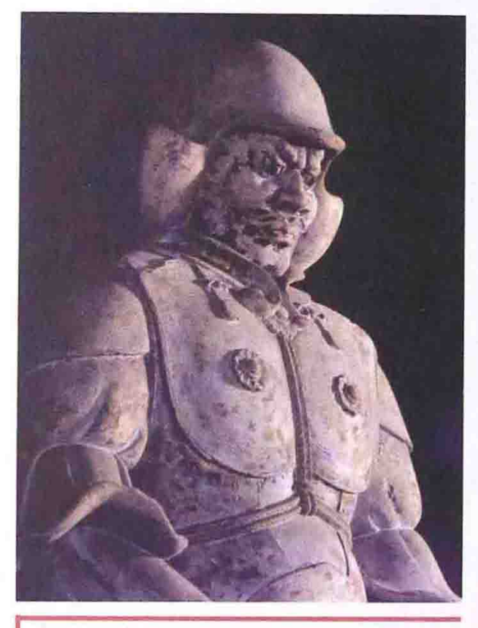
据江户时代的史料《大日本史》，文武天皇（697—707 年在位）时，《秦王破阵乐》由遣唐使粟田道磨传至日本。这一盛唐大乐传到日本后，引起的



日本藏《秦王破阵乐》古舞图，任半塘摹自《信西古乐图》

震惊，想必超过了《兰陵王入阵曲》吧。对于日本的朝臣、武将来说，大唐帝国讨平百济、高句丽，大败日本于白江口，其排兵布阵的精髓，说不定可以通过《秦王破阵乐》略知一二呢！今天，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还藏有《秦王破阵乐》演奏时所用的大刀、刀袋、接腰等器物，均题有“唐古乐《破阵乐》，天平胜宝四年”的字样。到了唐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音乐天赋极高，他对于《秦王破阵乐》有过两个改革，一是将原来 120 人的大型立部伎，改为只有 4 人的小型坐部伎，所以时人称之为《小破阵乐》，但在主题上，依旧表现的是大唐战斗之英勇，只不过人数少了之后易于表演。二是纯用数百名宫女来舞此《秦王破阵乐》，据说效果非常好。

今天日本京都右京区的阳明文库还藏有一份《古钞本五弦谱》，收载唐乐二十余曲，首列便是《秦王破阵乐》。日本的岸边成雄教授还指出，至今日本还藏有《秦王破阵乐》的古舞图两帧，后来任半塘将其黑白图收录于《唐声诗》中，依稀可见到盛唐武功神韵之雪泥鸿



唐十二神将立像之波夷罗，日本新药师寺

爪。另一位日本音乐史专家林谦三在《正仓院乐器研究》中，再将传入日本的《秦王破阵乐》细分为《秦王破阵乐》与《散手破阵乐》。其中，“散手”指《金光明经》中具有夜叉形象的“散指大将”，而《金光明经》就是被中世朝鲜半岛三国及日本非常推崇的护国经之一。

在大唐帝国武功极盛时期，不仅仅是东亚诸国汲汲于接受汉文化，天竺等南亚国家也听闻了大唐的威名。玄奘在天竺时，戒日王（中印度）、拘摩罗王（东印度）等都对此曲兴趣浓厚。戒日王就曾经问玄奘：“弟子听闻贵国有《秦王破阵乐》之歌舞，未知秦王是何人？”玄奘借机盛赞了“正国之天子”李世民一番。据陈寅恪先生考订，《秦王破阵乐》传入天竺，就在大唐帝国讨平高昌国之后。

三 新罗花郎道

上文所谈日本所存的唐乐与唐舞，均可看出，这些看似纯粹文化交流的背后，其实包含了东亚大政治的背景。至于朝鲜半岛乐舞文化，与大唐帝国的东亚秩序更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六朝初期，晋人送高句丽七弦琴一张，可惜高句丽国内无人会演奏。新罗“第二相王山岳”改易其法，成功演奏了一百余曲，据说玄鹤从天下飞下来，所以朝鲜半岛最早的乐器，就被称为玄琴。高句丽人酷爱音乐，能歌善舞，李白在《高句丽》一诗中说道：“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同时，这首诗题下有注云：“唐亦有高丽曲，李勣破高丽所进。”严格推算的话，在北朝时期，高句丽的乐舞就通过辽东地区进入大江南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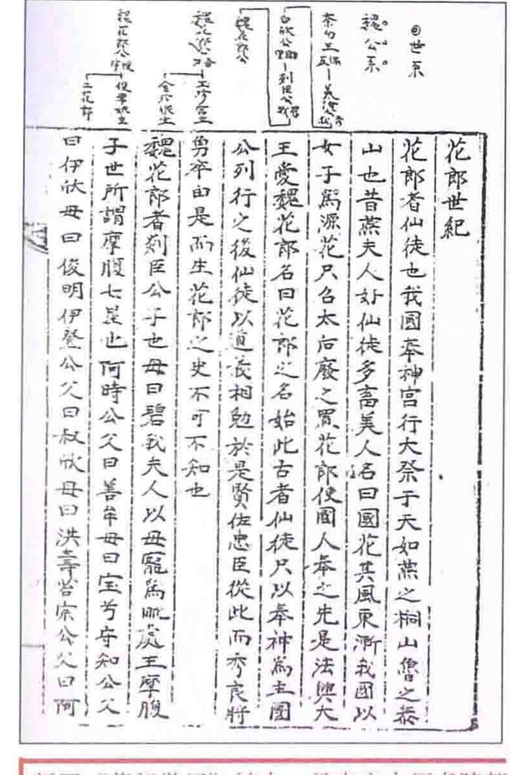
朝鲜半岛三国中，音乐成就最高的当属最早灭国的百济。《百济伎》在南朝就引入中国宫廷的正式演奏，隋朝有“九部乐”，唐太宗增删之为“十部乐”，《百济伎》的名字就赫然在目。对于大量进口百济文化



统一新罗十二支巳蛇立像，韩国庆尚北道挂陵

的日本来说，自然也喜好《百济伎》。731 年，日本宫廷的雅乐乐人中：大唐乐 39 人、百济乐 26 人、高丽乐 6 人、新罗乐 4 人。这个比例可以换一个看法：大唐 39 人对朝鲜半岛 36 人，显现出日本古代雅乐的两大系谱。其中，朝鲜半岛三国被引入最少的是新罗。

576 年，新罗的真兴王确立了“花郎”制度——花郎道。花是前缀的形容词，指美貌无比，郎用的是古义，指年轻的男子，所以花郎字面上就是指美貌年轻的男子（西方学者称之为 The Flower Boys of Silla），又有别称国仙、花主、风月主等。故花郎道又被称为风流道、风月道。



花郎世紀
花郎者仙徒也我國奉神宮行大祭于天如燕之桐山魯之泰
山也昔燕夫人好仙徒多畜美人名曰國花其風東漸我國以
女子爲源花只召太后廢之置花郎使國人奉之先是法興大
王愛魏花郎名曰花郎花郎之名始此古者仙徒只以奉神爲主國
公列行之後仙徒以道義相勉於是賢佐忠臣從此而秀良將
勇卒由是而生花郎之史不可不知也
魏花郎者剡臣公子也母曰碧我夫人以母寵爲毗處王摩腹
子世所謂摩腹七星也阿時公父曰善牟母曰宝芳守知公父
曰伊伏母曰俊明伊登公父曰叔欣母曰洪壽皆宗公父曰阿

新罗《花郎世记》钞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过一篇叫《论风流》的文章，指出中国的风流是一种人格美，与男女之事本无多涉。的确如此，古代风流一词总会令人联想到魏晋名士，然魏晋名士兰亭雅集等的韵事，大都属于无组织、无纪律的，一旦有组织、有纪律则不风流矣。新罗花郎则不然，有颇为严格的上下制度，高级别的花郎有门徒，门徒数量有规定。花郎最兴盛的时代是新罗真兴王（约南朝梁陈之际）至文武王（约唐高宗初前期），差不多完全吻合六朝后期新罗崛起，至其一统半岛的时代，并且在统一新罗时代逐渐消失。敏感的读者从这一时间段上大致能推出花郎的真正作用了，即处于上升变动期的新罗之特殊国

家级政治、军事青年团体。

据《三国史记》记载了一位名叫“斯多含”的早期花郎，本是新罗贵胄之家，有门徒一千人。真兴王时，16岁的斯多含请求从军：

> 真兴王命伊飡斯夫袭加罗国，时斯多含年十五六，请从军。王以幼少不许，其请勤而志确，遂命为贵幢裨将，其徒从之者亦众。及抵其国界，请于元帅，领麾下兵，先入檀梁（檀梁，城门名，加罗语谓门为梁云）。其国人不意兵猝至，惊动不能御，大兵乘之，遂灭其国。师还，王策功，赐加罗人口三百，受已皆放，无一留者。又赐田，固辞，王强之，请赐阏川不毛之地而已。含始与武官郎约为“死友”，及武官病卒，哭之恸甚，七日亦卒，时年十七岁。

此段记述的是新罗讨灭了朝鲜半岛一个部落联盟加罗国之事，花郎集团在其中无疑充当了先锋的作用。而且从斯多含与武官郎约为死友的这一细节，其实是花郎道最重要的特征。



统一新罗时代“鬼瓦”，日本天理大学

生死契约——这是一种年轻花郎战友之间的感情，所谓“义兄弟”，指男性之间有着宛如夫妻般的关系，这一点，恐怕有些受中国中古崇尚男风的影响。但在更深层次上，则如鲇贝房之进《花郎考》中所论述，将花郎同志之间的这种关系比成



新罗骑马武士俑，韩国首尔博物馆

中国古代的刎颈之交、断金之交，其实这原是两个战友之间的生死默契啊！好似柏拉图说的“神之友”的关系。

在新罗与高句丽、百济的无数次战争中，正是这些“少年冲锋队”的花郎道战友们，其所能凝聚的战斗力，远远超过数倍于己的敌军。新罗在东亚中世纪的迅速崛起，并不能简简单单用努力吸取汉文化来涵盖（百济吸取汉文化力度绝不亚于新罗），正是这样最大限度动员了本国的战斗力，方才是新罗国力上升的核心之一。在大唐帝国与新罗联军攻灭百济的最后一战中，唐军由海路入白江，新罗由陆路入炭岘。新罗与百济在炭岘之黄山有过一次大战，其中就有一位叫作“官昌”的花郎，尤其引人注意：

官昌，新罗将军品日之子，仪表都雅，少而为花郎，年十六……王出师，与唐将军侵百济，以官昌为副将。至黄山之野，两兵相对。父品日谓曰：“尔虽幼年有志气，今日是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其可无勇乎！”官昌曰：“唯！”即上马横枪，直

捣敌阵，驰杀数人……

虽然官昌最终被百济所杀，但新罗三军受其激励，慷慨出军，鼓噪大破百济。新罗僧人慈藏年轻时就是花郎的成员，从中可知在中世纪的新罗，僧人与花郎在某种意义上有重合之处。

笔者以为与新罗花郎道最相似的西方形象，是打败过强大的斯巴达军团的古希腊忒拜圣军，那是由 150 对“恋人关系”的年轻战士组成。如果说忒拜圣军是西方古代史上的一道奇观，那么，新罗的花郎道就是东亚中世纪上独特的风景线，而不是单单存在于音乐与美学的世界中。

四 向西看与向东看

初盛唐时，大唐帝国艰难地打败了北方的霸主突厥，在中亚诸国实现了新的统治秩序。比如唐高宗永徽年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设置了康居都督府（比前几章提及的“安西都护府”级别低），著名的《胡旋舞》就是出自此地。白居易《胡旋女》诗有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馀。”诗下有自注云：“天宝末，康居国献之。”安禄山据说也精于此舞。举出《胡旋舞》的例子，是想说，我们关注大唐帝国的世界，既要向东看，又要向西看。本书的题目与主旨，决定了要向东看，但实际上，活在大唐帝国的君王、百姓，所感受到的来自西方的魅力与威胁，恐怕都要大于东方。

我记得小时候，踮着脚在家中的书架上拿到一本冰心作序的《井上靖西域小说选》，无意翻到《敦煌》一篇：落魄书生赵行德，从蓝眼珠、金色胸毛的回鹘族恶汉的屠刀下，救出捆绑在案板上待杀的、全裸的、艳丽的、肉体丰满的、“一眼就能看出她不是汉人”的西夏年轻女子，那一幅“画面”久久印入我的脑海中。固然西夏、回鹘之勃兴，要待到唐末五代，但对于那种源自唐代的、“西”方的神秘与诱惑，恐怕也是井上靖创作的源泉之一吧！

又比如，唐人所修《晋书·吕光载记》记载，吕光奉前秦帝王苻坚之命西征，在龟兹国与中亚的狯胡骑兵 20 万大战，当时狯胡使用了一种“铠如连锁，射不可入”的铠甲——锁子甲，前秦的氐族军队十分惊恐，可见六朝时中土罕有此物。但等到了唐代，据《唐六典》的“甲之制，十有三”里面，这种源自中亚西域的锁子甲已经是唐军常备铠甲之一了。吕光平定龟兹后，还引入了“龟兹伎”，就

是前文所及隋代“九部乐”之一的前身。话说回来，唐太宗的“十部乐”中，来自朝鲜半岛的比重很小，多半都是西域，如：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康国、安国等。对于西的追崇，似乎是唐人的一种风气，所谓“唐人大有胡气”是也。

来自西方的胡乐与胡服之所以能够引起唐人的兴趣，又要回到我们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胡汉态度，如果说第一个大帝国汉，是通过“胡汉对立”建立了最初的世界秩序，那么，第二个大帝国唐，则是用完全相反的“胡汉融合”的精神缔造了全新的世界秩序。此外，是因为大唐的立国态势，依旧以西北为重，以东南为轻——这一点，虽然与大文化运势的东移有所背离，但乃是大唐帝国三百年之基本势态也。倘若把学界对大唐帝国的研究也划分为东与西，那么，显然是对西研究的业绩与成果远超过对东的研究。

我们这本小书的名字叫《炎凤朔龙记》，如果再从乐舞上看，从北魏传至大唐还有一曲《火凤辞》。二十四史《北齐书》的作者——唐人李百药还为此《火凤辞》填过词，大文豪元稹则谓其也是“胡”曲。上文提到江户时代的《大日本史》，称日本流传有《直火凤》和《连珠火凤》，就是源自《火凤辞》。日本学者林谦三对比了敦煌谱，并从音乐的角度说标“火”字，代表一拍子的1/2时值，有“出急之音”的意思。这不是恰好象征了“西—中—东”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斯芬克斯铜雕，土库曼斯坦国立历史博物馆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凤中，也存在于龙中。敦煌





唐连珠胡人武士狮子狩猎纹锦，日本法隆寺



唐龙首天马纹水瓶，日本东京博物馆

出土的唐钞本《沙洲伊州志》有如下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领首。其人轻锐，健斗战。皆秉王化。"

这些从中亚、西域迁入中土的有趣的龙部落。到底本指何物，尚无定论。不过可以推论，大唐帝国龙的形象，肯定融合进了西方的元素，和汉魏六朝的龙已有很大不同了。其中，唐龙最大的特点是四肢发达，好似西方来的雄兽狮子，与丝绸之路出土斯芬克斯亦有类似。贞观九年，唐太宗同样是从康国得到了一头雄狮，虞世南奉旨写了一篇《狮子赋》赞美这种西方的猛兽。于是，现实中最强大的动物狮子，自然会和中国原有观念中最强大的动物龙合体。龙的狮化在亚洲艺术史上是一个大命题，不过其主要的发生时间，当是在大唐帝国

时代，而且这种形象强健的朔龙也一定深深被大唐帝国君臣百姓所喜好。总之，这种对西的喜好，也通过大唐帝国的文化媒介，波及到了东亚年轻的各国。

李白的诗曾经写道："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所谓有着龙翼的天马，在唐代大多来自胡旋舞的故乡——月支窟撒马尔罕康国，这种骨骼强健的西方"龙种马"（语出《新唐书》）正是大唐帝国的现实写照啊！据美国汉学家谢弗的考证，唐高宗时，百济还献过一种岛屿矮种马，料想这种马得不到唐人的喜爱。今天的游客去西安，看到世界上唯一的夫妻皇帝（唐高宗、则天武后）合葬墓乾陵前的天马，是否会遥想到大唐帝国在东、西两个世界的凤飞龙升之态呢？炎对应的五德是仁，朔对应的五方是北，北主生死、主征伐。我们仿佛听到了大唐乐府中，依稀传出的唱词：

仁如凤，战如龙；仁如凤，战如龙……